

三联
耳关

生活周刊

®

2023.12.18
2023年第51期, 总第1269期
www.lifeweek.com.cn



基辛格

1923~2023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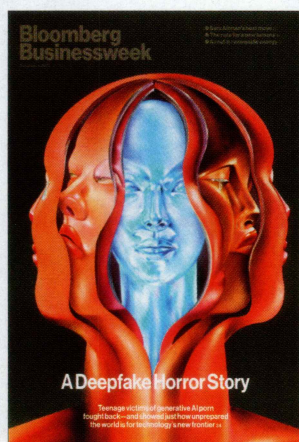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元



《彭博商业周刊》2023.12.4

深度造假

“Deepfake”（深度伪造技术）一词来源于一个专门讨论用 AI 制作假色情片的论坛。现在，该词被收入《牛津英语词典》，定义是“通过深度学习模型伪造真人图像”。数据显示，自 2022 年 4 月以来，已经有超过 150 亿张 Deepfake 图像被创建。网络安全专家表示，90% 的深度造假图像都是色情的。目前，美国有十几个州已经通过了针对深度造假的法律，但只适用于双方自愿分享的私密照片，并不适用于社交媒体上传播的照片。

1 《自然》2023.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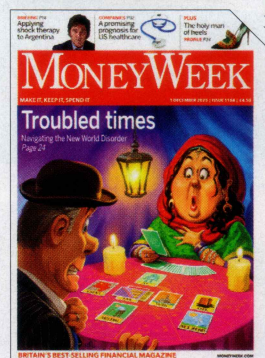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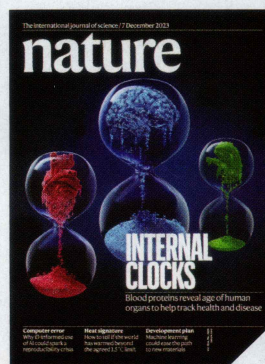
器官衰老

研究表明，衰老过程不仅在个体之间存在差异，而且在个体的器官之间也存在差异。来自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团队通过测量 5676 名受试者的血浆蛋白，成功模拟出器官衰老的进程。研究发现，约 18.4% 的人器官衰老仅由一个器官主导，只有 1.7% 的人表现出多器官衰老。另外，器官的年龄预示着健康和疾病状况。例如，高血压患者的肾脏比同龄人大 1 岁左右，糖尿病患者的肾脏则比同龄人大 1.3 岁左右。

3 《货币周刊》2023.12.1

不可预测的未来

未来，世界可能会更加动荡、更容易出现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因为高负债和地缘政治动荡，随时都可能产生巨大的通货紧缩浪潮。2022 年之前，债券和股票都经历了 40 年的牛市，但在历史长河的大部分时间里，股票和债券往往是同时涨跌的。也就是说，未来的投资者们需要其他更稳定的对冲工具，如大宗商品或黄金。此外，科技股票也是不错的投资选择。



2 《巴伦周刊》2023.12.4

AI 淘金热

无论明年的全球经济如何变化，有一个技术领域相对不受影响——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芯片和产品。华尔街的报告显示，75% 的首席信息官正在测试人工智能项目，超 60% 的首席执行官则计划采用新的人工智能产品。英伟达的高管表示，一直到 2025 财年，该公司的芯片供应每个季度都会增加，以满足不断飙升的市场需求。英伟达的股价今年以来上涨了两倍以上，远超华尔街的预期。此外，超微和 Vertiv 这两家公司也正在异军突起。

4 《财富》2023.12 ~ 2024.1

欧洲 500 强公司

全球紧张局势导致能源供应紧张，能源企业领跑本年度 500 强公司榜单。排名第一的是英国的能源巨头壳牌公司，其次是来自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的另外五家能源公司。相反，由于并购市场不温不火，投资银行和金融服务公司的排名大幅下滑，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排在第 27 位，汇丰控股（HSBC Holdings）排名第 28 位。上榜的公司平均年龄为 108 岁，其中历史最悠久的是百威英博公司，已存续 657 年。



30 封面故事

基辛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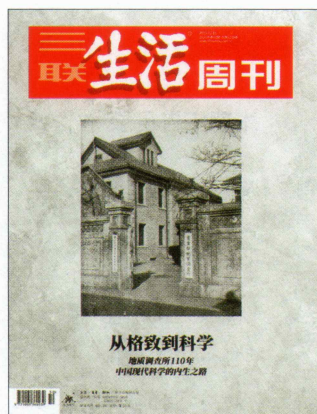
1923~2023

成为基辛格：冷战之下	34
中美关系需要下一个“基辛格”	50
基辛格的“美国世纪”与回响	60
从哈佛到白宫：影响基辛格的关键之人	66



经济	市场分析：人口萎缩的挑战与机遇	78
社会	时事：加沙以外：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问题调查	82
	调查：坍塌的体育馆与“人脉”中的新县城	90
	调查：网络主播非洲遇害：流量的诱惑与危险	96
文化	话题：从《拿破仑》，看束缚于传奇之中的拿破仑	102
	文史：《总目提要》	116
专栏	邢海洋：零食大降价，降到点上了吗？	18
	苗千：发现“完美”星系	112
	袁越：寄生虫的超能力是从哪里来的？	114
	张斌：2023 年那些体育纪录丰碑	118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119

环球要刊速览	2	消费·理财	20	生活圆桌	24
读者来信	10	健康	22	好东西	26
天下	12	声音	23	个人问题	120



2023年第50期，总第1268期

从格致到科学

前两天正好去了泰兴丁先生纪念馆，虽然以前完全不了解，也觉得丁先生很厉害。三联很棒，我们需要更多这方面知识的普及和了解。（@ying）

那个时代就有那么一批人，怀着救国之心去西方最好的学校求学，年纪轻轻便学成归来，做了各领域的开创者。那时条件比现在艰苦一百倍，真让人佩服。（@胖熊熊）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微信平台（lifeweek），回复您对封面故事的评论，精彩留言将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中。

远嫁的烦恼

还没找对象的时候就常听母亲唠叨一句话，让我千万别远嫁。奈何年轻气盛，一个不留神，我还是从长三角嫁到了纯纯北方，又远赴珠三角，开启了新的人生阶段。现在回想起来母亲那时候的反应，忘得也差不多了，只能依稀回忆起她的几声叹息：“哎好好的，干吗嫁得那么远！”那时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觉得新城市哪哪都好，甚至连空气都混合了阳光的甜美味道。

后来，我有娃了，第一胎有点紧张，还没生就把母亲大老远地请来。还记得那是生之前的最后一天，和母亲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小公园里散步，阳光洒下来铺满了绿色的草坪。我拖着个大肚子，实在走不动了，站在河边，半叉腰，微眯眼，看着母亲映在阳光下的那半片脸庞，竟然想到了从小长到大的家。那里好像也有一个小公园，也有耀眼的阳光，更有父母陪我一起长大的记忆。

再后来，娃大了点，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家里若无常驻老人，必须得请个人。但是更多的烦恼也就来了。我们不在家的时候阿姨对娃好不好？会不会惯着宠着？会不会玩手机忽略孩子？外婆和奶奶偶尔来，和阿姨处得好不好，习不习惯？烦恼一个接着一个，这个问题搞定了，那个又来了。娃一点点长大，每个月的烦恼却好像有了不同的主题，和孩子的成长息息相关。

记得某个国庆假期，阿姨休假，不得已让外婆来帮忙。孩子正处在疯狂发育的阶段，那会儿秩序敏感、主见凸显，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阿姨休假回来感到各种不适，当着我母亲的面暗戳了几句孩子最近难带，不如她回家前。话递到了母亲那儿，她也不示弱，和阿姨争辩了几句。我下班回来母亲跟我“告状”，那一瞬间我竟然庆幸上班拯救了我这个“潜在目击者”。

因为老家离得远，母亲来的机会不算多，出现也往往是“江湖救急”。

想到孩子明年就是上幼儿园的年纪，新的烦恼好像又来了，我盘算着如果不请阿姨了，母亲是否能来帮忙一二。可是，想了想随即还是作罢，这座城市对我而言是我的家了，我生活在这里，工作在这里，可是对母亲而言，这只是一座有我的城市罢了。她没有朋友，没有生活，唯一的生活恐怕就是等孩子放学，等我们下班，更何况，她的父母还都在老家附近的城市呢！

罢了罢了。突然，我好像理解了母亲，当时她同意我远嫁的那一丝勉强，此刻也合理起来。这不仅仅是思念的情绪使然，更是长远思虑下早就帮我预想过这种种我可能经历的难题了吧。她怎么会不知道呢？不过是心疼我，当初把那些扫兴的话咽了回去。她有她的难处，无法尽力帮我，而身为女儿的我，怎么能不懂呢？

以前，我总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来到新城市充满了勇气和新鲜感，可是现在，看着日历又忍不住算着下次回家的日子，只盼那是个阳光明媚的好日子啊！（读者 空空）

肯尼亚 | 舞者

12月2日，内罗毕的国家剧院上演经典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图为两位舞者在后台。







英国 | 王室与圣诞

(右图) 12月8日, 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带着三个孩子现身威斯敏斯特教堂, 参加“一起过圣诞”颂歌仪式。



米歇尔·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参加圣诞颂歌仪式。图安

墨西哥 | 圣地亚哥节

(左页上图) 12月9日, 数百名索西族居民来到恰帕斯州的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市朝圣, 庆祝圣地亚哥节的来临。该族居民被认为是玛雅人后裔。

巴哈马 | 虎鲨

(左页下图) 12月7日, 巴哈马群岛老虎海滩, 摄影师和驯兽师一起潜入水中, 与虎鲨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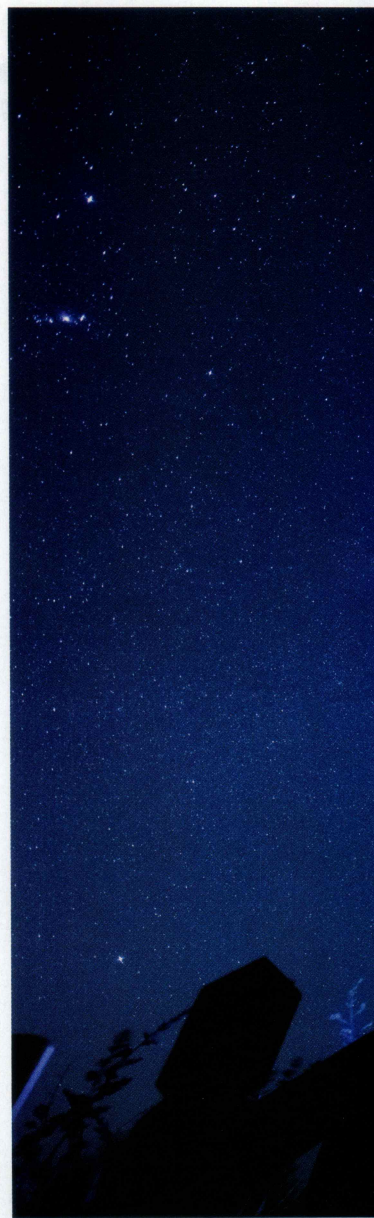


新西兰 | 流星雨

(右图) 12月9日，凤凰座流星雨划过坎特伯雷上空。

日本 | 超细面条

(下图) 12月8日，熊本县的一家面条厂内，工人在阳光下晾晒细麦面。这种用传统手艺制作出来的面条直径不到1.3毫米。





整玉像彈“毛制品真”來回中土。

零食大降价，降到点上了吗？

文·邢海洋

休闲食品三巨头之一的良品铺子举起了降价的大砍刀，瞬间 300 多种产品平均降价 22%，其中最高降幅达到 45%。曾经，零食三巨头因上市而建立起宽大的食品安全护城河，开启了价高质优的休闲零食之旅。现在，消费者渐瘪的钱包，以及街角成千上万的量贩式零食店蚕食了它们的份额，市场重归低价竞争态势。

休闲食品巨头的风光与落寞是有迹可循的。这次良品铺子降价幅度最高的产品种类是坚果，包括夏威夷果、松子、开心果和腰果等，其实休闲食品巨头的风光就隐藏在坚果里面。坚果富含高蛋白，是植物为繁育下一代浓缩下来的营养精华。坚果内还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防止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有一定的效果。凡此种种，都意味着中国消费者将消费更多的坚果。

可坚果吃起来鲜，却极容易氧化变质，变质的结果是产生黄曲霉毒素，而黄曲霉毒素又是致癌物，故而吃坚果，保质期很重要。3 年前，良品铺子甫一上市股价便 15 连板，连涨了将近一个月，市值翻了 3 倍多。资本的逻辑是很清晰的：在零食领域，尤其是以坚果为主的，稍稍过期就可能影响口感，并产生有害物质，品牌化是必经之路，既保护企业的利益，也是消费者的利益所在。有了人人皆知的品牌，有了高大上的产品形象，休闲零食巨头们也就有了商业壁垒，可以自由定价了。

可惜的是，休闲零食可谓是没有白酒的命，却得了白酒的病。成了巨头并不意味着坚果将由它们几家独家经营。价格虚高，消费者不买账，自会有新兴的

企业填补市场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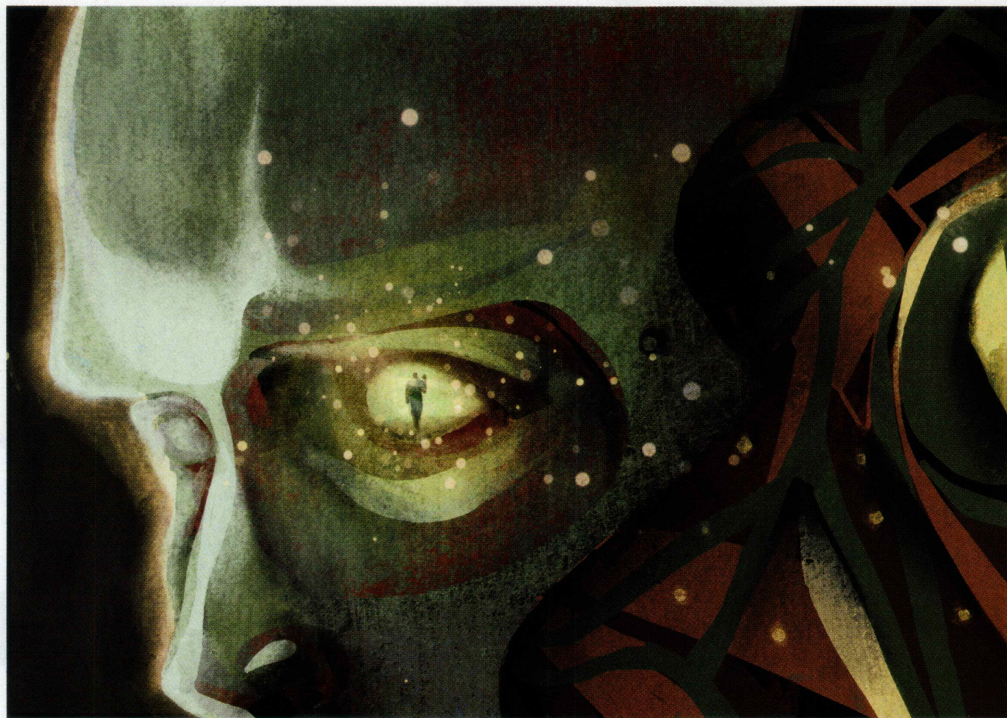
这两年零食行业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量贩式零食店的大量涌现。这些遍布街角的零食店，有大玻璃窗、简洁的展示柜，以及琳琅满目的小包装零食，把零食售卖带到了一种全新的模式。量贩式零食店从工厂直接采购，去掉了经销商环节，商品因而更低价。与超市的零食货架相比，量贩式零食店的散装产品种类更为丰富。区别于商超大包装的售卖方式，这里的很多休闲零食都是小克重、独立包装、论斤称重。2021 年全国量贩式零食门店数量还只有 2500 家，2022 年底就扩张到 1.3 万家，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今年可能有近 3 万家。量贩式零食店不仅遍地开花，还开始了兼并合并、做大做强的资本运作。量贩式零食领域的两大品牌“零食很忙”与“赵一鸣零食”已经宣布进行战略合并。

既然散装零食同样美味、解馋又廉价，让刚竖起品牌的零食巨头们很快就败下阵来。良品铺子的营收已连续 5 个季度出现同比下滑，今年第三季度更是陷入营收、利润双降，其中累计营收更是下滑了 14.33%。降价以重获市场就是摆在良品铺子等零食巨头面前不得不做的选择。其实早在一年前，三只松鼠就提出了高端性价比战略，使其主打的坚果类产品价格明显低于竞争者。这一战略似乎也没有稳住三只松鼠的销售额，今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也下降了 14%。据信息披露三只松鼠在第三季度严格执行了有竞争力的价格，销售开始回升了。

今日之零食三巨头，其利润状况已远非三年前可比，保利润是没有指望了，要想求生存也只有降价一途径。当良品铺子全面推出降价战略，资本市场报之以激赏，连续两天股价涨停，显示的就是这种被逼于墙角后背水一战的状态。

今年的物价走势，降价是主流，10 月 CPI 同比降低 0.2%，跌入负值，11 月更是跌了 0.5%。对于过剩的食品供应而言，唯有降价才有机会。并且，降少了如同衣锦夜行，没人注意，也换不来市场份额。唯有大声降价，降出气势，才能赚出吆喝的彩头。从这个意义上看，良品铺子算是应和了今年商业的主旋律。☑





栏目插图·范薇

Gemini 登场

12月6日深夜，在没有任何预告下，谷歌推出了迄今为止功能最强大、最通用的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 Gemini。Gemini 在诸多测试中优于 OpenAI 的 GPT-4，甚至是第一个在大规模多任务语言理解测评上超过人类专家模型。就像人类一样，它不仅从文本中学习，还能通过视频、音频和代码进行学习。

黄金储备“十三连增”

不仅民间藏金，截至11月，我国黄金储备也连续13个月上升，达2226.39吨。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2023年全球央行购金需求强劲，上半年购金达387吨，创同期历史新高。全年购金需求或超过750吨，虽不及去年，但远高于前10年央行净买入的均值。黄金避险、抗通胀、长期保值增值，增加黄金储备有利于动态平衡国际储备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

财政部回应穆迪

在疫后经济恢复不及预期、地方债务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国际评级公司穆迪发布报告，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1 不变，但将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财政部回应称，地方政府债务处置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房地产下行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的影响是可控的、结构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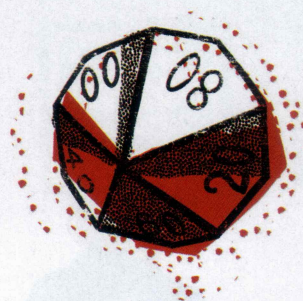
20 年 20 倍

A 股再次跌破 3000 点之际，印度股市则破了纪录。印度股市是 2023 年亚洲乃至新兴市场表现最好的股市之一，主要基准股指 Nifty50 的涨幅超过 13%。从 2020 年 3 月疫情低点后算起，在印度两个交易所上市的证券市值已增长 2 倍。若保持涨势到年底，印度股市将创下 8 年连涨纪录，更是在 20 年间涨了 20 倍。



“新马泰”

泰国免签在前，中国给予马来西亚公民免签签证待遇后，马来西亚也给予中国公民一个月免签待遇。12 月中国又与新加坡实施 30 天互免签证，至此“新马泰”经典出境旅游线路已全部免签。冬日避寒，对于中国游客东南亚出境游更具性价比。2023 年 1 月至 9 月，新加坡入境的中国游客达 100 万人次，恢复至 2019 年同期水平的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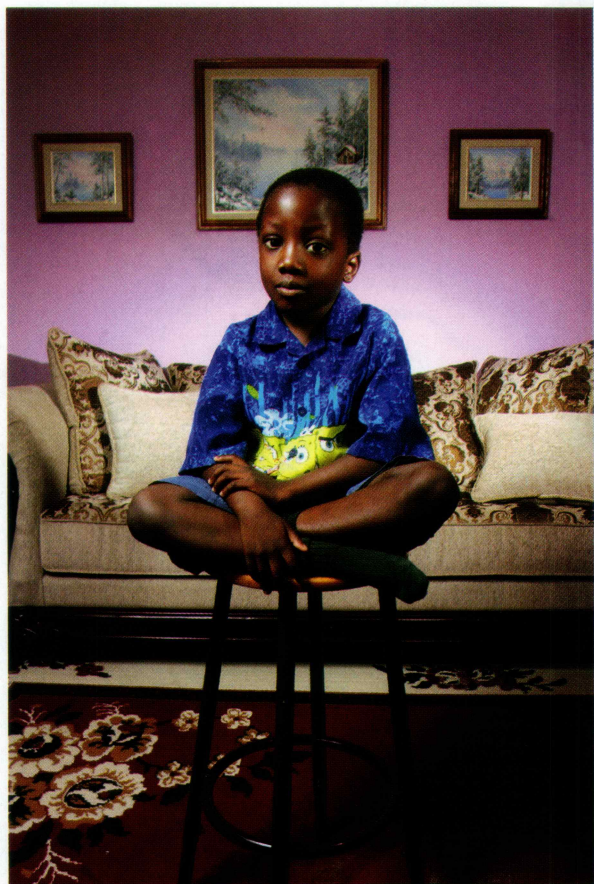


彩票疑云

12 月 2 日，中国福利彩票“快乐 8”第 2023322 期开奖，结果是“选七玩法”大爆冷门，中奖 50159 注，江西中奖 50100 注，其中南昌市出 50095 注，某大奖得主花费 10 万元，中得了 2.24 亿元的奖金，由于彩票兑奖机制的设计还无须缴纳个人所得税。今年的彩票销售堪称疯狂，年轻人加入了博彩大军，仅上半年即销售 2739 亿元，同比增长 50.4%。

万达“自救”

年底将至，万达商管仍未上市，对赌协议仅剩二十余天。在转让万达电影后，王健林又与投资机构洽谈出售位于一、二线城市的万达广场。早在 7 月，上海儒意影视即以 22.62 亿元获得北京万达投资 49% 的股份，年底则再获 51% 的股权，全资控股万达投资，间接对万达电影持股 20.68%，成为第一大股东。而上海儒意的背后隐约有腾讯的身影。



基因编辑的里程碑

12月上旬，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一款基于 CRISPR 技术的基因编辑疗法，用于治疗 12 岁及以上伴有复发性血管闭塞的镰状细胞病患者，成为全球医疗界瞩目的焦点。全世界每两分钟就有一名患有镰状细胞病的婴儿出生，这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疾病，由基因突变引起。患者会出现贫血、免疫缺陷甚至过早死亡等症状，过往由于骨髓移植配型困难，大多数患者只能依赖频繁输血维持生命。目前，已有 45 名镰状细胞病患者接受了该疗法，其中 29 人在治疗后至少一年内缓解了疼痛发作。CRISPR 基因编辑疗法或将打开治疗基因突变类疾病的全新领域。

好消息



厚毛毯与好睡眠

失眠是成人中最普遍的精神疾病之一，最近，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睡眠时盖厚毛毯，可以使严重失眠患者的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实验结果显示，在开始睡觉的一个小时内，相比轻薄毛毯，厚毛毯让实验参与者的褪黑素水平增加约 32%。



乳酸杆菌抗抑郁

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发酵食品和酸奶中发现的一种细菌——乳酸杆菌，可以维持一种叫作干扰素的免疫介质，这种免疫介质可以调节身体对压力的反应，这一发现为学者研究治疗焦虑、抑郁的方法打开了新的大门。

坏消息



不够充足的营养素

南安普顿大学与世界各地的专家对高收入国家孕妇健康状况的研究发现：90% 的孕妇缺乏保证孕期健康和未出生婴儿健康的必需营养素，包括维生素 B12、叶酸和核黄素等。这些营养素多来源于肉类和乳制品。这是一些都市女性过于追求清淡饮食的副作用。



高脂肪食物削弱抗压能力

伯明翰大学的一项实验发现，当人们精神紧张时，高脂肪食物会削弱大脑前额叶氧合成，而大脑氧合成减少可能会影响情绪和心理健康，使得人们的紧张情绪再度加剧。

最后我意识到，如果你从外面看富贵，他的人生全是悲剧。我需要让他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我要用最简单的语言、最常用的词语……我发现富贵在讲述哪怕是他自己的苦难时，他可以用一种很快乐的方式来讲——活着就是快乐地讲述一个人经历的苦难。

——余华，《巴黎评论·作家访谈》

通过虚构，我们得以探索一个潜在的情感世界，而没有虚构，我们就不会了解这个世界，也不会在自己身上去辨认这个世界。最不起眼的虚构也会触及我们的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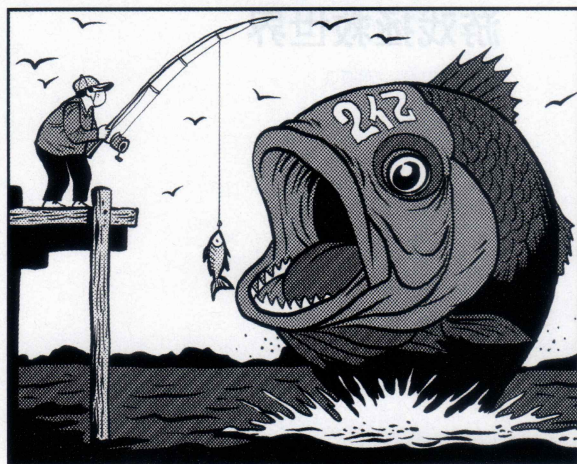
——法国文学批评家亨利·戈达尔，《小说使用说明》

龙乃中国文化特有，西方传统并无是类动物……中国龙乃神兽灵类，和西方龙大相径庭，不可混为一谈……天主教在欧洲兴起，欧龙的意象随之生变。在欧洲叙述文学里，龙多半两其翼而身似蜥蜴，皮如鳄鱼而又长有鳞甲，在吐火外同时另可喷毒。

——李爽学，《细说英语词源》

谁都免不了说些蠢话。可悲的是用心这样做……自然界没有无用之物，甚至不存在所谓无用。宇宙万物无不各得其所。

——蒙田，《论功利与诚实》



我们大多数人吸收、呈现或记忆细节不是靠纪实。我们在普遍事实的狂热中不会沸腾，但我们会在独特细节的低温中战栗。

——美国评论家詹姆斯·伍德，《不负责任的自我》



+/-
数字

543

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了2022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结果。其中，新加坡包揽阅读、数学和科学3项测试的榜首，平均分分别为543、575和561，另外5个亚洲地区——中国的澳门、台湾、香港及日本和韩国在数学上仅次于新加坡，在阅读和自然科学领域也名列前茅。

13-1023

Pantone 公布年度代表色 13-1023 Peach Fuzz（柔和桃），它“充满温暖与现代优雅，富有同情心、能给予温柔拥抱，轻易就让青春活力与永恒不朽产生交集”。

5000

万

维基百科今年阅读量最高的页面是 ChatGPT，达到近5000万次，《奥本海默》有2800万次，梅西1660万次，马斯克1437万次。

游戏拯救世界

文·程旭 图·谢驭飞



如今，似乎一切皆可游戏化，学习、工作，甚至公益都可以。如果不搞概念大乱炖那套，在玩中学、在干中玩都有商业噱头和职场画饼之嫌，而公益游戏化的玩法则完全符合美国哲学家伯纳德·舒兹对游戏的定义——“自愿去克服非必要的障碍”。

每当对自己的英文水平和欧美文化知识盲目自信的时候，我都会去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运营的“免费大米网”（www.FreeRice.com）主动受虐。这个网站就是玩答题游戏，近义词单选和百科问答，可自由设置难度，每答对一道题，题目下方的饭碗里就会放上10粒大米，网站赞助商会据此捐款。据说创始人设计这个网站的初衷是帮助孩子背单词，不承想，我们苦读做题也能为遥远的饥荒和无情的战火带去一丝抚慰。

玩游戏拯救世界这件事，怎么做才算对？用阳光雨露浇灌大树，太无聊的话还算是劳作，过于好玩也会陷入娱乐化的困境，搞个噱头合张影一哄而散，不痛不痒地想激发爱心传递和平，路人看来好比过家家。英语中有个成语叫“Skin in the Game”（皮肤入局），在游戏中玩家得是局中人，与该事务利害攸关且有切肤之痛，才会好好玩、长记性。一个极端的案例是系列惊悚电影《电锯惊魂》，魅力反派“竖锯”的开场白永远是“我想和你玩个游戏”。游戏的设定是“为了活下去你愿意流多少血”，一个个精巧繁复的酷刑机关将人置于生死一线，游戏参与者要么出点血断胳膊断腿活下来，要么游戏结束生命终止。通关的玩家会在奋力一搏时

重拾生命的美好，残缺不全的魂灵经历炼狱后往往会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难怪，在最新续作中“竖锯”戏称自己是心理治疗师，用血浆浇灌枯萎的树苗，而执导过多部续集的达伦·林恩·鲍斯曼则认为他是“通过游戏唤醒人们求生本能的科学家、哲学家”。单词记不住，是重复的次数不够；游戏没有教化效果，是游戏设计不够“狠”。

最近，我玩的一款剑桥大学制作的网游《坏消息》（Bad News）也有这种狠劲儿。游戏是通过引导一步步把玩家打造成在社交媒体上兴风作浪的造谣高手，教你轮番使用武器库里的装备诸如“抹黑”“极端化”“阴谋论”“情感操纵”“冒名顶替”等，来达到“涨粉”的游戏目标。玩游戏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连造谣都是菜鸟，“造个什么谣”一上来我选了“金字塔是外星人驯化恐龙帮忙建造的”，NPC网友就跟帖“科幻电影看多了吧，鬼才相信”。游戏里的导师就耐心指导，要选择那些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谣来造，要学会利用人们的恐惧和愤怒，要多做一些带节奏的表情包，对跑来搞事实核查的人施以人身攻击，注册一些僵尸粉和小号摇旗呐喊。很快，我的粉丝数就过关了。游戏的开头和结尾都会有一个识别新闻可信度的测试，据游戏制作团队公布的数据，这款看上去教人作恶的游戏其实是一剂强力疫苗，能让玩家分辨谣言的能力提升25%左右。

游戏能拯救世界吗？反正拯救了我的一点点愚蠢、懈怠和自大。■

不要什么的自由

文·朱为为 图·谢驭飞



周末计划爬一座野山，但功课做得不够，不知道那一带在修路，野战军一行人只好半路折往另一个比较热门的景点。下车那一瞬，微风阵阵，笑语喧哗，花红柳绿，满眼都是衣袂飘飘、妆容精致，既年轻又漂亮的女孩子。我受到了伤害——我没洗头没化妆，穿得像个铁血战士——所以面目可憎都是发型服饰的错。正打算掐老公一把，让他盯妹子的眼神含蓄点，发现他也正处于沮丧中——有人是开着哈雷摩托上来的。

一时山水失色，日月无光。然而儿子却欢叫着、跳跃着，一路追赶蝴蝶与山雀。糟糠二人不免相视一笑，看山又是山，看水还是水了。

心里不免怵惕：原来，丁点小事，也足以动摇一个人的自信与安全感。突然也就有些明白，为什么身边永远不乏衣食无忧，却仍然焦虑的人。想成为精致女子？健身、阅读、烘焙、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以及最朦胧最清新的滤镜。文艺青年？那你一定要读（买）《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乌克兰拖拉机简史》《忒修斯之船》，而且熟悉王家卫的每一个分镜与每一句台词。死宅？最新的番剧最好的手办，你都一一拥有了吗？

满目缤纷，花样层出，仿佛已是参差多态的理想社会。可当你把这一切的包装打开，瞅来瞅去，里面都分明藏着一个字——钱。说到底，除了直接烧钱的硬核土豪，当人们在社交场合

展示时尚、精致、博学、品位等一切需要耗费大量资源的“品质”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展示财富。

这当然没什么问题，人人都有追求、展示上述品质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但也要尊重他人不时尚、不精致、不博学、没品位……的自由。问题在于，资本的触角早就伸到我们的大脑皮层。你翻爆照帖，觉得美好的肉体是政治正确；你翻美容帖，认为精致的面容是对自己与他人的尊重；你翻旅游帖，难免慨叹没观过世界的人无资格提世界。我们做了消费主义的傀儡而不自知，不惜刷爆信用卡甚至欠下高额贷款，转过身来还对某些网络平台捏着鼻子，说它们纵容愚蠢粗俗的视频四下泛滥。我们真的是反对粗鄙吗？不，我们是在嘲笑匮乏。一个人的自我认同如果要靠服饰、体脂比、银行存款、阅读书籍数目等一切可量化的东西来确立，那么，势必就有忍不住给自己、他人标注价格的危险，那又难免冒犯 21 世纪的普世价值观了。

真正奢侈的东西，永远是稀缺的、经得起时间冲刷的，而不是这些一哄而上转瞬即逝的东西。何况，为什么就一定要追求奢侈、稀缺、永恒呢？我们也有不奢侈、不稀缺、不永恒的自由。■

本栏目投稿邮箱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精密链接

Gucci Allegoria 高级珠宝系列项链的中央吊坠镶嵌着约 78 克拉的椭圆形切割黄色蓝宝石，由长阶梯形切割和圆形切割钻石环绕点缀，星形扣环和链身部分均由铰链连接，灵活贴合颈部曲线。



天文台认证

格拉苏蒂原创议员天文台腕表的银蓝色调表盘元素均以古董航海天文钟为灵感，白色 18K 金表壳经手工抛光和缎面磨砂处理，整表均以 5 个不同的位置、在 3 种温度下经过独立检测机构的 15 天测试。



拥抱的姿态

Ferragamo Hug 手提包的不对称设计由侧面折叠裁片向正面延伸，可锁紧或解开的 Gancini 扣饰犹如拥抱的双臂，提手至少有 18 个部件，包身则由 27 个部件组装而成，框架边缘手工涂漆。



滑雪装备

SMITH 4D MAG 滑雪镜采用鹰眼仿生视野技术增加了 25% 的可见视野，Chromapop 技术过滤掉红绿蓝三原色重叠的部分，眼睛不易产生疲劳，5X™ anti-fog 内镜结合 3 层 DriWix 面部泡沫橡胶，有效减少雾气产生。

智能电动螺丝刀

ARROWMAX M1 PRO 拥有 5 档可调节扭矩，支持蓝牙连接和 App 控制，让操作更加精准，配备 OLED 显示屏和 LED 灯，方便在暗光环境下使用，60 种螺丝头配有铝制外壳，便于携带和存储。



中底技术

ANTA 鹰杰系列滑板鞋复古的微面包造型廓形圆润，C37 软弹中底科技旨在 $37 \pm 3^\circ$ 的硬度调教下，形成刚性、柔性、韧性的配比，保证了支撑与缓震能力，全掌橡胶外底进一步加强抓地力和防滑性能。

多功能灯具

Bowio 2.0 可提供 1000 流明的照明亮度，通过触摸调节亮度和色温，轻盈的外形使它适合不同的阅读和游戏环境，10 小时的电池续航时间方便移动时使用。



野性猎豹

Sicis Damisa 戒指生动呈现一头坦桑尼亚猎豹，白色、黑色和灰色钻石以微型马赛克工艺镶嵌出猎豹的皮毛，眼睛嵌入一对红宝石，利爪下的方形红碧玺闪烁着耀眼光芒。



金色徽标

酒红色小羊皮制作的 Loewe Goya 单肩包，鹅毛衬垫形成蓬松柔软的外观。按扣式前翻盖装饰金色徽标，与金属圆圈串连的肩带相得益彰。

日内瓦条纹

De Bethune Season 陀飞轮腕表用碳灰色锆表壳搭配鱼雷形表耳，酒红色表盘装饰日内瓦条纹，中间配置日历及数字时间指示的视窗。





银行家台灯

&Tradition Caret 充电台灯重新诠释经典“银行家灯”的简洁轮廓，圆柱形底座由弯曲的钢板焊接，金字塔形状的灯罩散发柔和的漫射光。

树脂聚合物

适合户外使用的 Fermob Sixties 扶手椅，铝材框架以圆弧线条为特征，树脂聚合物交叉编织出椅面和靠背，和谐组合在同一色调中。



拱形线条

Ritzwell MO 凳子以椅面略微呈拱形的边缘线条为特征，编织皮革椅垫搭配实心胡桃木框架，皮革形成的缓冲效果提供就座的舒适感。



基辛格外交生涯所激起的复杂争议，即使在政治家中也实属罕见

基辛格

1923~2023

主笔·徐菁菁

当地时间 11 月 29 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家中去世，享年 100 岁。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尽管几乎失去了一只眼睛的视力，需要依靠拐杖、轮椅或随行者的搀扶行动，借助助听器进行沟通，但基辛格从未停止他对国际事务的关心和参与。10 月，他回应了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及随之导致的战争，称哈马斯的目标“只能是动员阿拉伯世界反对以色列，以偏离和平谈判的轨道”。9 月，他和来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非正式会晤。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消息，基辛格告诉泽连斯基，从前，他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就是担心今天这场冲突的爆发。而现在，“让乌克兰保持中立的想法已不再有意义”。

就在去世前的四个月，基辛格完成了生命中最后一次重要访问。7 月 20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5 号楼会见了基辛格。基辛格感谢了东道主的体贴。钓鱼台国宾馆 5 号楼，正是他当年访华时与周恩来总理会见长谈的地点。1971 年 6 月，在尼克松政府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收到了来自中国的密信，邀请他到访中国，为美国总统访华铺平道路。基辛格无比雀跃，他告诉尼克松：“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一封信函。”半个多世纪的光阴过去了，中美建交依然是基辛格最毋庸置疑的功勋章。

梳理和评价基辛格的一生是困难的。他所经历和影响的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与他个人多面、复杂的个性深深地纠缠在一起。他所激起的复杂争议，即使在政治家中也实属罕见。

在支持者眼中，基辛格是伟大的外交官、战略家，他缓和了冷战中中美苏之间的剑拔弩张，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他的批评阵营也同样强大。美国的保守派指责基辛格对待苏联和共产主义世界过于软弱。而在左翼自由派眼中，他极度冷酷无情，将许多国家和人民视作股掌间的棋子。一个控诉是，美国本可以更早地结束越南战争，但为了实现“体面”离场目的，基辛格主张以战促和。仅在1972年持续12天的圣诞轰炸中，美国就向北越投下了2万多吨炸弹，造成逾千名平民死亡。基辛格的行事风格也饱受诟病。他绕开美国的官僚体系，惯于实行秘密外交，纵然多有建树，也有违民主的原则和精神。

但不管对基辛格报以何种态度，人们都必须承认，基辛格在他的时代参与重塑了世界的秩序。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基辛格：理想主义者》（*Kissinger, 1923-1968: The Idealist*）一书的作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言：正当这个世界摆脱早期冷战的意识形态分歧——两个等级森严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决斗——踏入一个相互依赖的、多极化的新时代之时，基辛格踏上政治舞台，成为“在恰当的时间处于恰当地方的恰当人物”。

1977年，在种种批评声中，基辛格卸任国务卿。在此后近半个世纪里，他再也没有进入过美国外交的决策核心。1991年苏联解体，基辛格所熟悉的两极世界消失了。他似乎变成了旧时代的华丽标本。人们保持了对

他的尊重，但从心里觉得他过时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也拜访了基辛格，希望用向基辛格寻求建议的举动，树立个人形象。后来基辛格笑称：“他不是第一个向我寻求建议的人。他要么不理解我说的话，要么不想理解我说的话。”

但基辛格并不认为他所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已经彻底远去了。

2021年，在回顾50年前的那次中国之行时，基辛格说：1971年访问的前提依然是有效的，甚至比当时更加有效，美中之间产生任何的冲突，都将使世界分裂；让世界上的国家选边站队，也将会给世界造成分裂，会让有关的紧张局势更加复杂难解。今年5月，在英国《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的专访中，他再次谈到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强调美中两国必须学会共处。

1992年，时任《时代》（*Time*）周刊记者、后来的总编辑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发表了他的鸿篇巨著《基辛格传》（*Kissinger: A Biography*）。书里尖锐批评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取向已经有违民主和道德，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美国的利益。有好几年，基辛格都拒绝和艾萨克森说话。

2005年，艾萨克森为《基辛格传》的再版重写了序言。在过去的那几年里，美国接连打响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2005年美国的国际路线由于热衷于传播自由而被一种道德使命感和圣战激情所驱动，是到了可以多加一点谨慎、务实、现实主义、冷静、利益估算以及传统保守主义的时候了。”艾萨克森写道，“……今天，了解基辛格及其对全球力量动态的感知……一样有现实意义。”

成为基辛格：冷战之下

主笔·徐菁菁

当这个世界摆脱早期冷战的意识形态分歧，踏入多极化的新时代时，基辛格带着对“二战”记忆和均势欧洲的理解踏上外交舞台，成为“在恰当的时间处于恰当地方的恰当人物”。他多面、复杂的个性与波诡云谲的时代，深深地纠缠在一起，重塑了时代的秩序。

菲尔特的孩子

1973年9月22日，白宫东厅，近150位亲友和显贵目睹了基辛格就任国务卿的就职仪式。仪式上，基辛格的母亲保拉（Paula）笑容可掬。美籍华裔作家包柏漪问她为什么能做到不哭，她大笑道：“亨利不准我哭。”包柏漪回忆，现场的人多半泪水盈眶。当人们想到，35年前，为了逃离纳粹德国的暴政，一个15岁的犹太男孩和家人背井离乡来到美国，今日竟取得了如此成就时，难免动容。

但基辛格并不想过多地回顾自己的过去。就职仪式前，有朋友为他找到一本1801年在菲尔特（Fürth）发行的《圣经》。那个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小城是基辛格一家的故乡。但基辛格没有使用它。

对早年生活的态度是基辛格身上的一个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拒绝回忆自己在德国度过的童年和青少年岁月，在情感上表现得疏离和淡漠。上世纪40年代末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基辛格就从来不谈他的犹太背景。宿舍的同学夜晚闲聊时，他坚决反对以色列立国，认为这将激怒阿拉伯人，危及美国的利益。他的种种表现让一位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犹太同学感到：“基辛格青年时代遭遇的反犹之害大概比童年的我在新泽西经历的还少些。”后来好几次在不同的场合，基辛格都宣称，菲尔特的生活没有给他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想从他的出身寻找他政治生涯关键点的人是在白白浪费时间。

1975年12月，菲尔特授予基辛格杰出当地公民金奖。基辛格与父母一起应邀回菲尔特参加颁奖典礼。到场观礼者约有1000人。基辛格的致辞很简短，对当年促使他们举家逃离的恐怖经历避而不谈。当受邀重游他踢足球、研习



1973年9月22日，在基辛格就职国务卿的典礼上，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左）和他握手表示祝贺





1975年12月15日，基辛格偕妻子南希（左二）、母亲保拉（左四）和父亲路易斯（左六）一起应邀重返故乡德国小城菲尔特，在市政厅前合影

律法、遭希特勒青年团员修理的旧地时，他很礼貌地回绝了。

只有有限的几次，基辛格流露出不一样的态度和情感。在担任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有一次访问德国，德国政府宣布，基辛格可能会去探望他的一些亲戚。“他们胡说什么？”基辛格向随从们抱怨，“我的亲戚都在集中营被做成肥皂了。”在2007年的一次访谈中，他提道：“我的早期政治经历是作为被迫害犹太少数民族的一名成员所体会到的。”

1923年5月27日，星期天，海因茨·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inz Alfred Kissinger）（“亨

利”是基辛格移居美国后改的名字）出生在菲尔特这座闷而乏味的工业小城。在过去的400年里，这里一直是犹太人难得的庇护所。17世纪初，菲尔特就有了自己的拉比和犹太法典学院，还建立了首座犹太教堂。

亨利·基辛格的父亲路易斯·基辛格（Louis Kissinger）是一名勤勤恳恳的中学老师。他既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也对自己是个德国人的身份感到非常自豪。在学校里，他喜欢给学生介绍德国古典诗歌，如歌德的《鹰与鸽》、海涅的《如今去哪里》。1848年革命后，被流放的海涅在《如今去哪里》中自问：如果他在故乡德国面临死刑，

他该去哪里？那时，路易斯·基辛格没有想到，这会是他人生的预言。

长子海因茨·基辛格出生时，基辛格一家正在开始陷入困境。1923年4月，反犹杂志《先锋报》开始在纽伦堡出版，每周一期。每一期的头版头条都赫然印着一句话：“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菲尔特就在纽伦堡边上。1923年底，德国通胀率达182000000000%。

如果扣除通货膨胀的部分，像路易斯·基辛格这样的公务员，工资降幅为60%~70%。

海因茨·基辛格有过一段较为平静和正常的童年。他喜欢骑自行车，酷爱足球。菲尔特当地的足球队是1926年和1929年的德国冠军，这带给海因茨巨大的快乐。这种平静很快就被政治局势的变化打破。1933年国会纵火案后，3月菲尔特副市长宣布“巴伐利亚大清洗”开始，他说菲尔特是个犹太化的红色城市，“我们也要再次把它变成一个干净诚实的德国城市”。

1933年4月出台“恢复职业公共服务法”后，犹太公务员一律被开除公职。两年后，根据所谓的“纽伦堡系列法”，德国人不得与犹太人发生性关系、通婚，禁止犹太人雇用非犹太人为家佣，进而剥夺了犹太人的完全公民权。

在菲尔特，1933年8月酷暑时节，市政府禁止犹太人进入雷德尼茨河的公共洗浴区。第二年，市教育局强制规定公立学校中犹太学生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1.5%。后来，所有的学校都将“没有一个犹太学生”引以为豪。《菲尔特报》源源不断地刊登反犹文章。狂欢节上充斥着反犹彩车。1934年，菲尔特市不远的村庄爆发了暴力反犹事件，一个人被吊死，一人被刺身亡。

路易斯·基辛格好像坠入了噩梦。1933年还不到50岁的他就被强制退休了。亨利·基辛格的弟弟沃尔特后来回忆，父亲被开除后“沉默寡言，总待在书房里”。一家人的社会关系也被破坏。保拉发现：“我丈夫的同事，以前那些同事，对他完全不理不睬，就像没有这个人似的。”

基辛格不可能不受到这些巨变的影响。犹太孩子们不能去游泳池，不能去跳舞，不能去茶馆，到哪里都会看到“犹太人禁入”的牌子。在街上，

每天都有人谩骂、诋毁、侮辱犹太人。希特勒青年团几乎囊括了菲尔特所有的孩子，他们在街上列队高歌，穿着制服游行。德国孩子随意乱打犹太孩子，警察是不管的。几年后，基辛格第一次走在纽约街头，一群男生迎面走来，他赶紧逃到马路对面，免得挨揍，然后才想起来自己并不是在菲尔特。基辛格也不能光明正大地去支持他心爱的菲尔特足球队了。有时候，他会悄悄地溜去看比赛，但他知道，如果被认出来，肯定会被暴打一顿。

基辛格一家意识到，死亡的危险正在逼近。1933年6月，路易斯的弟弟卡尔·基辛格因为帮助岳父经营鞋店被捕，随后被送往达豪集中营，一年多才被妻子设法保释出来。1937年他们带着3个孩子移居巴勒斯坦。身边的朋友也开始力劝路易斯移民。

1938年8月20日，基辛格一家乘船转道伦敦探望亲友，10天后搭乘“法兰西岛号”前往美国。登陆纽约时，亨利时年15岁。不到三个月后，“水晶之夜”事件爆发，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拉开了序幕。基辛格估计，他的近亲中有20多人死于此后的7年的浩劫。后来，一些研究者扩大了这个数字，有的调查说是23人，有的说是57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和基辛格曾经很亲密。小时候，继外祖母给了基辛格很多温暖，一家搬到纽约后还经常收到她寄来的明信片。后来老人家被送到了贝尔泽克死亡营，死亡营解散后，死在前往西部强行军的路上。

二等兵

来纽约的8个月后，基辛格在一封给朋友的书信里描述自己的状态，他感到自己变成了一个怀疑论者，没有什么清晰的目标。“与其说我在追求一个长远的理想，不如说我想寻找一个长远的理想”。

在纽约的头几年，像所有的新移民一样，基辛格生活的核心是谋生计。父亲路易斯身体不好，情绪低落，适应新的国家颇为吃力，一家人都靠母亲到餐馆当服务员吃饭。作为长子，基辛格一

边读书，一边打工。1940年，为了打份整工，他改为夜晚上学。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在一家远亲办的工厂里，基辛格把用獾毛制成的修面刷中的酸性物质挤出来，每周能赚到11美元。每天下班，他从工厂坐45分钟地铁回到家，匆匆吃过晚饭，赶到学校上三个小时的晚课。后来，基辛格进入纽约城市大学念书。他学习成绩很好，几乎门门优秀。不出意外，他会毕业，成为一名会计。

然而历史再一次改变了基辛格的人生进程。1941年12月7日，基辛格去现场观看了纽约巨人队和布鲁克林道奇队的比赛。散场出来，他看到一份报纸，头版新闻是：珍珠港遭袭。很快，刚满19岁的基辛格接到了入伍通知书。

参军头两年，因为成绩好，基辛格被军方送到一所名为拉斐特的文理学院学习工程学。1943年底，美国需要在前线增兵，基辛格又被送到路易斯安那州的克莱本营。年轻的新兵们训练游泳，也学习跳伞。有时候要急行军，“行军9英里，时间为一小时多一点”；有时候要“徒步行军25英里，背着装得满满的背包”。那时“水都有配额”，每人全天只有一壶水。还要在有蛇出没的沼泽地搭帐篷露营。

军旅生涯对基辛格来说意义非凡。他喜欢身处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们当中。他后来回忆，“当兵的一大收获就是感到自己像个美国人”。这个会计专业大学生的视野也被打开了。那时候，他担任连队教导员，每周负责给士兵们讲一次“战争当前的形势”。伙伴回忆，基辛格能够把每天、每周的各种新闻搜集起来，但凡当中有矛盾的地方、叫人看不懂的地方，他都会跟大家讲自己是如何理解的，“讲过之后我们每个人……就会对第二天要发生的事多一点儿把握……我们都说基辛格是唯一比《时代》周刊眼光长远的人……”

军旅生涯还将基辛格重新送回了德国，让他有机会重新审视那个他曾经拼命逃离的噩梦。

在欧洲，基辛格见识到了真正的战争。1944年12月，德国的最后一搏——阿登战役打响。基辛格所在的第84步兵师被逼退到比利时一侧。第84师书记员回忆，天气“寒冷、潮湿、灰蒙蒙的，路上都是烂泥……一连几个星期不停地轰炸，重

型机枪不停地扫射，卡车和坦克在路上碾轧，路面的泥坑越发深陷……泥水渗进鞋子、袜子，弄得你满脚都是泥。因为这些泥巴和脏水，战壕变成黏糊糊、滑腻腻、臭烘烘的牢房。泥水爬进你的头发、食物、牙齿、衣服，甚至你的脑海中”。不少人生了战壕足（注：由于双下肢长期静止暴露于寒冷、潮湿环境中，局部血液循环障碍引起的一种非冻伤性组织损伤）和冻疮，严重的话甚至要截肢。

除了寒冷和潮湿，战士们也缺少吃的。在第一封家书中，基辛格乞求父母不但要给他寄一条更换的围巾，还要寄“一些肉罐头、曲奇饼干和糖果”：“你们知道吧，我实在饿得慌。”

基辛格所在的第335团第2营有近9%的士兵阵亡或受伤后不治身亡。他所在的连队伤亡率特别高。连队原有182人，21人阵亡，40人受伤，1人被俘，损失超过1/3。

对于基辛格来说，让他印象更深的可能是直面人性的复杂。到欧洲后不久，1945年2月，他就被调到步兵师总部的情报处，开始负责团部的反谍报小组。该小组主要任务是预防间谍和蓄意破坏，次要任务是解散纳粹党、逮捕高级军官，对指定人员进行审讯、阻止纳粹分子进入行政部门。从往来的人群中辨认出狂热纳粹分子并非易事。年轻的基辛格还需要学会如何区分少数的主动行凶者和仅仅因为一些恶意或冷漠而助纣为虐、害死犹太人的大多数德国人。

基辛格的心情非常复杂。有时候他觉得很解恨：“德国人现在尝到流亡、被迫离开心爱的地方的滋味了。”有时候他又满怀恻隐之心，看着那些因为不可靠而要被撤走的德国人，“一手拎着行李箱，一手握着手绢，与亲友分离”，他觉得，“你再怎么恨德国人也会觉得他们很可怜”。他还被一封德国女孩的信打动过。这封信是写给她牺牲男友的战友的。基辛格觉得，她写下的每个字都“直愣愣地盯着我”。

他的内心也在经历拷问。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基辛格意识到，他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报复权力，可以逮捕任何人，把他们投进集中营。事实上，他的父母主张报复。但基辛格没有这样做。



上图：1941年波兰华沙的犹太人隔离区，路人对倒在街上的男子漠然以对



下图：德国达豪集中营发现的犹太人尸体。在随美军解放德国的过程中，亲眼目睹集中营，震动了基辛格的内心

在德国，他自称“亨利先生”，“不想让德国人以为犹太人是回来报仇的”。一位陆军同事后来回忆，有一次，有几位犹太难民翻译官对一对德国夫妇出言不逊。“亨利质问他们：‘你们在纳粹下生活过，也知道他们怎么辱骂人，怎么能转过身来跟他们一样？’”

但没有一件事会比亲眼目睹集中营带给基辛格的震撼更大。4月10日，他和第84师战友偶然发现了阿勒姆集中营。基辛格多年来对这件事避而不谈。直到他的一位战友公开发表当天拍摄的照片，人们才知道基辛格当时也在场。他这才承认，见证阿勒姆是“我一生中最恐怖的经历之一”。

阿勒姆在汉诺威以西5英里的地方，是一个小型集中营，囚犯们被迫在附近的采石场干活。1945年1月，最初送去的850名犹太囚犯死了204人。美军到达集中营的前4天，这里的指挥官命令将有行动能力的囚犯押往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这是纳粹政权末期的一次著名的“死亡行军”。

基辛格和战友们到达的时候，营地外是一堆堆瘦骨伶仃的尸体，有些被装在垃圾桶里，有些被扔在坑里。附近的一个大规模的坟墓里还埋有将近750具尸骨。集中营的营房内空间狭窄，美军士兵们从两排木床中间走过去都很困难。地上满是人体排泄物和呕吐物。每一张床的草垫都散发出刺鼻的尿味。那些因为没有行动能力、逃过“死亡行军”的男人和男孩“满身虱子和病痛”，只剩一息尚存。有战友阻拦基辛格进入营房：“别进去。我们要用脚踢一踢才能分清谁死谁活。”士兵们本能地给幸存者东西吃，结果一些人因为再也无法消化固体，反而丢了性命。

此刻，尽管这支部队已经经历过6个月的残酷血战，但阿勒姆还是在情感和理智上全面击碎了他们。很多人哭了。不久以后，基辛格亲笔写下了两页充满刻骨之痛的手稿。他记录了他从吉普车下来遇到的第一个集中营幸存者。佛乐克·撒玛瘦骨嶙峋，“衣料好似挂在躯体上，头由一根细棍支撑着，看不到喉咙。两根杆子从身子两侧垂下来，两条腿支在下面。为了防止逃跑，他的双脚被砸烂了。他看上去像40岁，但出生证明明白

白写着16岁”。

“我看到营房，看到一张张毫无表情的脸，一双双目光呆滞的眼睛。”基辛格写道，他痛苦地问自己，“你现在自由了——我身着笔挺的军服，没住过污秽、肮脏的地方，没被人打过，没被人踢过。我能给别人什么样的自由？”在文章的末尾，他几乎是在呐喊：“佛乐克·撒玛，你的身体在无声地控诉着人性……人的尊严和客观价值在这道带刺的铁丝网上止步了。”

1947年，从奥斯维辛幸存的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出版了第一部回忆奥斯维辛经历的作品《这是不是个人》。他在书中振聋发聩地悲鸣：“最优秀的人都在集中营里丧命，最糟糕的人却幸存了下来。”

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年仅22岁的基辛格已经认识到了这个令人绝望的残酷事实。在写给一位亲属的信件里，他说，美国人养尊处优，习惯用理想主义的眼光看待周围的所有事物，因此他们对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存在着完全错误的认知。事实上，“那里环境龌龊，做人低三下四、受人胁迫，一个人必须在体格上、求生的意志上具备超乎寻常的力量才能活下来。知识分子、理想主义者和清高的人没有机会……然而一旦决定要活下去，就必须咬定唯一的目标坚持到底……这个唯一的目标在公认的价值观面前也不会停滞，它无视一般的道德标准。一个人要活下去就必须说假话，玩手段，想办法弄到吃的填饱肚子。弱者和老者没有机会”。

政治序曲

1947年7月，基辛格启程自德返美。在军中，他受到战后成为美军参谋总长的欧洲政治顾问弗里茨·克雷默（Fritz G. A. Kraemer）的赏识，克雷默建议他再念点儿书，并为他写了封充满溢美之词的推荐信。1947年秋季，24岁的基辛格进入哈佛大学政治系念大二。

此时的基辛格，已经不再是那个计划当会计的年轻人。1945年5月，离他22岁生日还有几天的时候，基辛格终于回到童年生活的菲尔特。

在一封洋洋洒洒 10 页纸的手书家信里，他谈到重返故地的感受：“过去 13 年的仇恨和惶恐，这段回忆之路何其漫长、艰难，全是道不完的羞辱、说不尽的失望……我想到那些和善的老人，想到曾经在林子里漫步，想到当时的一切，想到如果一切没有发生。有那么一刻，山谷又因昔日人物的出现而充满生机，人一个没少，然后幻觉逐渐退去……”基辛格写道，“从山丘上俯瞰纽伦堡，我向我的青年时代告别。”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德国归来的基辛格在心理上变成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不信任民主和道德的力量。1954 年 3 月，基辛格在一封信里探讨美国兴起的麦卡锡主义，他提到，“希特勒上台 6 年后，一些优秀的德国人才意识到治理国家的竟是一个罪犯，原来他们还因为这个国家崇尚道德而感到很骄傲……”

他拒绝软弱。基辛格从没有解释过他为什么总是回避对外界谈起作为犹太难民和“二战”士兵的经历，但他曾说，集中营的幸存者不回顾过去，“他们深知回顾过去只会带来感伤，感伤就是软弱，软弱就意味着死亡”。

他对人性也感到悲观。他对集中营受害者的描述，其实也是对自己的写照：“他们看到过人性最恶毒的一面，谁还能怪罪他们猜疑心重？”

在哈佛，基辛格不交朋友，不追求女孩，不注意自己的衣着，对学校的体育运动也基本上不关心，他几乎把所有的劲头花在了苦读上。室友回忆，基辛格每天读书读到凌晨一两点。他总是“非常严肃……坐在一张又厚又软的椅子上……从早学到晚，一边学一边咬指甲，指甲咬掉了就咬下面的肉，后来都咬出血了”。

从本科到博士，基辛格交出了两篇重量级论文。本科毕业论文《历史的真义——关于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的感想》将近 400 页，创下了哈佛历史上的纪录。基辛格选择重点讨论的问题是历史决定论和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基本矛盾。他悲观地承认：“生命即痛苦，有诞生就有死亡。存在的命运就是瞬息即逝。”但他也相信个人意志和“内在信念”：“经历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西伯利亚劳改营的这一代人不可能像他们的先祖那样乐

观”，但“自由的经验能使我们超越过去的痛苦和历史上的挫折”。

基辛格想要超越的痛苦和挫折显而易见：世界并没有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和平。美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让多数人都认为，大规模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所难免，那可能是一场核战争。

4 年后，基辛格交出了博士论文《和平、合法与平衡：卡斯尔雷与梅特涅政治才能研究》。他回溯 200 年前的欧洲均势外交，给出了自己对现实政治的答案。这篇论文被视为基辛格本人政治生涯的序曲。论文中，拿破仑的法国与斯大林的苏联，1815 年的英国与 1950 年的美国，有着不言而喻的类比关系。“在面临热核武器灭绝威胁的时代，我们抚今思昔，研究那些外交不会带来严厉惩罚、战争鲜有发生、简直无法想象会有灾难存在的历史时期，这不足为怪。”基辛格这样解释他对 19 世纪欧洲的兴趣，“它也许没有满足理想主义一代的所有愿望，却给了这代人或许最宝贵的东西，即一段稳定的时期，让他们实现自己愿望的时候没有大战，没有长久的革命。”

在论文里，基辛格表达了他对和平的理解。这个理解成为他外交生涯的基本理念。他说，和平不应当是刻意追求的目标，“那些回忆起来最为和平的年代很少追求和平。那些无休止追求和平的年代反而很少得到安宁。当避免战争成为一个强权或一组强权追求的首要目标时，国际体系就处于国际社会中最为核心的成员的摆布之下”。这个判断显然不只来自 19 世纪的欧洲——在基辛格看来，在 1938 年的慕尼黑会议上，希特勒正是从英法两国极力想要避免战争的态度中看到了他们的软弱，才有恃无恐地发动了战争。

基辛格得出的结论是：和平只不过是秩序的自然产物而已，对和平的追求只能在一个持久稳定的国际秩序之下才能得到保障，而维护这种秩序要靠权力分配来控制一些强国野心。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德国归来的基辛格在心理上变成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不信任民主和道德的力量。

敏锐的蜘蛛

1968年底,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当选美国总统。他向在哈佛大学任教,并长期担任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Aldrich Rockefeller)顾问的基辛格发出了邀请,让他担任自己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基辛格终于走到了美国外交的决策核心,将他作为学者的理念诉诸现实。但这是一份艰苦的差事。4年后,1972年12月,尼克松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那天,基辛格写了一张条子放在尼克松的枕头上:“你接过的是一个分裂的、陷于战争泥淖、失去自信、被那些没有信念的知识分子撕裂的国家,你给了它新的目的和理想,克服了它的犹豫,你必将因此青史留名。”

这话语固然是阿谀奉承,但也道出了一些实情。1969年,新政府接手的是极其混乱的局面。过去一年对美国来说是灾难性的。越南战争已经打到了第九年。1968年初,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了新年攻势。接着,越南顺化陷入了血腥巷战。4月,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刺杀,一些非裔美国青年责备这是政府阴谋,上街游行,引发新的种族骚乱。学生反越战的抗议也席卷了美国各地高校。在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外面的街头巷尾,警察和结束越战全国协调委员会等组织领导的抗议者之间展开了激战。

更让美国人感到不安的,是在与苏联的对抗中,美国似乎正在走向下风:1950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相当于美国的30%,1970年已经达到了美国的80%;军事上,苏联不仅在战略力量上赶超美国,而且在常规武器方面也与美国不分上下。1968年苏联推翻了杜布切克的修正主义政府。美国大使在危地马拉市街上遭枪杀。

1968年,在帮助洛克菲勒备选的过程中,作为顾问的基辛格提出他对时局的看法:美国所面临的困境,基于过去冷战策略采取的行动,已经超出了其实力范围,越南战场就是证明。

在基辛格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二战”后的历届美国政府将反共这一意识形态作为了行动的标准,将外交政策视为善与恶的

斗争,反倒丧失了对国家利益的精确考量。政治家们必须务实:“每一个政治家必须在公正的和可能实现的东西之间进行调和。被认为是公正的东西取决于本国内部结构;被认为可能实现的东西取决于资源、地理位置和决心以及他国的资源、决心和内部结构。”“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

摆在新政府面前的任务很明确。要扭转颓势,当务之急有两点:不堪重负的美国必须从漫长的越战中解脱出来;也必须找到方法在对苏关系中建立新的秩序,使其行为能够被约束和控制。

基辛格想到的点子,是把曾代表约翰逊政府参与巴黎谈判的民主党政治家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秘密派往莫斯科,提出一个关于越南和军控的一揽子交易。基辛格亮出的底线远远超过美国当时的立场。万斯告诉克里姆林宫,美国愿意立即停火,美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部队双双撤军,并提出一个政治解决方案,包括容许民族解放阵线参与南方治理。如果和平方案不能达成,美方将采取强硬军事措施,同时苏美关系也将趋冷。

万斯之行失败了。事实上,1969年,基辛格曾不下10次请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传话给克里姆林宫,要求其在越南问题上合作。每一次,多勃雷宁都躲躲闪闪。

直接和越南的接触也未能有所建树。1970年,基辛格与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举行了三次周末会晤。在准备与黎德寿的第一次会晤前,基辛格在他的小办公室来回踱步,练习他要说的话:“我们两人都是学者,有敏锐的历史感。”会面时,基辛格试图发挥他的魅力,建立个人关系,他不时讲个笑话、吹捧对方、自嘲、以史喻事。黎德寿很客气,基辛格说笑话他也笑,有时还会捧腹大笑。

但很快,基辛格就明白这是行不通的。为了实现从越南的撤军,尼克松上台后,实行“越南化”政策,要求南越政府进行改革,重整军队,承担更多的责任。黎德寿看穿了白宫的弱点,他问基辛格:“如果美国派了50万大军都赢不了,让你的傀儡军队打仗能行吗?”基辛格事后承认,这也是“一直折磨着我”的问题。

《基辛格传》(Kissinger: A Biography)的



基辛格和周恩来总理在一场宴会上。凭借独特的行事方式和果敢自信，20世纪70年代初，基辛格迅速打开了中美外交的局面

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评价基辛格，他的才华的核心“就是他能看到不同事件之间的联系”。艾萨克森有个精妙的比喻：“就像蜘蛛网上的蜘蛛，他能感觉——有时过于敏锐地感觉到——世界上某一个角落的一个行动会在别处引起什么反响，在一个地区使用权力会如何波及其他地区。”

世人已经非常熟悉基辛格接下来采取的行动：为破解这场迷局，基辛格和尼克松把橄榄枝抛向了中国。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因为他的破冰之旅，基辛格一直被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中国民间也拥有经久不衰的声望。基辛格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其实，他有时对中国人的这种真诚好客、对友谊的执着感到很困惑。基辛格并不讳言自己的现实主义取向。他并不是始终如一的友好使者，他的对中政策偏好，并不掺杂感情。

1969年7月31日，国务卿罗杰斯在东京公开表示：“我们愿意改善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几天后，在堪培拉做演讲时，他承认中国已是一个事实，是一个潜在的强国，但却被孤立于世界太久了。

在中国，最高领导层也看到了中美之间的可能性。1969年，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担心苏联会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为了避免美苏两线作战，也在考虑与美国缓和关系。

但两国的接触，从心理上的意愿到现实中的行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朝鲜半岛的兵戎相见和两次台海危机，使得中美两国一度处于全面对抗状态。历届美国政府都将中国视为严重的威胁。

在这种背景下，中美之间极度缺乏互信，很难对对方的意图做出判断。因此，间杂着从60年代末开始，双方发出的积极信号，对抗的声音也



1974年6月30日，美苏莫斯科峰会期间，美国总统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两国经济合作协议上签字。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站在尼克松侧后方。勃列日涅夫身后是苏联总理柯西金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

没有停歇。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他在就职典礼的讲话中隐隐约约提到，美国的新政府愿意同中国对话，要让所有各国知道，美国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不应生活在愤怒的被孤立中。新华社第二天就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宣布尼克松只不过是一个独裁的资本主义集团选出来的一个新的傀儡，来执行侵略和扩张政策。

这种僵局给了基辛格用武之地。他不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外交家。他不遵从美国既有的官僚体系规则和外交程序。在尼克松的支持下，他隐秘的行事风格最大限度地规避了国内异议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而且，基辛格极度大胆和自信。在他的回忆录中，基辛格宣称，1971年7月9日至11日到访北京的时候，他只是在同周恩来的“第一次会

晤中简略地”谈及台湾问题。他撒了谎。后来解密的基辛格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显示，就在访问的第一天，在双方试图建立对对方立场的基本了解时，基辛格就表示，华盛顿准备在越南战争结束后从台湾撤出三分之二的美国军事力量，并准备随着中美关系的持续改善继续从台湾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基辛格还同美国国务院在几个月前刚刚所作的关于台湾“地位未定”的声明大唱反调，向周恩来明确表示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

就在基辛格访问中国前不久，被蒙在鼓里的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报告中说，他们认识到，要缓和中美关系，台湾问题是美国政府必须解决的痼疾。报告中写道，可以向中国政府提出，随着美国从越南的撤军，将逐步减少驻台美军数量；在提请政府内各部门慎重评估后，“也可向中国暗示，

美国愿意将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个提议在当时已经非常大胆。

基辛格的表态，远远超过了国务院政策设计的范围和立法机构国会在当时所允许的底线。基辛格在外交谈判中有一个惯常的态度。他不喜欢一点一点地谈条件。他认为这样的谈判方式，只会显得软弱，让对方好奇自己还可以放弃什么。他青睐的做法，是以强硬的态度，直接摊开底线。在台湾问题上，他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后来，他曾一再表明他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不是所谓“亲大陆”，而只是因为台湾太小了，美国人必须顾及中国崛起的重大问题，不能因小失大。

基辛格的冒险换取了立竿见影的回报。莫斯科的领导层着实被尼克松和基辛格访问中国的举动震惊了。时任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回忆，他的政府当时“甚至都认为不存在华盛顿和北京和好的可能性”。之前，苏联方面对尼克松关于举行莫斯科峰会的提议迟迟不做决定。就在尼克松电视讲话，宣布自己将要访华后，星期一，多勃雷宁就满脸堆笑地出现在白宫，询问是否有可能先举行一个莫斯科峰会。基辛格告诉他，需要按照顺序安排。

1972年，比北京首脑会晚3个月，莫斯科峰会举行。两个超级大国谈妥了第一个缩减未来核武库扩张的条约，并达成了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部署的协定。这些协议标志着无约束军备竞赛时代的终结。基辛格同苏方还一同起草了一份“基本原则”，它包括超级大国间相互磋商，尊重国家主权，通过贸易和民间的交流增加联系。莫斯科峰会开始了一段美苏在武器控制、经济和危机管理问题上相互协调的时期。从那以后，峰会也成为美苏事务上常用的手段，它可以发挥微妙的克制作用，使两国关系不至于失控。

在克里姆林宫的圣弗拉基米尔大厅，尼克松用一支银色的派克牌钢笔签署协议。他把这支笔悄悄地插入口袋，赠送给了基辛格。

“权臣”

在1972年的胜利之后，基辛格成了1973年

美国最受欢迎的人物。他在个人权力上也登峰造极。在外交决策中备受排挤和冷落的威廉·罗杰斯辞去了国务卿一职。基辛格干脆兼任了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两个职位。这是美国历史上前无古人、迨今后无来者的事。事实上，人们觉得，真正领导美国政府的可能不是尼克松。1972年底，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是：“想想吧，要是基辛格死了会怎么样。尼克松就成美国总统了！”

作为一个外交官，基辛格的影响力既来自他的非凡洞察力和行动力，也是他的个性与机遇碰撞的结果。

尼克松从来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他本人极度不善于社交，会见陌生人时需要在便签纸上提前做好笔记。和他熟悉的人也觉得他为人生硬，不好相处。在华盛顿，人们公认基辛格最懂得如何与总统打交道。基辛格看到了尼克松内在的性格矛盾：“一方面他有理想，善思考，慷慨大度；另一方面，他睚眦必报，心胸狭窄，感情用事。他有时爱沉思、达观、坚忍，有时又鲁莽、冲动、捉摸不定。”他也很清楚尼克松缺乏安全感的弱点。

基辛格对尼克松几乎是谄媚的。在1971年4月尼克松发表越南讲话前，基辛格给他写了一张纸条：“不论结果如何，各地自由人士都将感激您。面对危机，您沉着应对；面对压力，您坚定不移。是您稳住了民心民情。为您服务让我获益良多。”落款是：“忠仆，H。”

基辛格在内心里并不是那么认同尼克松。当时担任尼克松国际经济事务助理的彼得·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说，私下里，基辛格对尼克松贬低再三，但如果总统那头电话突然来了。他立刻会变得判若两人——“噢，是，总统先生！”他一遍又一遍地说。

基辛格完全清楚自己的表现。有一回，他与总统的专线响起时正好有一位记者在场。基辛格毫不介意地对记者调侃道：“如果我接电话时双膝跪地，你可别有什么误会。”

他也能忍耐尼克松的侮辱。尼克松会在基辛格面前大谈犹太叛徒，有一次他还逗基辛格：“你说是不是，亨利？你同意吗？”窘迫的基辛格并

不反驳：“总统先生，有这样的犹太人，也有那样的犹太人。”

对于基辛格来说，所有的虚与委蛇都是值得付出的成本，尼克松有一个别人无可替代的优点。

1968年11月25日，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很快就约基辛格在皮埃尔酒店39层总统过渡办公室见面。

关于这场见面，尼克松说，他们主要谈了战略，还谈到了中国问题。他告诉基辛格，他们两个人在总的看法上很相似。在谈话里，他对基辛格有一种很强的直觉，暗暗决定就应该让他来当国家安全顾问。

“当选总统，他没有谈战略。”基辛格对这次会面的回忆则完全不同，他的记忆几乎都是关于尼克松个人的。他注意到，尼克松很腼腆，举止有点儿令人捉摸不透。最重要的，他对国务院没什么信心，工作人员根本不忠实于他，他决定让白宫来负责外交政策。

在尼克松的支持下，基辛格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成立了许多附属国安会的下属机构。前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1968年的预算是70万美元。1971年基辛格的预算是220万美元。他手下的人员也几乎翻了一番，共有46位助理，105位行政人员。众多机构的设立和决策程序的规定，使得几乎所有的外交事务被转移到了国家安全委员。

尼克松和基辛格另一个共同的偏好：他们都无意于尊重外交决策的民主程序。上任后不久，尼克松就感到国安会全体人员会议太麻烦了，因为在会上，他的观点可能遭到国务卿罗杰斯和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Laird）的反对。于是，总统决定减少会议的召开频率，更多的事情由他和基辛格私下讨论处理，不再拿到会上讨论。

后来，召开国安会会议变成了走形式。尼克松宣布开会，并说明会议主题，然后就由基辛格提出要谈的问题。基辛格的幕僚还给尼克松准备“谈话要点”。他们会事先预料莱尔德或罗杰斯会说什么，并给总统准备好抵挡他们反对意见的说辞。尼克松小心翼翼地照着讲稿走，并按顺序在

每个方格中签字确认。

除此之外，他们都喜欢秘密外交。美国外交有一条基本规则，所有与外国政府的官方接触都通过国务院渠道，连总统特使进行的谈判也不例外。这样做是为了让相关机构贡献所长，提出异议。

然而才上任几周，基辛格就开始与苏联建立背后渠道。在苏联大使馆的一次宴会上，一位官员找到他说，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大使患了感冒正在楼上的公寓休息，希望基辛格能上去与他见个面。多勃雷宁热情地和基辛格寒暄，并请他帮自己约见尼克松。

基辛格后来说，尼克松不想让国务卿罗杰斯参加会见，但据尼克松回忆，是基辛格不想让罗杰斯参加。更可能的情况是，总统和他的权臣一拍即合。在见面会上，尼克松告诉多勃雷宁，任何敏感问题他都应该与基辛格私下讨论而不是与国务院谈。于是，多勃雷宁通常一周来访白宫一次，他会走鲜为人知的白宫东楼的一道门，与基辛格就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当年策划战争谋略的地图室见面。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基辛格是独断的上司。他不允许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白宫餐厅用餐，因为他不想让他手下的人与白宫其他部门的人拉帮结派。他要求他的幕僚不可与政府其他部门的要员谈话，也不允许他们直接与总统讨论其专职领域问题，除极少数情况，他们甚至不能和他一起会见总统。

他的管理风格以脾气火爆著称。“为什么我就这么倒霉碰上了这么无能的人！”他总是怒吼着将工作人员准备的备忘录扔在地上，还在上面踩踏一番。

尽管如此，基辛格的多面性，还是能让人们心甘情愿为他工作。他的法宝之一是自嘲精神，他知道需要用幽默压低自己的气焰。有一次，在有了一间更宽敞的办公室后，他这样嘲笑自己的坏脾气：每次生气，他都得走老远才能走到门口把门推开，以至于他有时都忘了自己生的是什么气。

对于属下来说，他还有一种在华盛顿罕见的优点。他的助理都发现，他乐于征求幕僚中最善

于思考的人的意见，非常欢迎他们挑战自己的观点，施展才华。他还保留了一个严格的老教授的做派，总是激励手下精益求精。一位下属记得，有一次基辛格半夜给他打电话：“我看了你的初稿。乙上，离甲下就一步之遥了。”

白宫的终章

1969年轰炸柬埔寨后，为了打掉人们的疑虑，基辛格与学生、抗议者和知名反战活跃人士开始了一个小型、非公开的会晤计划。他对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到1971年初，他已经与学生团体开了19次会，与知识分子、学界人士开了29次会，与知名公众人物开了30次会。

1970年，27岁的反战主义者布莱恩·麦克唐纳（Brian MacDonald）坐在白宫前面开始了绝食37天的抗议行动。通过一位朋友，基辛格联系上了麦克唐纳。在没有告知白宫的情况下，他去了麦克唐纳家，向他保证，美国已决定离开柬埔寨，并成功地劝他结束绝食。

很快，基辛格又请麦克唐纳和对方妻子到一家法国小餐馆吃饭，和他谈读书，谈哲学，谈战争，谈裁军。“布莱恩，你实在太天真了！”基辛格一度一边摇头一边叫道。基辛格后来回忆，他很喜欢麦克唐纳，他的为人和他的反战主张一样一派纯真。

此后，基辛格经常与麦克唐纳见面，辩论越战，偶尔也讨论黑格尔和康德现象学。那年晚些时候，麦克唐纳的妻子艾丽丝在费城贫民窟不幸遇害身亡，基辛格还不声张地出席了葬礼。见证了两人交往的华裔作家包柏漪认为，和布莱恩的交往是说明基辛格多么想得到批评者了解的一个绝佳例证。“他争取对方的愿望强烈得惊人，我想这与他是移民、做过难民有关，总想赢得别人的支持。”

这种解读或许并不正确。大约在见到麦克唐纳一年后，曾有人试图绑架基辛格。被定罪的有13人。私下，在未通知特工或司法部的情况下，基辛格在白宫战情室与3个密谋绑架的人见了面。坐在一幅覆盖一整面墙的世界地图前面，基辛格详细解释了自己的观念。他还收下了他们带来的

礼物——写着“绑架基辛格”字样的几个徽章。他开玩笑地说，他可以把它们转卖给其他白宫幕僚。“可怕的是，他还真是个好人的回忆，”其中一位名叫汤姆·戴维森（Tom Davidson）的回忆，“他对我们这群从道义角度看问题的人好像有一种奇怪的感情。”

1974年8月8日，深陷“水门事件”中的尼克松告诉基辛格，他会在第二天辞去总统的职位。那天晚上基辛格在白宫陪伴了尼克松。他极力安慰他，和他回顾他们的外交政策上的成就，他一直强调，每一次都是因为尼克松在关键时刻做出勇敢的有魄力的决定才取得了胜利。尼克松想起一瓶拿破仑干邑。几年前在收到周恩来邀请函的那天，他们就是用它举杯共庆。尼克松穿过没有开灯的走廊，找到那瓶酒。他斟满两个杯子，两人再一次互相敬酒。他们还谈到历史的论定。基辛格对尼克松说：“历史会比你的同时代人更肯定你。”尼克松沮丧地回答：“那要看是谁写历史。”

“水门事件”淹没了尼克松政府时，基辛格成为“遭难的理查德·尼克松政府废墟里仅存的重量级人物”。基辛格跟“水门事件”的关系是间接的。他没有参与入室盗窃行动或其后的捂盖子行为。在“水门事件”关键时期，他都正忙于奔波海外。1972年5月27日第一次入室盗窃失败时，基辛格正在出席莫斯科峰会。6月16日窃贼成功入室时，他正飞往中国与周恩来总理会谈。当“深喉”和其他人在1972年10月大量揭秘时，基辛格正在越南谈判最后冲刺阶段中穿梭于巴黎和西贡之间。当尼克松在1974年4月24日释放白宫录音带时，基辛格正在日内瓦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会谈。

表面上，基辛格得以全身而退。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Gerald Rudolph Ford）接任总统之后，基辛格还在继续当他的国务卿。但真正属于外交家基辛格的时代已经开始远去了。■

（参考资料：《基辛格：理想主义者》，[英] 尼尔·弗格森，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基辛格传》，[美] 沃尔特·艾萨克森，中信出版社，2023年；《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美] 亨利·基辛格，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

中美关系 需要下一个“基辛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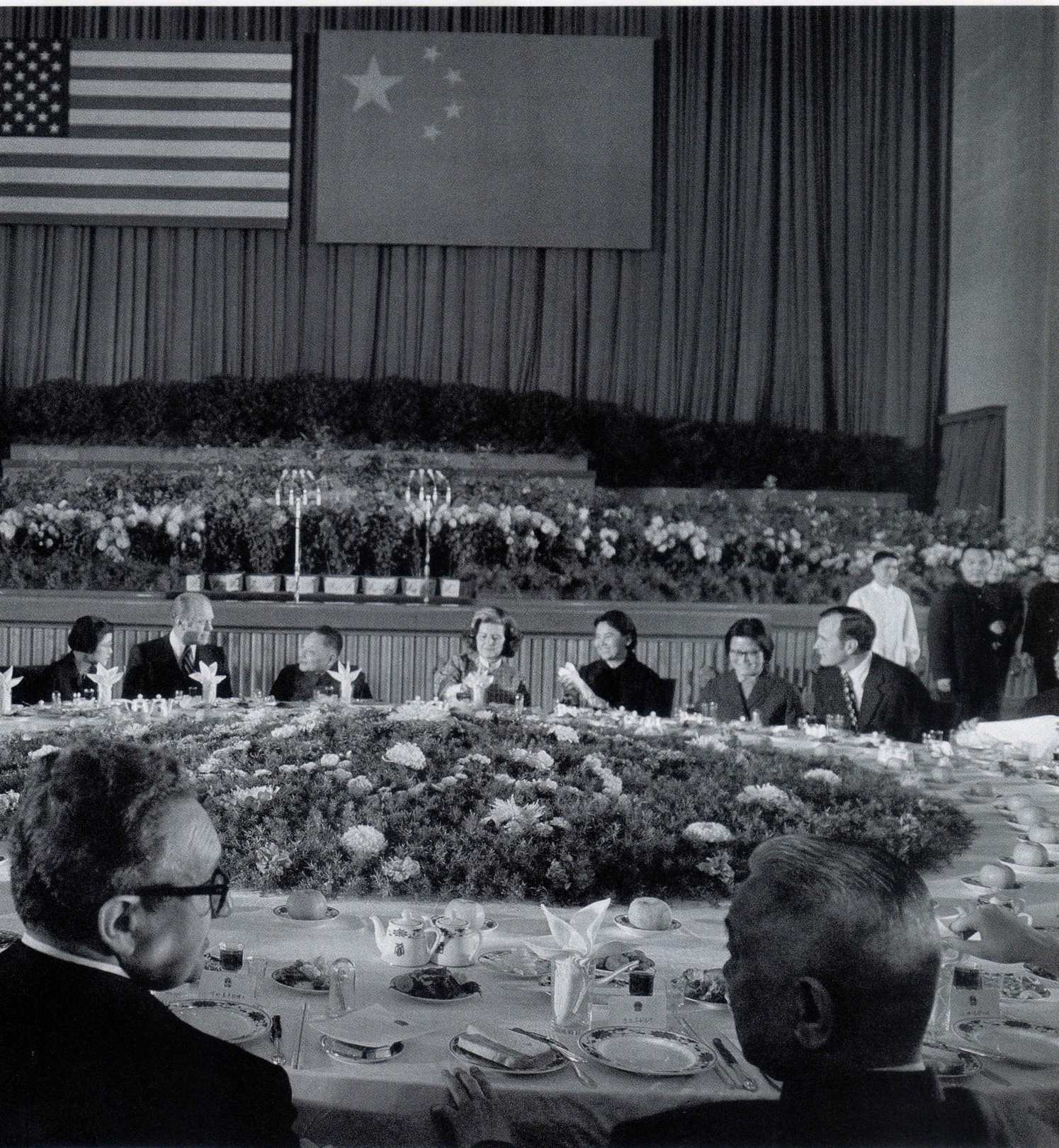
主笔·张从志

1971年7月9日开启的秘密访华之旅，让基辛格的人生后半段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到今天，已经过了50多年的漫长岁月。他被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熟悉中国政治话语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意涵丰富的称号。也正因此，1977年离开白宫后，基辛格在中美之间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每当中美关系出现重大转折，他的身影就会频繁地出现于两国之间，即使他已经是个百岁老人。

如今，斯人已逝，我们该如何重新看待基辛格所开创的那段历史？它在今天投射下了什么？今年12月7日，本刊专访了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长聘教授、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陈琪。他长期致力于中美关系的研究，与基辛格本人也进行过面对面的交流。他认为，我们今天谈论基辛格，不只是追忆历史，更重要的是面向未来，要在中美关系再塑造进程中找到下一个“基辛格”。



1975年，基辛格与美国总统福特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宴会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一个历史定位

三联生活周刊：你与基辛格有过什么交集？

陈琪：我们年龄差太远，个人层面没什么特别的私下交往，但在不同的集体活动上见过。第一次是在1998年，我的导师薛谋洪教授请他来清华大学演讲，当时我还在读博士，和师长们一起跟他在小范围里聊了聊。那时候他身体还不错，精力充沛。后来我在中美两边也听过几次他的演讲。前几年，他还带着一些跟人工智能有关的问题到中国来，傅莹大使组织我们的研究团队一起准备了一些讨论材料。最近一次就是今年10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和美国的美中关系委员会共同举行了一场人文交流研讨会，客观上也是为中方领导人访美在两国民间烘托一下氛围。10月24日在纽约举行的美中关系委员会年会晚宴上有一个环节是给基辛格颁奖，以表彰他为中美关系发展所作的贡献。那天晚上，他还亲自出席并讲了几句话。第二天，我们中方一行人又去他办公室拜访，跟他谈了大概40分钟，老先生的精力当时已经不太行了，因为前段时间摔过跤，手上还打着膏药，每讲个5分钟左右就会打个盹，然后助手会敲一下茶杯弄出点声响来提醒他。

三联生活周刊：他那时候还会关心哪些话题？

陈琪：我们首先谈的还是中美关系，特别是台湾问题。他谈到，两国领导人接下来在旧金山会晤，应该怎么进一步来改善中美关系。他担心美国长期奉行的对台战略模糊政策越来越无法满足稳定台海局势的需要了，中美应在新的形势下创造性地谈出第四个联合公报，从而根本性地消除中美之间的战争危机和风险。然后又谈了发生在中东的冲突，他认为中东地区是中美两国能够发挥国际领导力的一个合适场所，如果能帮助化解当下的巴以冲突，中美显示出合作意愿，对越来越分化和动荡的世界秩序的稳定很有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说明他还是在关心外界的局势？

陈琪：是的，他还是在阅读、在跟踪，没有跟世界脱轨，关心的也都是最新的热点话题。他知道中美领导人要在旧金山会晤，也知道中东战

事如火如荼，最后我们还谈到了关于人工智能国际治理这个具有高度技术性的话题。对一个百岁老人来说，确实不容易。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你们这一代是怎么看待基辛格的？和普通人的视角有什么不一样？

陈琪：我们对他的理解和一般民众可能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他在上世纪60年代末从哈佛大学进入白宫后，基本就脱离学术界了。我们在教科书里读到的显然不是他的学术研究，不是一篇篇的论文文献，他的名字出现在教科书里也不是像米尔斯海默或者肯尼思·沃尔兹这样的政治学者，而是变成一个历史人物了。他当年通过秘密访问打破了中美之间的僵局，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他代表的是一段传奇故事，是学术界试图加以解释和探究的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讲，基辛格留给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不会有太大的差异。总之，他被定格在了一个具体的历史时刻，虽然他后来也不断写书，参与国际活动，但更多还是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延续，是在发挥他在政治上的政策与舆论影响力。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基辛格上世纪70年代推动中美关系破冰的这段历史，近些年有什么新的观点或发现吗？

陈琪：这个故事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官方已经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叙述了。我想说的是，我们对基辛格的印象是跟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段相关联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今天会把这段历史的记忆持续地投注到对当下中美关系演变和国际形势的争论中。换句话说，历史在今天留下了一个阴影，会影响到我们今天对世界的观察和判断。面对今天的挑战，我们会不断地去回溯、去追问，基辛格当年和尼克松一起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那段历史对今天的含义是什么？我们今天如果要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推动那段历史进程的动力还在不在？

三联生活周刊：你能展开谈一谈吗？当年的那种历史动力是什么？今天到底还在不在？

陈琪：今天我们谈基辛格，不仅仅是讲中美关系，实际上需要考察他所一以贯之的大战略构



2012年10月3日，华盛顿特区，基辛格参加了“有关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以及美国的反应”的讨论

想。回看那段历史，从1949年到1971年，2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对中国采取的一直是孤立与遏制的政策，而且中间还打了两场仗——朝鲜战争是两国面对面的直接热战，在越南战争中，中国也投入了无法估量的军事援助和政治外交支持。而中国对美国的印象也是固定化的——美国是帝国主义敌人。但是进入70年代，整个形势变了。美国发动的越战在国内激起强烈的反对，美苏争霸的态势也开始扭转，美国从攻势渐渐转为守势。而且，美国的经济形势也在恶化。“二战”刚结束的时候，全世界都欠美国钱，美元跟黄金挂钩。到1971年前后，美国几乎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日本、西德都成了它的债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来处理跟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就成了美国无法回避的课题。美国社会和政策界开始出现要求改变僵硬的对华政策的思潮，以及中苏分裂的态势，成为美国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重要考量因素。在

这个问题上，尼克松和基辛格有一个基本逻辑就是权力均衡。所以，为了制衡苏联这个最大的挑战者，他们觉得可以撇开意识形态的对立，跟一个共产党国家来做交易，哪怕它以前是敌人，是所谓的“撒旦”。尼克松指出松动对华关系日益必要，“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负担不起永远把中国隔离在各国大家庭之外”。基辛格也宣称，“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对其他国家——包括共产党国家，特别是共产党中国——的判断，将以它们的行为为依据，而不是以国内的意识形态为依据。无视八亿人民这一事实，在我们看来就不可能建立和平”。

如果放在今天，这种做法会引起很大的非议。比如这次俄乌冲突，如果按照基辛格的观念，一个虚弱的俄罗斯在全球战略均衡当中显然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所以，从长远来讲，美国不能够过分地压制、削弱俄罗斯，要保持俄罗斯作为一

个完整国家的核心利益。这样，美国在全球战略中就可以更好地来对付中国这个更具根本性的对手。但这种理念是当今美国乃至西方世界所不能接受的，为什么？因为你全是从战略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不考虑事情本身在国际道义与规则方面的是非曲直。在我们国内其实也一样，俄乌冲突爆发后，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这背后所暗含的价值观的争论是激烈的。

在这个意义上，当年的那场争论在今天仍然能得到历史的回声。当时不喜欢基辛格的人，今天仍然不喜欢基辛格。当年批评基辛格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那一派，直到今天也坚持认为，正是因为他打开了这扇门，让中国得以融入国际社会，一步步崛起，如今变成美国的强大对手。历史不会重复，但它的逻辑总是有惊人的内在延续性。其实，基辛格本人的逻辑本质上也没变化，他当年来中国，也不是因为他喜欢中国共产党，而是因为他觉得发展跟中国的关系有助于解决美国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比如美国要想从越南撤军，没有中国的协助就很难。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说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一个历史定位。

不过一码归一码，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确是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不管他的主观动机是什么，中美关系正常化为后来的中国创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趋势，让中国开始跟世界更好地拥抱。甚至有人认为，如果没有当年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后来整个改革开放事业可能都难以顺利进行。1979年以后，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融入世界，要搞改革开放，你想想，如果没有和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恢复正常关系，你对谁开放？

基辛格“过时”了吗？

三联生活周刊：自1971年以来，50多年的时间里，基辛格访华已经超过百次。他自己也曾提到，他的专长在于“认识中国的每一代领导人”。在中美关系一些重大而关键的节点上，我们也总能看到基辛格的身影。那么在退出政坛后，基辛格在中美之间扮演的是一种什么角色？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所起到的作用？

陈琪：1977年基辛格卸任国务卿之后，美国

国内对他争议还是比较大的，他后来也没有再被正式起用过。我个人的判断是他后来对美国的政策影响力是有限的。之后的美国几届政府，虽然也克服了一些曲折，但大的方向还是采取了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想把中国纳入美国所主导的全球体系当中。这个方向与基辛格在1971年所开启的方向是一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来的领导人就在具体政策上接受了他的指导。这是两回事。后面的故事其实已经不是基辛格所写的那个剧本了。比如克林顿当年发展对华关系，他在国会的论证就是另一套逻辑。他说我们跟中国保持关系，中国的中产阶级力量会壮大，他们会产生利益诉求和政治表达，中国将会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这符合美国的利益。这和基辛格基于权力均衡的那套逻辑完全不同。

第二，有些人可能因为他资格老，象征性地征求一下意见。2016年特朗普上台前就专门去拜访过基辛格，但基辛格后来接受采访时也说，他觉得特朗普没听懂或者不想听懂自己在说什么。基辛格当然会很自嘲，但他想当“帝师”，这些人的确未必会给他这个机会。我感觉有些美国领导人只是象征性地借用一下他的声誉。

第三，他在中美两头能发挥的一个更实际的作用是传话。比如他今年7月来中国，中方领导人接见了。我觉得中国领导人说的话，他也许能用某种方式传回去，这样就有助于美国更准确地把握中方的一些想法，关心的事项和议题，等等。基辛格作为一个历史老人，中美关系的关键见证者，中国领导人认他，美国人也知道他从中国领导人这里听到的话是权威可靠的，所以这种传话的作用是更可信的。

如果还要加一条，基辛格很多时候是通过他的门生故旧来发挥作用。这些年，他在华盛顿还是有一些门生故旧经常来跟他讨论问题，然后由他出面发声，这样可以凝聚一些共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府的一些政策。但这种影响有时不是他自己直接施加的。今天我看到兰普顿（戴维·兰普顿，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曾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讲话，他说老先生今年7月份到中国去，“我们”和他讨论过去中国的意义是什么，到中国应该怎么劝说两国的领

导人来做点什么。他在回忆里用了“我们”，这个“们”除了兰普顿还包括谁，他没提，我们也不知道。但很明显，他们内部存在一个政策共同圈，基辛格可以通过这种复杂的私人网络来间接发挥作用。不过这个作用具体如何，我们还看不太清楚，它可能是一种泛在性的影响。

兰普顿还说，基辛格当时的判断是中美关系有点危险，而且双方正在推动一个双方都无法承受的、让中美关系螺旋下降的糟糕前景。这种情况下，老先生觉得要做点什么事情。在他们的这个政策共同圈里，我相信他们能做的是一些政策的提议、沟通、设计或者推演，然后通过内部的讨论、辩论来形成某种程度的声音和共识。

三联生活周刊：但这些声音能不能真正影响到当今美国最高层的决策？

陈琪：我认为基辛格对这届政府应该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力。这届美国政府里的人，他们觉得基辛格已经过时了。不止如此，你到美国去就能很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基辛格已经过时了。

三联生活周刊：怎么理解他们所说的“过时”？

陈琪：他们所谓的“过时”，恐怕更多是代表基辛格这个时代的结束，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他本人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以及他处理中美关系的那一套基本逻辑，都过时了。这是两件事情。现在的美国人认为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已经不应该是基辛格当年引以为豪的那套逻辑了。这点正是我下面要补充的。

基辛格是在冷战时代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我们都知道，冷战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冲突的时代，美国要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苏联则要搞世界革命，全球主要大国都是在意识形态的惯性驱动下做出决策和行动。在那样一个年代里，基辛格站出来说，意识形态不重要，价值观不重要，这是个很大的突破。这种突破可以说带有老牌的欧洲式政治权谋的色彩。

然而，今天的现实似乎有要回到那个年代的意味，虽然我们不能说今天是新冷战时代，但我们的确能看到美国又重新举起了大旗，强调价值观很重要，自由世界的团结很重要，指责中国是破坏世界秩序的角色。他们把这套东西抛出来，

看中国接不接招。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所谓的“历史到底终没终结”这个经典问题上，本来大家以为这种价值观的、制度的争论已经终结了，最后发现没有。今天，大家仍然在讨论谁的价值观更好，谁的制度更优越，人类社会是不是还有价值观和制度的更迭与对决这回事。世界局势往前发展的态势跟基辛格当年处理国际问题的基本原则是背离的。所以，他们说基辛格过时了，他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后冷战时代开始了。

中美关系的“晴雨表”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普通人也能感觉到，每到关键的节点上，中国都会把基辛格请过来，他似乎成为某种符号式的人物。那么，中国的政治外交界到底是怎么看待他的？

陈琪：这两年，每当需要基辛格出面的时候，肯定是中美关系出现了麻烦、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某种意义上，他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晴雨表。与此同时，中国把他请过来，也是想传达一个信号，就是中国希望能稳定住中美关系，希望中美关系重回建设性的合作轨道上。在历史上，这样的做法也很常见，比如当年的乒乓外交，还有毛主席见斯诺，都是中国领导人以这种方式向外界传达信号。见基辛格当然是一个比较可靠的信号传达，因为他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中国已经把他界定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们见老朋友要传达的意思是什么？说明中国领导人看重中美关系，希望中美关系稳定。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官方层面的交流，过去这些年，基辛格也活跃于中美民间交流当中，这方面他发挥了什么作用？

陈琪：从历史上看，基辛格对没有权力的人其实不是那么在乎。他如今强调人文交流很重要，但过去他不太看重这个。他觉得舆论对于领导人在关键时间节点上的决策没有决定性的影响，构不成约束。领导人如果做了政治决断，想改善关系，舆论限制不了。

基辛格对领导人的决断力是非常看重的，他认为权力和实力是领导人进行决策的一个根本考虑。只有领导人想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人文交流



上图：1979年1月29日，华盛顿特区，邓小平访美期间，与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时任总统吉米·卡特在国宴上交谈

下图：1972年4月18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右二）在白宫迎接中国乒乓球队队员



才会发挥作用。1971年3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启程去日本参加世锦赛之前,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讨论,谈到与美国接触的问题时说,“在比赛中要接触许多国家的代表队,其中也包括美国队。作为一个团体,我们总是要和他们接触的。如果美国进步,也可以请他们来比赛。我们和美国队也可以比赛,不能来往就不通了”。也就是说在中美乒乓球运动员偶然接触之前,中国领导人就开始考虑要多跟其他国家的运动员接触,考虑了与美国人交流的可能性,以及中方接触还是不接触的问题。最后也是毛主席思考后做出决定,邀请美国运动员来访华。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结果,不是偶然的小球带动大球,而是大球想转,小球就跟着转。

三联生活周刊:基辛格是从学者变成官员的,在哈佛期间,他主要从事历史哲学的研究。1971年访华时,你认为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了解程度有多深?

陈琪:他那时候对欧洲还有中东的历史花的精力比较多,对东南亚也投了点精力,对中国应该没有专门地研究过。所以即便到今天,仍然有人认为他对中国历史的解读存在不少误解,比如他在《论中国》那本书里写到的。但我认为这不重要,他后来毕竟不是一个学者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只要理解中国人的基本想法,理解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知道怎么跟中国人打交道就差不多了。他不需要对中国的历史了解到特别细节、精深的程度。

在这个前提下,我认为基辛格对中国是足够了解的。尤其是他和中国的几代领导人接触了那么久,我觉得他后来甚至比一般的中国人还要了解中国的领导人。他知道毛主席私下是怎么说话的——毛主席说“我喜欢共和党”,毛主席见到老布什还说“你是升官了吗,我看你政治上有出息”这种话,一般中国人听不到。所以他对中国领导人的脾性、价值观、行事风格的认知比一般的中国人要深入得多,也知道他们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想法、原则和底线。我觉得,过去这几年,美国对中国的信息需求、知识需求应该不是在下降,而是在增长。他们需要搞清楚中国真正的政策是什么,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更需要基辛格这样的人物。

三联生活周刊:据你的观察,在如今美国政府

的决策圈中,知华派的存在感怎样?

陈琪:我们不能说现在的决策圈子不了解当下的中国,事实上,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现状会有各种政策简报,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基本历史认知,对中国人怎么处理与世界的关系的基本哲学,是不够了解的。中国人在历史上起起伏伏,有过伟大的辉煌,也骄傲过,后来才慢慢强调“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强调把战争作为一种“凶器”。这些东西,他们可能未必理解得那么深刻。他们或许知道中国有这些说法,但缺乏对中国历史哲学的基本同情与理解,对这些说法可能是不信任的。

中国人对于战争这件事,首先的看法是“国之凶事”,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不能随便打仗。中国人过去也不是不想扩张领土,但数千年历史得出的教训是“好战必亡”。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懂历史的人,所以打中印战争和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都是打过去,教训一下,马上就撤回来。中国人知道什么叫“止”。美国认为今天的中国是他们最大的威胁,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历史哲学存在误解。

总之,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其彼此的基本价值观和历史文化的洞悉与理解,现在可能是差异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近。反而是基辛格这一代的西方政治家,他们更有对中国历史的同情心,更能理解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屈辱”。他们懂中国的抱负,也知道中国的局限。这是美国当下的一些年轻决策者缺少的历史训练,这使得他们即使想学基辛格从大战略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实际上也缺乏基辛格那种历史哲学的根基来处理对华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反过来也可以说,我们对他们的理解与认知也和历史拉开了一定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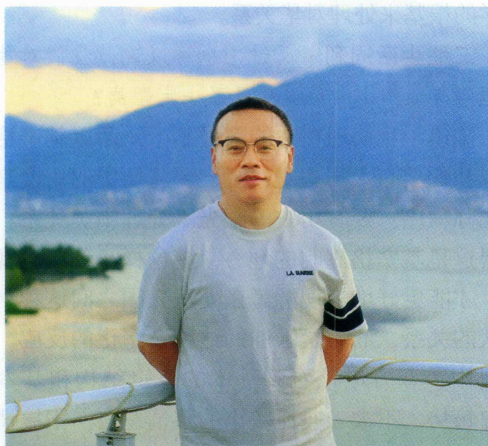
陈琪:我们现在看的都是眼下,所以基辛格一再说我们要有大历史观,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建构国际秩序,要有历史的眼光来处理中美关系。我觉得这是基辛格高明的地方,有这样一种历史视野后,才能更好地去理解怎么处理大国之间这种兴衰起伏的关系,而不是眼前的这种情绪化的反应。我觉得中美双方应该看到基本的逻辑结构和基本的历史趋势,不被一些比较小的事情左右,不搞情绪化。

中美之间期待下一个“老朋友”

三联生活周刊：在2015年的一次采访中，基辛格曾说，中美需要从“一战”中领悟的深刻教训是：一国可能由于短期看上去很合理的事情卷入冲突，之后忽然发现自己已陷入不知如何自拔的地步。所以，中美必须谨慎，以防步入表面上合理但仍带来紧张局势的行动；否则随着时间发展，紧张关系将难以管理。你如何看待这种担忧？

陈琪：基辛格的一个基本想法是大国之间不要打仗，这个思路是对的。国际社会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其秩序的维持靠的是什么呢？不是靠小国，还是靠大国。所以基辛格特别看重大国关系的稳定，他在任的时候是想通过构造一种力量的平衡来形成稳定的大国关系。但这个过程可能就会牺牲小国。在欧洲的历史上，大国搞均势政治的时候就牺牲了一堆的小国，比如波兰被牺牲了好几次，领土被随便划分。不管怎么样，这就是基辛格对历史的理解。大国之间如果觉得战争是很容易的，我可以很轻易地改变对方，那势必会重新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状态。

“一战”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战争很快就能结束，各国军队兴高采烈地奔赴战场，最后发现死了那么多人，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基辛格强调中美之间不能打仗，是因为中美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国家。如果它们的关系不断恶化，世界秩序也一定会瓦解。但是他本人好像对此有点悲观。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系聘教授、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陈琪

他认为即便是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都能够形成有限度的合作，比如就军控进行谈判。但今天，他觉得中美之间可能不太容易形成一个互相协调的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几年局部战争频发，让人觉得整个世界都不安稳。无论人们对基辛格做什么样的评判，他的这套分析逻辑在当下的世界还是有它的价值。

陈琪：我认为基辛格的价值还是挺重要的，特别是在特朗普崛起后。因为特朗普不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孤立主义者。美国冷战以后推行的一直是国际主义政策，但特朗普是一个逆流，他不愿意在国际社会承担责任，上台后还不停地退出国际组织。另一边，中国在国际社会也面临一些挑战，中美互信和合作的缺乏导致国际治理这些年来缺少领导力。结果是什么呢？各种极端主义一定会沉渣泛起。因为当你有一个稳定的力量压着的时候，很多东西是起不来的。现在大国的力量有所缺失后，你看，中东有点压不住了，全球极端主义势力压不住了，街头政治冲突也压不住了，历史上的各种新旧矛盾都会翻起来。

基辛格认为有力量的领导人在历史的特殊时刻是能发挥作用的。这一点上，他和尼克松的想法是一致的。所以尼克松后来写了《领袖们》，他自己写了《论领导力》。如今国际社会呈现无序化的分裂趋势，所以基辛格更加强调中美之间一定要和解，一定要形成共识，特别是要达成一个不打仗的基本共识。我们这次最后见他，他还是在强调说中美之间在其他问题上不能形成共识的话，可以在中东问题上看能不能达成合作，以此向全世界传达一个信号——中美是能够合作起来解决一些世界性难题的。如果中美都不合作了，这个世界的未来可能就不是那么美妙。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目前的中美局势怎么判断？中美关系对整个世界有什么影响？

陈琪：美国现在的心态是不想带中国玩，他们在全球搞产业链重组，想塑造一个环境，让中国在其中变得孤立。对这种情况，中国肯定也要做出反应。这样，美国会受损，中国会受损，全世界都会受损。我在多个场合强调，美国人现在

说要去风险，到底意味着什么？说明美国和西方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下降，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过度地依赖中国，去风险就是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以前可不是这样。以前是中国要加入全球产业链当中，美国有些产业可以转移到中国去，结果是大家的风险承受能力都得到增强，而且都愿意承担风险。我把我的风险暴露给你，你把你的风险暴露给我，这样谁也不敢掀桌子。美国从中得到了便宜的商品，中国则有了稳定的对外出口，不仅两国人民的福祉显著改善，而且全世界的福祉都有了保障。现在中美如果脱钩，不愿意承担风险，大家的福祉必然都会下降。或许，人类在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后进入的那个全球市场扩张、经济不断增长的黄金时代基本上结束了。繁荣和进步不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态势有可能扭转吗？

陈琪：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中美之间这个结能不能解开。前两年汽车产业的芯片荒，当然跟新冠疫情有直接的关系，但实际上也是中美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还有俄乌冲突、朝鲜半岛问题、伊朗问题等，都很棘手，以前中美关系好，还可以一起合作，现在面临的挑战比较大。

三联生活周刊：气候变化这一类的议题有可能成为改善中美关系的突破口吗？

陈琪：气候变化毕竟不是当前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很难把它变成当下头等重要的事情来推动。中美之间现在能做的很重要一点是危机管理，底线是不能发生军事冲突，要尽力管控当下可能引起冲突的事态。这可能是当前中美领导人比较感兴趣的事情。这次旧金山会谈最大的一个贡献，我认为是两军恢复交流。之前也存在交流机制，但佩洛西访台之后就停了。还有一件新的事情，就是双方同意在战区一级建立沟通热线，这是以前没有的。战区在中国就是具体管打仗的，也就是说中美领导人可能意识到，再这样发展下去，冲突的风险会加大，需要更紧密的沟通来改善关系，消除误解，防范风险。

三联生活周刊：美国国内的政策精英群体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如此高度统一了吗？

陈琪：我就跟你讲一件事情。我们这次去美国跟美中关系委员会举行人文交流的会议，他们

一开始就担心，在华盛顿跟中国的一个学术机构召开会议，会让人觉得他们是在为中国说话。对议题的设计他们也很小心，比如我们提出两国的新闻界应该搞一个小组来讨论新闻界的沟通，他们就说这样是不是有助于你们到美国来做宣传，他们特别害怕被美国国内的舆论指责。美国国内的氛围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一个专门来从事美中关系事务的机构都要很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害怕被人指责，被人批评。可见不仅是美国两党，美国社会层面也已经形成了非常固化的对华认知。

这种从特朗普上台以来，尤其是新冠疫情以来所形成并不断恶化的社会认知，一旦在一代人当中形成，除非有非常重大的事件发生，否则很难被打破。这两年我们也明显地看到，在疫情之前，美国还是有不少很好的大学生愿意到中国来留学，现在就很少了。他们觉得到中国来对他们的事业和成长没帮助，反而回去后有负面影响，而且觉得到中国也不安全。虽然我们国内对美国的印象也在改变，但是美国对中国的这种负面认知恐怕更具有持久性。这种局面是怎么造成的？我一贯的看法，是美国台前的政治精英有意引导国内舆论的结果。因为他们需要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危险的敌人，塑造成大家都不能去访问的一个国家，这样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

三联生活周刊：这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早年去美国访问有觉察到这种氛围的变化吗？

陈琪：早些年我基本一年要去一两次美国，那时候从来没有感觉到过这种气氛。我觉得大概是从2018年之后，在特朗普政府推动下，中美之间产生贸易摩擦，再加上后来的新冠疫情，氛围才发生变化。现在我们去美国，去程航班上人还是满的，但回来的航班几乎一半是空的。

这次基辛格去世，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我们当然可以说是在回忆那个时代，但越看重基辛格，越说明我们是要找到能解决中美关系问题的人。这种人，要能在当下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敏锐地去洞察中美关系需要跨越的障碍，要能寻找到推动中美关系的真正的动力。我觉得，这样的人是下一个所谓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才是下一个世纪老人，才会被受益于中美关系发展的后人们所期待、所敬仰。■



基辛格的性格和政治生涯，与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在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中，秩序是排在首位的追求

基辛格的“美国世纪”与回响

记者·肖楚舟

在美国历史学家杰里米·苏里看来，要完全理解基辛格，必须将他放在“美国世纪”的时代语境中分析。“二战”以后到21世纪初，在美国急速扩大全球影响力的大半个世纪里，一批基辛格这样目睹过战争灾难的新美国人，将自己对世界秩序的理解注入美国的战略决策。跳出个人史的视角，我们从基辛格身上能看到“横跨多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如何塑造了当代世界”，其影响延续至今。

15年前的一场对谈中，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公共事务和历史学教授杰里米·苏里（Jeremi Suri）曾向年过八旬的基辛格提出一个问题：“你不能违背的道德原则是什么？”基辛格告诉他，“我还没有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那场活动的主题是杰里米·苏里刚出版的新书《亨利·基辛格与美国世纪》（*Henry Kissinger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同一年，在时

任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 (Condoleezza Rice) 主持的另一场对谈中,基辛格说苏里的书是“迄今为止关于我的书里面写得最好的一本”。

研究基辛格经历的书籍中,杰里米·苏里的视角确实比较独特。他将基辛格放在“美国世纪”的语境下,用300多页的轻巧体量分析了这位明星政治家一生中的几个关键课题:他作为犹太人在魏玛时期德国的经历,他在哈佛的知识分子生活,他如何进入政坛并掌握权力,并最终在全球事务中产生影响。苏里主张跳出个人史视角,把基辛格作为窗口,观察“美国世纪”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从这个角度看,基辛格是以全球化特征的“美国世纪”的产物,也是推动这一愿景最终达成的重要推手。

“美国世纪”这个术语是由《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 (Henry Luce) 在1941年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断扩大的局势下,卢斯呼吁美国人放弃孤立主义,充当全世界的“好撒马利亚人”,传播民主价值观,以“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向全世界充分发挥我们的影响力”。以此为起点,美国在战后世界迅速崛起,开始扮演所谓“拯救者”和“避难所”的角色。一般认为这个过程从“二战”开始,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的“9·11”事件结束。

卢斯提出“美国世纪”的时间点,正好是基辛格一家移民美国站稳脚跟的第三年。透过“美国世纪”的语境理解基辛格,会看到他身上折射出整个时代的憧憬和矛盾。对逃离纳粹阴影的基辛格一家来说,美国是抵御暴政的避难所,接纳了无数和他们一样的战争受害者,赋予他们在新国家进入学术界和政界的机会,从这重意义上说,基辛格是“美国世纪”的孩子。反过来看,基辛格又代表着构建“美国世纪”的新力量,他们并非来自美国社会中传统的权贵阶层,而是带着“旧世界”思想印记的外来者,将自己对世界秩序的理解注入美国的决策。

如基辛格所说,“美国世纪”又是一个“疲惫的时代”,国家实力与它的野望并不总是相称,领导者常常面临剧烈的社会和政治压力。因此基辛格对“领导力”的理解是“弥合经验和愿景之间差距的艺术”(art of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experience and vision)。他的成就来自于对这门艺术的纯熟掌握,他的失误也要归咎于这门艺术的高深莫测。

“美国世纪”的孩子

三联生活周刊:你主张把基辛格放在“美国世纪”的语境下分析,而“美国世纪”最主要的特征是全球化。能不能谈谈什么是“美国世纪”?“美国世纪”发生的全球化进程,对于我们理解基辛格为什么至关重要?

杰里米·苏里:美国在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美国从一个世界上的小国、中等强国变成了经济和军事上的超级强国,回想美国在20世纪初的状态,这其实是一个相当突然的崛起过程。其次,美国突然变得极其国际化、极其多元。这个国家的移民规模在20世纪达到了一个惊人的规模。再次,美国的民主运作发生了变化,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新角色,基辛格就是其中的领军人物。他强化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地位,这意味着官僚机构和权力管理部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那也是“美国世纪”的一部分。

基辛格是第一个真正拥有全球思维美国人。他不仅仅关注欧洲和亚洲,还花了很多时间在各地旅行,访问大大小小的国家。是“美国世纪”造就了他,这样的环球旅行哪怕早10年到15年都是不可能的。另一个关键点是,基辛格来自“旧世界”欧洲大陆,最终成为新世界秩序的塑造者。基辛格的思想有着明显的19世纪德国文化印记,他看重那些和德国一样拥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比如中国、伊朗和埃及,而他把这种偏好带进了美国的外交策略中。这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因为全球化意味着人的移动,也意味着思想的融合。他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非本土出身的美国国家政策制定者。最后,基辛格是犹太人。犹太人可能是那个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中最重要群体之一。从古至今,犹太人一直穿梭在许多不同的社会中,拥有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工作的悠久传统,联结着不同的社会。这也是基辛格所做的,他总是试图找到使不同社会合作的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基辛格的早年经历颇受传记作者关注,从魏玛时期德国的犹太人到成为美国移民,那段经历对基辛格的性格和世界观产生了什么影响?

杰里米·苏里:在亨利·基辛格的少年时代,他亲眼目睹纳粹和法西斯势力崛起,目睹了无数暴力事件,其中包括他的家人险些丧命。这些经历永

远留在了他心中。对他来说，这个世界总是处于危险之中，暴力的威胁以及仇恨的存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是他来到美国的原因，并且塑造了他对美国的看法。对他来说，美国是拯救者。因此尽管他并非在美国出生，但他对美国抱有一种感激之情。他感到自己与美国之间有一种紧密的联系，并且相信美国必须强大起来，去保护和他一样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但他并不愿意公开谈论那段经历，你认为从他的政治哲学中能看出那段经历的影响吗？

杰里米·苏里：是的，每当我和他谈到他的犹太人经历时，他总是非常紧张，这对于经历过大规模屠杀的人来说相当正常，尤其是对于第一批幸存者来说，因为其中包含着很多创伤。尽管美国是他和许多其他人的庇护所，但在美国也存在反犹太主义思想。他不愿意仅仅被看作一个犹太人，他想被看作是一个“碰巧是犹太人”的美国人。他想被视为一个美国政治家，而不是一个犹太政治家，因为那会让他和像他这样的人产生不安全感。

我认为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政治哲学来说至关重要。首先，他的世界观是以秩序为中心的。他亲身经历过那种混乱，这个世界总是存在混乱，你需要创造秩序。因此，和许多美国人不同，对基辛格来说美国的主要任务不是推动民主，而是先建立秩序。其次，他相信建立秩序的方法是让大国和他们的领导人合作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强调美国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关系。你必须让最大的国家的领导人们联合起来，达成某种他称之为“共识”的协议，而不是通过抽象的原则达成合作，抽象原则是放在建立秩序之后的。最后，他相信谈判和妥协。他认为没人能百分之百达到自己的目标，你必须做出权衡。他总是批评那些追求乌托邦的“传教士”，认为妥协手段是必要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基辛格最重要的外交成就是哪些？贯穿他所有外交战略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杰里米·苏里：我认为他的最重要的成就有三个。首先是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他不仅仅建立了领导层之间的关系，还让这种联系延伸到商界领袖、普通民众之间，形成了这两个社会之间真实的联系，我认为这为我们今天与中国的关系

奠定了基础。其次是1973年，他在中东通过穿梭外交结束了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冲突。尽管过程中仍发生了一些暴力行动，但至少提供了部分的和平，如果埃及和以色列当时继续交战，情况会更糟糕。再次是推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在此之前，美国和苏联都在不断地扩建核军备库，这些谈判首次为此设定了限制。他是第一个对苏联这样做的人，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模型，这套美苏之间的谈判模式也可以适用于今天的核武器限制协议谈判。

我认为贯穿基辛格外交战略的核心思想是，美国的力量对于维护世界秩序至关重要，美国必须利用其力量在世界上维持秩序。

三联生活周刊：在谈到基辛格的外交成就时，我们的出发点总是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的利益。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立场，但从其他国家的反应来看，并不一定总是正确。你认为基辛格的局限性在哪里？

杰里米·苏里：我认为他的局限性就在这里，他对于其他的国家的价值观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地尊重。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他尊重对方的价值观，尽管想要使用美国的力量，但会尽量以一种与对方价值观相容的方式采取行动。而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他没有充分尊重或理解他们的价值观，比如越南。还有一些地方，他是在用破坏性的方式使用美国的力量，也因此碰壁。你可以看看世界地图，在基辛格不大了解的地方，他就做得不大成功，比如智利、东帝汶、柬埔寨、越南、安哥拉，因为他并不尊重他们的价值观。

在这方面批评者可能是正确的，他看待世界时有一套特定的价值观。他看重中国、美国、俄罗斯、德国，也尊重伊朗，因为这些国家在他眼中有着悠久文化、拥有出色成就，有着严肃思想和深厚学术传统。而其他国家的价值观他就不那么在意了。这正是19世纪晚期德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他们认为世界上有几个历史悠久的文明中心。它们将永远存在，所以你应该尊重并与它们合作，这也是为何他能成为中国人的“老朋友”的原因。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在同时代人里面，基辛格的影响力如此巨大，而且旷日持久？

杰里米·苏里：首先他非常善于搭建人际网络（networking）。我告诉我的学生，他是



1973年9月11日，智利宪兵包围了拉莫内达总统府，一小时后他们背叛了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发动政变

社交网络出现之前最优秀的社交能手。他在重要人士之间穿梭，去见一些重要的人，然后告诉其他重要的人那个人说了些什么，引发对话。他在这方面非常擅长。他总能巧妙地利用他的关系网，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去世前还去了中国，回国后立刻去了白宫。而他能去白宫，正是因为美国领导人想听听中国领导人对基辛格说了什么。

其次，他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著作等身，他会把他做的事情写下来，这使得他很受记者欢迎。人们需要一个好的交流对象，一个能给出解释的人。他非常擅长引起媒体的注意，写作能力也非常出色，这使得他保持着长久的影响力。我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次注意到基辛格是在10岁左右。那时候他已经离开了白宫，但我仍记得他总是出现在电视新闻上分享观点，从那时候起我就感觉到他是个非传统的美国政治家。作为一个孩子，我对他的熟悉程度甚至比美国总统还多。

再次，他具备真正的才华。既有智力上的才华，

也有丰富的经验。他能够审视复杂的问题，为政策制定者提供良好的建议，无论他的建议是否正确。对于像我这样的大多数学者来说，我们可以解释问题，但我们不能告诉你该怎么办。他非常擅长审视问题并提供选项，而商业领导人和决策者需要的就是选项。他们不仅仅想了解事态，而是需要人告诉他现在该怎么做。

争议与遗产

三联生活周刊：你跟基辛格有过多次接触，你对他的印象如何？

杰里米·苏里：我和基辛格见过十二三次面。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思熟虑，即使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八九十岁了，他的大脑依然强健。他可以表现得非常迷人，让你非常喜欢他。但他也非常敏感，不喜欢批评，可以说有点自恋。

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拥有太多权力，得到了

太多关注，他总是希望人们的注意力放在他身上。但他有一种希望别人喜欢他的渴望，这和他的移民背景有关。要知道他的权力并不是因为天生富有或是出身高贵，而是他有一种让上位者喜欢的能力。

他和我多次交流的原因是他非常关心我会在书里怎么写他，以及人们会怎么看他。2008年《亨利·基辛格与美国世纪》出版以后，我们曾在国务院和时任国务卿赖斯一起做过一次活动。当时他说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他最好的书，但其中还是指出了一些“错误”。他说我不应该在书里大谈他的犹太背景，也认为我不应该说他在越南的行动是失败的。他认为他为尼克松政府达成了一个很好的和平协议，是后来的人搞砸了。当然这只是他的看法，我觉得我没有错，我只是和他想法不同。

三联生活周刊：基辛格可能是上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外交家，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但我们 also 看到他在美国饱受批评，甚至被激进者贴上“战犯”标签。他受到的评价为何如此两极分化？

杰里米·苏里：我认为他备受争议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他对秩序的强调。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的政策应该以人权和民主为基础，这就是我们在美国谈论事情的方式。而他认为比起民主，秩序更为重要。因此，许多人对他的做法感到不满。

第二，有时人们称他为捍卫秩序的罪犯（criminal in defense of order），因为他愿意为维持秩序使用大量武力，认为有时必须使用一些武力来防止更糟糕的事情发生，比如对柬埔寨的地毯式轰炸和智利政变，这两件事背后都有他的参与。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他的做法。他确实犯了一些重大错误。例如智利政变推翻了社会主义政府，但新政权实际上更加糟糕，更加残酷和专制。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告，即使这样杰出的人物，在拥有太多权力时也可能犯错。

三联生活周刊：基辛格受到的评价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我记得他刚刚进入白宫就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副标题是“通往朋友和敌人的新方式”（New Approaches to Friends and Foes），看上去是饱含期待的。但70年代以后，

针对基辛格和他代表的美国政府的批评越来越多。结合美国社会生活和美国人价值观的转变，我们如何理解人们对基辛格看法的变化？

杰里米·苏里：我认为70年代以后最大的变化之一是，新一代美国人大大了，他们比基辛格年轻，却没有像他那样经历过“二战”或冷战初期。因此他们不理解他看到的危险。

我们必须记住，基辛格是生活在冷战巅峰时期的人，那是一个充满核武器和战争的危险世界。对于在越南战争之后出生的美国人，如我所属的“70后”和“80后”，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他们不认为这个世界是危险的，因此不理解为什么基辛格仍然在使用那些老方法。这是一种代际转变。第二个原因是，基辛格在他离开权力中心很久之后仍然保持着影响力。年轻一代经常感到不满，为什么他仍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是他去会见中国领导人，而不是其他人？这里面存在一种影响力的竞争。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问过基辛格，他不能违反的核心道德准则是什么，当时他没有给出答案。你觉得他的答案可能是什么？

杰里米·苏里：我认为他当时不想明说的是，他的道德原则跟民主关系不大，而更多关于功利主义（utilization）。他关心的是我们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的最大效果是什么，但这并不是一个足够宏大的原则（a grand principle）。我认为他更像是一个实用主义者（pragmatist），他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了暴力和坏事，你应该注意坏事的发生，为尽可能多的人谋取最大的好处。他追求的“功利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哲学观点，为“尽可能多的人追求最大的幸福”，但必然有些人要承受痛苦。

三联生活周刊：基辛格常被定义为现实主义者，但有些学者，比如他的传记作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却认为他是理想主义者。你认为基辛格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还是理想主义者？

杰里米·苏里：我和弗格森教授是很好的朋友，也跟他讨论过多次，但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基辛格不是个理想主义者，我想他把这个词放在书里只是为了引起读者注意。当然基辛格也关心哲学意义上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暗示了一种想法，

就是存在一种永久的完美的和平，基辛格非常爱引用的哲学家康德就是这么认为的。但最终，基辛格对秩序关心超越了他对完美和平的追求。

基辛格只有一个地方跟现实主义者不同，即他相信美国的特殊性。现实主义者认为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都在争夺权力，但基辛格不认同这一点。他认为美国因其特有的价值观而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必须是好的，美国应当在世界上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他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作为犹太人在“二战”期间的经历。那让他相信即使这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主义的，但美国是个例外。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现在的美国有没有能继承基辛格外交事业的人物？

杰里米·苏里：我认为实际上并没有，虽然有一些人，如康多莉扎·赖斯和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等人仍保持着一些影响力，但并没有达到同样的水平，因为他们往往被视为某一方阵营的代表。

基辛格之所以能够为共和党和民主党双方提供建议，还是要回到冷战的语境下看。在冷战的外部压力下，美国两党在更多问题上存在一致意见，比如都不喜欢苏联，都认为有必要对中国开放，基辛格找到了双方的共识。但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你为一方工作，另一方就会拒绝你。今天最令我担忧，也令基辛格担忧的问题是，美国两党似乎只能在对中国的一些负面看法上达成共识，而这些看法并不真实。基辛格晚年试图阻止这种情况，这也是他拜访中国领导人的原因。我们应该寻找能够促进积极合作的共识，而不是引发战争的共识。

三联生活周刊：在和中国的关系中，为什么基辛格能够扮演破冰者和沟通者的角色？还会有下一个基辛格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类似的角色吗？

杰里米·苏里：因为他认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和美国一样是特殊的。正如我在书中所谈到的，基辛格继承了19世纪的德国思想传统，相信伟大的文明主导世界秩序，美国是其中之一，德国和中国也是。所以他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的偏见，看见中国底色里他认同的东西。

我希望能有下一个基辛格。可能不仅仅是一

个基辛格，而是一群像他这样的人。我们需要同时了解两个社会的人物，他们可以建立关系，在危机或误解发生时减少误解，并鼓励合作。我同意习近平在会见拜登时说的话，他说“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美国不会消失，中国也不会消失，两国必须打交道。所以我们需要基辛格这样的人来管理这种关系，不只是外交官，而是需要商人、学者、社会活动家等各界人士共同努力。

三联生活周刊：而事实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中美关系中出现新的基辛格。今天我们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杰里米·苏里：我认为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对意识形态或者某种思维方式的过度强调。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需要真正理解国际关系，并能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管理国际关系的人。这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三联生活周刊：在政治生活之外，基辛格的日常生活也非常引人注目。他是个知名的足球迷，和媒体及好莱坞名人们保持着密切关系。在日常生活里，基辛格是个什么样的人？

杰里米·苏里：在日常生活中，基辛格非常希望自己被视为名人。他喜欢成为名人，喜欢引起注意。他是个足球迷，喜欢歌剧和文学，也是一位知识分子，但他会利用他的私人生活来引起注意，使自己更有影响力。他明白，尤其是在美国，如果你是名人，你就有影响力，而影响力就是权力。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基辛格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他的思想是否能帮助我们应对当下的困难？

杰里米·苏里：我认为他的遗产要分为正面和负面两部分去看。正面的部分在于，他告诉我们必须利用力量来创建秩序，这个世界常常是混乱的。必须由强大的国家来介入和创造秩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有责任这样做。基辛格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国际关系模型，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建设。负面的遗产是，基辛格也证明了权力有时会导致腐败。如果不够谨慎，权力就可能以危险的方式被滥用。因此，我们必须在拥有力量的同时保持谨慎，对力量的边界保持清醒的认识。■

从哈佛到白宫：影响基辛格的关键之人

文·刘怡

要理解基辛格在8年白宫岁月中的作为，必须回到他人生的前45年。这位出身寒微的犹太移民，历经“二战”军营中的奇遇、哈佛名校的熏陶以及一众贵人提携，最终脱颖而出，成为美国历史上书生从政罕见的成功案例。基辛格的世界观与处世之道，也受到早年经历的深刻影响。这段历史的曲折与戏剧性，丝毫不亚于他后来的外交风云。

1972年11月4日，星期六。上午10点30分，奥莉娅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走进基辛格位于白宫的办公室。西方世界最著名的记者，专程从欧洲飞来，采访全世界最受关注的外交家。但在法拉奇的印象里，那次采访的开端，几乎可以称为灾难——在把女记者领进自己堆满书籍、文件、照片和电话的办公室之后，基辛格好像完全忘了，他答应要给法拉奇一个小时采访时间。在女记者愤懑的注视下，基辛格背过身去，旁若无人地读起了一份厚厚的政策报告。

冷场持续了十分钟。基辛格转过身来，好像刚刚发现法拉奇一样，招呼女记者坐到会客的沙发上。基辛格自己的座位，是一把高出沙发好几英寸的扶手椅。他斜靠在扶手上，支着胳膊肘，用带有浓重德国口音的英语向女记者发问。那一刻，法拉奇想起了自己的中学数学老师：同样是中年发福，同样从眼镜片后面射出嘲讽的目光，也同样喜欢居高临下的说教。两人的对话，不时被尖锐的电话铃声打断。基辛格跳起来，抓过听筒，另一头传来了尼克松的声音。尽管美国总统的办公室，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办公室只隔一条走廊，尼克松还是更愿意待在几十米开外，通过电话线“遥控”。法拉奇注意到，基辛格“殷勤、谄媚地回应总统”，“就像是母亲在对撒娇的孩子说话”。这样的电话，几乎每十分钟就有一通。当

采访进行到一个多小时的时，基辛格站了起来，告诉法拉奇自己要去“看一下总统先生”，让女记者稍等。这一等，就是两个小时。直到基辛格的助理坎贝尔推开门，尴尬地告诉法拉奇，尼克松需要基辛格马上陪他去加州，采访到此为止。而基辛格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永远不会告诉任何人，自己属于哪种人。”

这场支离破碎的采访，随后成为新闻史上的传奇。当法拉奇回过神来，仔细审视基辛格的回答时，她意识到：这个语速单调，毫无情绪起伏的人，完全清楚一位有野心的记者最希望了解什么。基辛格不仅回应了全世界关心的美越谈判问题，还公开宣称自己并不是和平主义者。他指责越南战争是一场“无用的战争”，也坦言，假如自己离开了政治权力，内心会失去动力。这些回答中的每一句，都适合拿来作为头版新闻标题。但基辛格传递这些信息的方式，又是极度浮夸的。他宣称，自己是一个单枪匹马的外交“牛仔”，是普通美国人最欣赏的那种孤胆英雄。这个比方，后来让尼克松极度震怒。基辛格还以炫耀的口吻谈论自己的异性缘，似乎在暗示：自己不仅魅力非凡，而且乐在其中。就连采访过程中的冷落，也出自精心设计。法拉奇意识到，基辛格之所以要先读完那份报告，并且时不时接一通尼克松的电话，就是为了提醒自己：面前这个人很重要，他能左右美国总统的情绪起伏，他独一无二。

对此，法拉奇评论说：“我从来没有见过第二个人，像基辛格那样善于回避提问和定义。也没有见过第二个人，像他那样善于为自己辩护，以免被他人窥探到真实的个性。”而一位在21世纪初拜访过基辛格的美国学者，曾经告诉我：“他说话的口气，就像是来自奥林匹斯山下来的信使。在那个众神构成的神秘世界里，他是唯一的凡人。”

接受法拉奇采访那一年，基辛格49岁，已经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左）与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右）在白宫交谈



意大利著名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她在1972年对基辛格的专访，成为新闻史上一个著名事件

(视觉中国提供)

在白宫度过了四年时光。这四年里，他秘密飞往中国，开启美越巴黎谈判，初步建立了自己外交“牛仔”的形象。接下来的四年，他还将介入中东战争，捧回诺贝尔和平奖，并升任国务卿。所有这些奇遇，放在任何政治人物身上，都堪称传奇。但只比基辛格小6岁的法拉奇，可能没有意识到：1972年端坐在扶手椅上的那个基辛格，距离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其实只过了34年。使基辛格成为基辛格的，并不是1968年之后的白宫岁月，而是他在45岁以前经历的，从犹太难民到总统候选人智囊的奇幻旅程。

在这段旅程里，有怀才不遇的思想导师，有交游广泛的学界领袖，有爱恨交织的政坛前辈，还有如尼克松般个性幽暗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些人的影响和干预下，基辛格一步步由哈佛校园里

的大龄新生，成长为法拉奇眼中那个捉摸不透的政治家。不仅如此，书生从政的基辛格，还敏锐地察觉到了舆论之于现代政治的意义。尽管他津津乐道于19世纪式的密室外交，却也精心塑造了自己的媒体形象，使美国新闻界对他追捧不已，欲罢不能。诚如法拉奇所言：“对这个太过出名，太过重要，又太过幸运，以至于人们管他叫超人、超级巨星、‘超级德国酸菜’的人来说，只有历史才有最终发言权。”而我们普通人，只能像当初的法拉奇一样，一遍又一遍问：“亨利·基辛格到底是谁？”

“发明基辛格的人”

“克雷默重点关注的是如何当好政治家，如何处理价值与行为之间的关系。”——2003年基辛格回忆克雷默

如果把基辛格政治生涯的起点尽量往前推，故事并不是从1923年他出生于德国开始的，甚至也不是始于1938年他随父母移民到美国。那是1944年一个普通的夏日，21岁的美国陆军二等兵基辛格，正在路易斯安那州一个新兵训练营里午休。突然，营地里走进来一个戴着单片眼镜、手提马鞭的中年人。他毫不客气地告诉带队的中尉，自己要给这群新兵做一场演讲，题目就叫《我们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对方滔滔不绝的口才和鞭辟入里的分析，把基辛格彻底迷住了。演讲结束后，基辛格打听到这个不速之客的名字叫克雷默，是隔壁一个连的大龄新兵。他立即给对方写了一张便笺，内容只有两句话：“你说的真是太对了。我能给你帮点什么忙吗？”

这个不同寻常的示好举动，不光是出于智识上的羡慕，它还隐藏着一个背井离乡的年轻人渴望指引的情绪。要知道，21岁时的基辛格，既没有真正融入美国，对自己的出生地德国也早已疏离。他甚至不完全理解，希特勒的出现，如何改变了世界——直到“二战”结束后，基辛格才得知，自己留在德国的亲戚，有20多人死于纳粹集中营。而在1944年，他只知道，由于希特勒的排犹政策，

自己在15岁时，就必须遁往纽约，从此终身操着带有德国口音的英语。身为资深中学教师的父亲，在异国他乡，只找到一份记账员的工作。而基辛格自己在1941年中学毕业时，选择到纽约市立大学攻读会计学专业，已经准备好了“子承父业”。与其说参军入伍是他实现阶级跃升的尝试，倒不如说：这个不合群的年轻人，还在寻找自己适合走的路。他迫切需要一位导师，一个指点迷津的人。

而比基辛格大15岁的弗里茨·克雷默（Fritz G.A.Kraemer），同样是流亡他乡的德国犹太人，经历却复杂得多。克雷默在26岁时，就拿下了两个博士学位，后来在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担任高级法律顾问。当基辛格在菲尔特度过少年时光时，克雷默已经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学研究者了。他见证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崛起，也目睹英法等国的绥靖政策，如何纵容了德国的侵略野心，为此愤愤不平。但当克雷默和基辛格一样，以难民身份前往美国时，同样没有获得主流社会的接纳。他希望为美国的顶层战略设计出谋划策，却苦于报效无门。美军情报机关，对这个自命不凡、愤世嫉俗的犹太人敬而远之，只让他以新兵的身份待在训练营里。命运的巧合，就在这时发生了。

当克雷默在法兰克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他的同班同学之一，是未来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德鲁克曾经问克雷默有何人生理想，克雷默笑答：“要么做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要么当某个大国外交部长的导师。”他解释说，自己擅长思考，不擅长行动，也不喜欢待在聚光灯前。这样的性格，更适合隐于幕后。在1944年，这位初出茅庐的导师，最需要的是一个门徒：同为新兵的克雷默，当然给不了基辛格任何关于未来的承诺。但他有学识，有阅历，有关于世界的见闻和眼光。这恰恰是迷茫的基辛格最需要，也最渴望的。

于是，一段长达半个世纪的师徒关系，就从路易斯安那的新兵营开始了。当克雷默察觉到，基辛格对政治和人性有着极好的直觉，也急于搞清“二战”可能的后果时，他果断建议基辛格，以从事外交为志业。也是克雷默，最早启发了基辛格对历史的兴趣。他告诫基辛格：人性中有许

多不变的成分，它们在历史案例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要想成为杰出的外交家，最重要的是学习历史，而不是研究理论。克雷默还认为，美国过去的外交政策，过于书生气。它把希望寄托在抽象的原则上，却忽视了国情差异，因此往往以失败告终。要避免重蹈覆辙，就得直面现实，搞清楚每个国家的需求，再在它们之间维持平衡。这些真知灼见，对基辛格后来的外交思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不仅如此，克雷默还把对“慕尼黑悲剧”的恐惧，注入了基辛格的头脑。1938年，英法两国在慕尼黑会议上，对德国大作让步，放任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二战”的导火索之一。这段历史，是克雷默最大的精神创伤。他反复强调：假如英法或者美国在1938年能够足够强硬，假如他们面对希特勒的恐吓，能拒不让步，德国的扩张就会戛然而止，就不会有后来的“二战”，犹太人大屠杀也不会发生。换句话说，和平不能经由让步而取得。即使意在争取和平，也必须不时展现“肌肉”。这种思维，日后深刻影响了基辛格在美越巴黎谈判中的立场。不仅如此，自视甚高的克雷默，还引导基辛格相信：作为曾经的德国人，他们不仅是以流亡者的身份，乞求美国的庇护，也给美国这个缺乏国际政治经验的新大国，带来了古老的欧洲外交艺术。可以说，基辛格的“国师”心态，同样得自克雷默。

从1944年到1947年，克雷默和基辛格这对师徒，从美国的新兵营辗转至德国的战争前线，度过了相互学习切磋的三年。到了1947年，克雷默果断建议基辛格申请哈佛大学，并以直属上级的身份，开具了推荐信。他在信里写道：“我认为基辛格具有卓越的资质。他能够耐心、勤奋地学习和做研究。没有这种能力，哪怕是最具智慧的人，也注定只能做个聪明的业余爱好者。”后来为基辛格撰写授权传记的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精辟地形容：那一刻，克雷默的身份，不仅是导师，还是引诱浮士德的魔鬼梅

一段长达半个世纪的师徒关系，就从路易斯安那的新兵营开始了。



基辛格（中）进入尼克松政府后，与昔日的导师弗里茨·克雷默（左）以及尼克松（右）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合影

菲斯特。他全然知晓，自己的门徒在进入哈佛之后，绝不甘心只做书斋里的历史学家。他注定会去从事真正的政治，并将直面人性的险恶与权力的腐蚀。对此，克雷默反复告诫基辛格：“胸怀大志者，将会面临形形色色的诱惑，比如贪婪和学术阴谋。但终极陷阱是你自己的性格。你希望全心全意，恪尽职守，但这份责任心带来的权力，以及它对正直信念的破坏，却是最致命的。”

在基辛格进入哈佛之后，克雷默也开始了自己的下一段冒险。他被美国国防部相中，出任安全政策高级顾问。在五角大楼，克雷默一直待到了1978年。他恪守自己作为导师和智囊的本分，不发表文章，不接受采访，也不要求升职。在服务于五角大楼和美国陆军的30年里，克雷默举荐了未来的国务卿黑格、未来的陆军参谋长艾布拉姆斯和未来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并被视为“冷战”时期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顾问之一。但与此同时，他和基辛格的关系也日益微妙。

1958年，克雷默提醒崭露头角的基辛格：“你做事变得有些不近人情了。现在你接触的人里，有太多大人物，真性情的人却很少。不要让自己陷得太深。”1968年12月，在基辛格正式宣布加入尼克松政府后，克雷默给他写了最后一封信，再次忠告说：“当你位高权重之后，人人都想从你身上捞到点好处。你会感到孤独，并且诚惶诚恐。保持绝对正直，找到你的同路人，不要卷进无聊的派系斗争。”

没有人知道，基辛格是否听进了这番话。但在1972年，他和克雷默最终决裂，随后28年没有说过一句话。2000年，这两位世纪老人重新恢复了来往。三年后，当克雷默在华盛顿去世时，基辛格在葬礼上伤感地表示：“他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座灯塔。”不过，对克雷默的最精准形容，还是来自他的老朋友彼得·德鲁克。1979年，德鲁克出版了自传《一个旁观者的冒险》，书里专门给克雷默留了一章，标题就叫“发明基辛格的人”。

奇怪的精神父亲

“这种教导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因为它不是靠学术地位，而是靠您的循循善诱，为学生指明发展的方向。”——1950年基辛格给艾略特的信

可以肯定的是，基辛格的哈佛岁月，开端并不美好。因为他在战前已经读了一年大学，校方批准他直接插班到政治学系念大二，1950年就拿到了本科文凭。这段时间里，基辛格在同学中没有交到多少朋友。因为哈佛在战后一次性扩招了50%，连宿舍都不够分配，同学之间经常几个月打不上照面。出身东海岸富裕家庭的同学，对基辛格这位“老学生”也不太客气。但在哈佛，基辛格结识了几位慧眼识英才的老师，其中就有他的“精神父亲”艾略特。

威廉·扬德尔·艾略特(William Yandell Elliott)是一位古怪的教授。他在哈佛主要讲授政治学导论，自己的博士专业却是欧洲文学研究。“一战”期间，艾略特曾以炮兵连长的身份在法国前线服役，后来干脆留在欧洲求学，拿到了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在当时的哈佛教授里，艾略特也许是最了解欧洲，也最具备全球眼光的人。他不仅和学生谈论欧洲文化，还向美国政府建言：在未来的“冷战”格局中，欧洲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理应与欧洲结成一体。或许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艾略特接纳了来自德国的基辛格，一直指导他直到1954年博士毕业。尽管他偶尔也对基辛格有些微词，批评这位大龄学生“实在太不优雅了，脑袋里装的全是日耳曼人那套教条不堪的系统论”。

平心而论，艾略特虽然一直看好基辛格的才华，但在学术训练上采取的是“放养”态度。他不关心基辛格的论文，也很少事无巨细地指导弟子的研究课题，只叮嘱基辛格“要从古典思想家那里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灵感”。基辛格那篇35000个单词的冗长本科论文，显然就出自艾略特的纵容。正是在那篇论文里，基辛格第一次宣称：在追求和平的善意与实际的和平状态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中间地带。要填补这个中间地带，光靠法律还不够，政治家也要发挥积极性，用高明

的权术来瓦解威胁和平的隐患。换句话说，理想主义的目标，需要现实主义的手段作为补充。

到了1954年，基辛格更是直接抛出了研究19世纪欧洲外交史的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要知道，和他同一年从哈佛毕业的政治学博士，还有13个人，其中12个人的论文写的是最热门的“冷战”政策。抛开现实问题，回到遥远的历史，除了克雷默的影响，和导师艾略特的偏好也有关系。在论文结尾处，基辛格大大方方地表示：“破坏政治秩序的通常有两种人，一种是征服者，另一种是先知。征服者用武力输出自己的观念，先知则追求永恒的、没有瑕疵的和平。政治家最应当警惕的就是这两类人。”在当时的语境下，“征服者”，无疑是指拿破仑和希特勒。基辛格呼吁用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来防范他们。“先知”，则是“一战”末期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正是他充满说教意味的“十四点方案”，导致“一战”结束后的世界陷入了新的动荡。基辛格力主用梅特涅式的“合法性”来约束这类人。

很难断言，艾略特有没有具体指导过基辛格的博士论文。基辛格的传记作者弗格森认为，当时已经58岁的艾略特，根本没有看过这篇论文的初稿。但艾略特确实鼓励了基辛格介入现实政治。在上世纪50年代的哈佛，艾略特最出名的事迹，并不是他那枯燥的政治学课，而是他主持的暑期研修班(后来演化为哈佛国际问题研讨会)。在这个开放的夏季课程里，艾略特会和来自全世界的学生，分享他对文学、人生以及政治的看法。他公开宣称：从事政治活动，对学者来说并不是一种堕落。相反，政治本身就是在人性的善恶之间做抉择。它可以检验学者在论文里描述的那些道德原则的可靠性。基辛格后来总结说：“艾略特眼里的政治，既不是历史研究的抽象主题，也不是展现辩证法才华的智力游戏。那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善恶斗争，是用行动给存在赋予意义，是用行动创造真正的史诗。”

实际上，艾略特自己就是一位醉心政治“实操”的学者。早在1942年，他就加入过罗斯福政府，出任战时生产委员会民用品部门副主任。从罗斯福到尼克松，有6位美国总统聘请艾略特担

任外交或政治顾问。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美欧合作”政策，就和艾略特有不小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最早把基辛格引荐给尼克松的人，其实也是艾略特。1960年美国大选中，艾略特是尼克松的演讲撰稿人。当时他提议：为了提高美国外交的效率，有必要设置一个直接听命于总统的职位，由这个人越过国务院，直接制定和执行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随着尼克松以微弱优势败给肯尼迪，艾略特的方案无疾而终。但到了1968年，当尼克松最终赢下大选后，他真的执行了艾略特的方案，把“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这个岗位变成了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关键一环。而尼克松挑选的第一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就是艾略特的得意门生基辛格。可以说，没有艾略特这条暗线，基辛格绝不会和共和党政治家产生关联，继而在未来进入白宫。

要知道，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艾略特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他的亲密弟子里，有未来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国务卿腊斯克以及《文明的冲突》作者亨廷顿。在夏季研究班里和艾略特促膝长谈的，还有未来的加拿大总理老特鲁多、以色列副总理伊加尔·阿隆乃至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可以说，艾略特一个人就串联起了美国东海岸的政治—学术精英群体，影响力还辐射到整个西方世界。对当时默默无闻的基辛格来说，挤进艾略特的“朋友圈”，意味着成为精英共同体的一员，可以向其他人“借力”了。实际上，艾略特不仅推荐基辛格担任哈佛国际问题研讨会的负责人，还积极为他寻找长期教职。基辛格能在40多岁时，就成为美国政府的重要智囊，和艾略特在外交系统以及学界的影响力是有直接关联的。这位个性独特的精神“父亲”，为基辛格的登堂入室，创造了重要的机会。

但艾略特也不可能给基辛格更多“身教”了。他比基辛格大27岁，“二战”结束时已经年近百，错过了转型为政治家的最佳时机。美国政府也不可能把严肃的外交政策，交给这位性格浪漫、过于随和的教授去规划。1963年从哈佛退休后，艾略特终于可以一偿自己的夙愿，前往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教授英语文学。那时，昔日的门生基辛格已经是白宫的常客了。但两人见面的机会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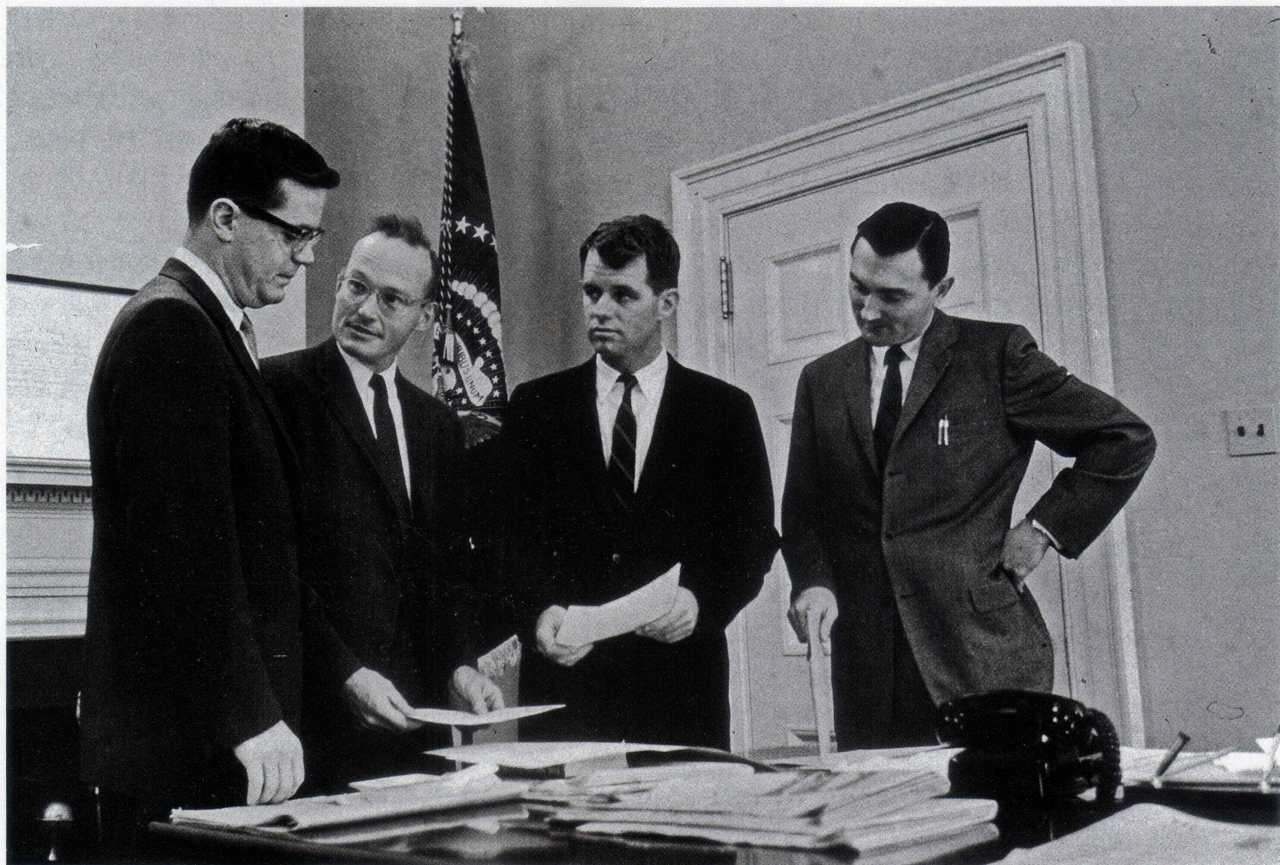
不多：1960年大选失利后，尼克松迁怒于艾略特，逐渐疏远了这位尽心尽责的前顾问。而正在和尼克松建立往来的基辛格，显然拿捏了其中的分寸。和第一位导师克雷默一样，艾略特直接离开了基辛格的生活。1969年，就在基辛格进入尼克松政府的同一年，艾略特彻底退休，返回农场隐居去了。

“第一个基辛格”

“固执己见的知识分子陶醉于初尝的权力滋味，强力推行自己的理论，也不管对官僚机构或职业军人的士气有何影响。”——1963年基辛格对邦迪的批评

1954年，基辛格31岁，已经是一位崭露头角的历史学者。但这个身份不足以为他谋得一个体面的职位。当时，美苏“冷战”正在激烈进行，美国外交界最关注的是现实问题，对基辛格钟爱的历史研究是不大在意的。但是，基辛格很快发现了美国“冷战”政策的一个漏洞。1949年之后，美苏两国都有了核武器，都具备对敌方进行毁灭性打击的能力。未来的美苏冲突，会不会发展成核大战，就成了争论的焦点。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艾森豪威尔政府里制定核政策的专家，主要是物理学家和军人。他们只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要么认为核武器是不道德的，应该彻底禁止；要么宣称核武器才是最终选项，应当不惜代价拿来攻击苏联。这种非黑即白的看法，让政府变得左右为难。

面对现实需要，基辛格毫无过渡地舍弃了自己偏爱的历史研究，开始朝核战略进军。1957年，他出版了自己的新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自此蜚声海内。在这本书里，基辛格冷静地指出：核武器只是战争的手段，不是目的。核武器就像大炮、飞机一样，是可以作为一种威慑工具来使用的。如果美国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维护自己的利益，就不能对苏联示弱，要敢于冒局部战争的风险。而杀伤力比较小的战术核武器，在局部战争中是可以“适度”部署和使用的。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当然是信口开河。所谓“有限核战争”的思路，很快也被重新否定。但在当时，它却是一



1961年2月24日，肯尼迪总统的演讲撰稿人索伦森、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乔治·邦迪、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以及总统秘书奥唐纳（由左至右）在椭圆形办公室外交谈

个独辟蹊径的主张，使美国政府可以在大规模核战争和放弃核武器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美国政治家第一次注意到，在哈佛大学，还有这样一位既懂历史，又关注现实的学者存在。基辛格一下成为政策研究界的新星。

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的重要性，就是在这个阶段凸显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邦迪才是“第一个基辛格”，是基辛格前半生极度羡慕并且希望成为的那种人。他只比基辛格大4岁，出生在波士顿的显贵之家，父亲做过助理国务卿，母亲是哈佛前校长的外甥女。邦迪本人走的是一条学术、政治两头挑的道路。1948年，当基辛格刚升大三时，29岁的邦迪已经有了三个身份：他既是哈佛大学主讲美国外交的客座讲师，又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的演讲撰稿人，还是著名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分析师。美国援助欧洲的“马

歇尔计划”，就是邦迪所在的研究小组制定出来的。1953年，34岁的邦迪被哈佛大学聘为行政学教授，并兼任文理学院院长。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是哈佛校园里地位仅次于校长的大人物。而基辛格在攻读博士时，就当过邦迪的助教，两个人就这样认识了。

邦迪对基辛格的最大影响，是展现了学术精英全面参与政治决策的可能。这和艾略特那种业余爱好式的出谋划策，还不太一样。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邦迪就宣称：哈佛毕业生的最佳出路，是进入政府，担任重要的行政职务，用自己的头脑为国家服务。当时美国有个概念叫“波士华”，它说的是：在波士顿附近的哈佛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来到华盛顿，成为政治决策圈的成员。这在美国政界新陈代谢的背景下，形成了一股潮流。邦迪本人，自然以“波士华”圈子的领袖自

居。基辛格很早就注意到了这种趋势。博士毕业前，他主动找到身为答辩委员的邦迪，袒露了自己对政治的兴趣，并暗示：自己正在关注的核问题，对邦迪未来的政治事业会大有帮助。于是，在1955年，邦迪第一次把基辛格带进白宫，参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内部会议。《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炮打响之后，邦迪又支持基辛格出任外交关系协会下属的核政策研究项目主任，并在1959年帮他搞到了哈佛的长聘教职。有一段时间，基辛格几乎成了邦迪研究外交政策时的“脑替”，两人结成了政治上的师徒关系。

与亲切随和、待人坦诚的艾略特不同，邦迪自视甚高，目中无人。但他有艾略特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通天”人脉。1960年11月，邦迪的好朋友约翰·肯尼迪以微弱优势击败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他打算提名刚刚41岁，而且是共和党人的邦迪出任国务卿。虽然这项动议在民主党内部的反对声中遭到否决，肯尼迪还是任命邦迪为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踌躇满志的邦迪，决心在政府里发展一个“哈佛帮”，把自己最优秀的学生都带到华盛顿。基辛格也得到了挑选职务的机会，他想去国务院，也就是美国的外交部。但邦迪否决了基辛格的想法，他告诉这位门徒：要想真正影响决策，就得待在离最高权力更近的地方。所以，与其去国务院，不如挤进白宫，在总统身边找一个位子。最后，基辛格决定加入邦迪本人的幕僚班子，负责研究欧洲问题。这个职位级别不高，但经常要跟总统开会，有机会参与最高决策。肯尼迪总统对基辛格的国际视野和业务能力，很快就有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基辛格被美国媒体称为“邦迪的神童”。有人甚至推测，他将来会成为邦迪的继任者。

然而，这对师徒的关系，渐渐出现了裂痕。新官上任的邦迪，一心要干一番大事业。他的终极目标是在未来当上国务卿，甚至有朝一日竞选总统。在这样一幅宏图里，年轻的基辛格不过是

个“工具人”，邦迪根本不会给他承诺步步高升的机会。反倒是肯尼迪，对基辛格颇为器重。1963年遇刺前不久，他曾经询问邦迪，是不是该给基辛格安排一个更重要的岗位。或许是出于嫉妒，或许是心存防范，邦迪的回答是：基辛格是一个“不可靠的阴谋家”，还是个扎眼的共和党人，过早提拔他并非明智之举。这段评论，很快传到了基辛格的耳朵里。因此，肯尼迪遇刺以后，他虽然继续为约翰逊政府工作，但和邦迪的关系已经变得相当冷淡。两人再也没能恢复到当初推心置腹的状态。

而邦迪本人，最终也没有实现他的宏图。挚友肯尼迪遇刺以后，约翰逊留用邦迪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甚至把他的二哥威廉也提拔为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但失去了肯尼迪的庇护，邦迪的傲慢和强硬，迅速惹怒了整个官僚机器。十几年后，基辛格在《白宫岁月》里感慨地写道：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往往会因为自视过高，断送政治前途。他们总觉得，自己比总统、参联会主席和国防部长更懂国际政治，时刻想要指手画脚。这种因为智力优越感形成的习惯，又会发展为部门间的权力斗争，最终闹得无法收场。邦迪便是在得罪完所有人之后，被迫于1966年离开白宫，重返学术界。近距离观察了这出悲剧的基辛格，从此也把邦迪当成重要的反面教材，引以为戒。可以说，正是邦迪这位“第一个基辛格”的倒下，催生出了后来那个圆滑世故、善于安抚尼克松的“2.0版”基辛格。

从洛克菲勒到尼克松

“曾有相当多的哈佛学者到华盛顿为肯尼迪效力，基辛格不过是其中之一。不同之处在于，他一直对洛克菲勒忠心耿耿。”——尼尔·弗格森《基辛格：理想主义者》

尽管在政治生涯的巅峰期，基辛格曾与尼克松有过亲密无间的合作，但他在共和党内部的“天使投资人”，并不是尼克松。1956年，当基辛格参加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内部会议时，第一次结识了48岁的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在1955年，邦迪第一次把基辛格带进白宫，参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内部会议。



(TPG/alamy 供图)

1968年7月11日，基辛格的政治投资人、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中）在华尔街参与拜票，希望在当年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上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

Rockefeller)。后者是美国前首富老洛克菲勒的孙子，通称“小洛克菲勒”，一生从未有过生计之忧。但在洛克菲勒家族的男性后代里，小洛克菲勒却是以才具平庸著称的。他曾被普林斯顿大学拒之门外，也缺乏商业嗅觉。或许是为了证明自己，小洛克菲勒选择从政。他担任过罗斯福政府的助理国务卿，也是艾森豪威尔的外事特别助理。在这两份工作上，他除了擅长组织国际援助，几乎弄得一团糟。1956年，小洛克菲勒已经决意离开联邦政府，专心经营自己的政治大本营纽约州，为将来参选总统做准备。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他和基辛格相遇了。

从认识小洛克菲勒的第一天起，基辛格就断定：这位大亨一定当不上总统。后来他在《白宫岁月》里解释说，小洛克菲勒的家庭出身，妨碍了他的政治事业。他担心民众质疑，自己想当总统是为了扩大家族的财富，所以总是瞻前顾后，不敢表露内心的真实想法。这样的性格，在面对坚韧的竞选对手时是很吃亏的，所以永远都差半步。但洛克菲勒也有他的优点。首先，他是一个

为人慷慨、永远充满乐观气质的人。一般人趋之若鹜的巨额财富，在他眼里不过是寻常之物，因此他从不焦虑。作为政治领袖，洛克菲勒会慷慨资助自己的亲信，也乐于提携年轻后辈。面对险恶的政治角斗场，他虽然缺乏孤注一掷的勇气，却颇有君子风度，这对急于出头的基辛格显然是一大利好。

不仅如此，洛克菲勒从自己过去的经历里，已经明明白白地知晓：他缺乏外交才能。而要竞选总统，阐述外交政策是不可或缺的。既然自己没有，就从外界借用。1956年刚认识基辛格，小洛克菲勒就注意到了后者的才气和表达欲。他当即决定，任命基辛格为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研究主任，并时不时把自己的豪宅和庄园借给这位新智囊使用。在1957年的一场谈话中，小洛克菲勒还告诫基辛格：“你强势，我也决绝。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两败俱伤，要么好好合作。”于是，在继续为民主党政府工作的同时，基辛格也开始深度参与小洛克菲勒的总统竞选布局。

这并不是一段圆满的政治故事。从1958年

到1970年，小洛克菲勒四次当选纽约州长，稳稳守住了大本营。但在总统大选中，他连共和党内部的初选都突破不了。1960年，赢家是尼克松。1964年，赢家是更强硬，也更保守的戈德华特。到了1968年，小洛克菲勒第二次在党内初选中不敌尼克松。他的巨额财富、君子风度和乐观精神，每当面临殊死一搏，都会一溃千里。身为核心智囊的基辛格，每一次都竭尽全力为小洛克菲勒助选，但都无果而终。

然而，小洛克菲勒的慷慨气质，再度发挥了作用。当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很难当上总统——他最终在1974年成为福特的副总统——并且赢家尼克松也急需外交政策智囊时，立即决定把基辛格“转租”给对方，好回报基辛格的多年追随。正是小洛克菲勒的这个决定，促成了1968年11月22日，基辛格在纽约第五大道与尼克松的正式会面。几天后，尼克松正式任命基辛格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他担任的，正是8年前麦乔治·邦迪的那个职务。

初见尼克松，基辛格就注意到：新总统有严重的“社恐”倾向。他在会见每位客人之前，一定要把自己想说的话写在小本子上，提前练习几遍，否则就会出现冷场。不仅如此，尼克松还是一个内心极度骄傲的人。他特别害怕被人拒绝，所以聊起天来永远在兜圈子，很少直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针对尼克松的这些特质，基辛格意识到：自己要充当的，不仅是总统的参谋，还要扮演心理治疗师的角色。他必须让尼克松感到安全和放松，这样总统才能在足够理智的状态下做出决定。他还要对尼克松做出鼓励和认可，以安抚总统的自尊心。

于是，法拉奇在1972年看到的那幅景象，就成了白宫里的常态。每天，基辛格会好几次穿过走廊，走进尼克松的房间，有时是汇报情况，有时则是闲谈家常。当尼克松打电话过来时，他也会在第一时间接听，哪怕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在这种直接接触中，基辛格会装作不经意地向总统透露，自己最近正在审读哪些报告，自己领导的国安会又在讨论什么新问题。这样的信息交流，让尼克松时刻感到自己正在参与一切重要

的外交规划，而不是被基辛格或者其他顾问蒙在鼓里，这对总统的不安全感有很大的缓解。

另外，基辛格还时不时向总统引荐几位自己熟识的学者，请他们来白宫做讲座，或者一起吃饭，这也让尼克松相当受用。要知道，尼克松从30多岁登上政治舞台起，就是美国鼎鼎大名的保守派。他在自由派知识分子扎堆的大学校园里，是很受鄙视的。尼克松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老是怀疑学者们会看不起他。现在，基辛格这位大知识分子成了总统的重要顾问，还把他介绍给其他学者，这让尼克松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在《白宫岁月》第四卷里，基辛格还提到了一件荒唐的小事。1972年尼克松结束对北京的访问后，美国有几家报纸提出了批评意见。尼克松马上找到基辛格，递给他一份自己起草的备忘录，要求基辛格召开新闻发布会，告诉美国新闻界尼克松为这次出访做出了巨大贡献。尼克松的办公室主任甚至给基辛格准备了一份“小抄”，上面列出了尼克松的十大优点。基辛格感慨地说，自己是又好气又好笑。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消息已经震撼了全世界，尼克松却还在介意有几家报纸不喜欢他。这种不安全感，使得尼克松最终在国内政策上越过了边界，引发了后来的“水门事件”，自己也因此下台。但在外交决策中，由于基辛格懂得精心安抚总统的情绪，两个人的关系一直相对融洽。

尼克松在美国媒体和学界的恶劣形象，也给了基辛格自我发挥的空间。媒体质疑甚至敌视尼克松，但对出身哈佛的基辛格却相对友好。他既不像邦迪那么傲慢，也不像克雷默一样谨慎，而是长袖善舞，妙语连珠。某种意义上，基辛格充当了尼克松的“光明”分身。他乐于会见记者，甚至主动约会好莱坞女演员，给自己营造花花公子的形象。这种自我塑造，满足了媒体的窥探欲，也弥补了基辛格青少年时代默默无闻带来的创伤感。他还反过来利用媒体，借助花边新闻，掩盖真正重要的政治决策。当然，这种操作，有时也会激起尼克松的嫉妒。因此，基辛格需要在日常相处中，对尼克松保持足够的尊敬和奉承。法拉奇观察到的那个矛盾的基辛格形象，正是因此出现的。

当然，尼克松需要的，远不只是基辛格的“心理按摩”。重用基辛格，也是他的政治斗争手段。1968年当选总统之后，尼克松任命的第一位国务卿，是他早年的好友威廉·罗杰斯（William P. Rogers）。罗杰斯当过司法部长，性格强势，但对外交问题涉猎不多。尼克松做出这个任命，是希望用罗杰斯的个性来压服自行其是的国务院系统。但罗杰斯根本不甘心只当尼克松的传声筒，他很快就跟国务院里的政策专家结成同盟，一起和尼克松争夺外交话语权。但尼克松的个性是回避冲突的，他不想立即罢免罗杰斯，于是绕过国务院，通过基辛格领导的国安会去推进最重要的外交布局。基辛格管这种做法叫“后门外交”。中美关系正常化等重大决定，都是通过“后门外交”去推进的。1973年，深感屈辱的罗杰斯最终宣布辞职。基辛格遂以国家安全顾问的身份，兼任国务卿，成为不折不扣的二号人物。

然而，基辛格对尼克松，从来只有引导和附和，没有规劝。当“水门事件”的恶果终于酿成时，他便顺理成章地“跳船”，继续留在福特政府里。

法拉奇讽刺说：“他甚至都没有前往医院，看看那位躺在病床上的老国王。”后来披露的信息证实，基辛格从一开始起，就是内部录音和窃听行动的推动者。他甚至不止一次推卸责任，把内部情报泄露的责任甩给下属，好让自己全身而退。但在尼克松退场之后，基辛格的人生目标，已经不再是改变世界。他开始为撰写回忆录，继续维持公众影响力做准备，也依然擅长利用媒体，保持恰到好处的出镜率。随着亲历过当年历史时刻的人们逐渐逝去，基辛格讲述的历史，成为唯一的权威版。❏

（参考资料：《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美]亨利·基辛格著，冯洁音、唐良铁、毛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基辛格：理想主义者》，[英]尼尔·弗格森著，陈毅平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美]亨利·基辛格著，方辉盛、赵仲强、陈瑶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基辛格传》，[美]沃尔特·艾萨克森著，朱敬文、李耀宗译，中信出版社，2023年等）

生活周刊

《读书》丰富生活

生活需要读书，



读书

12
2023
December

林小英、程猛 理解了县中，就理解了中国教育
葛兆光 「黑海东头望大秦」
杨志 腴腴的「门徒」
徐天 共同的信念：美国内战前的政治公器角逐
郑涛 美国宪制变迁中的国际贸易
短长书 挽歌与礼赞（张辉）·碑学视野下的颜真卿（朱天曙）·服制与服治（吴修成）·《七克》与晚明中西文明互鉴（魏京翔）
郑培凯 宋画中的茶器
黄晓、刘珊珊 辞采与门第：唐代赏石的牛李之争

《读书》2023年第十二期目录

林小英、程猛 理解了县中，就理解了中国教育

葛兆光 「黑海东头望大秦」

杨志 腴腴的「门徒」

徐天 共同的信念：美国内战前的政治公器角逐

郑涛 美国宪制变迁中的国际贸易

短长书 挽歌与礼赞（张辉）·碑学视野下的颜真卿（朱天曙）·服制与服治（吴修成）·《七克》与晚明中西文明互鉴（魏京翔）

郑培凯 宋画中的茶器

黄晓、刘珊珊 辞采与门第：唐代赏石的牛李之争

读者服务热线：(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8座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陈夏红 治国必先治德

关笑晶 清初顺天府学「旗舍」与「学宫」之争

王蔚 一九二九年清华留美考试风波

品书录 探究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的力作（陈植梧）·维多利亚的面纱（李三达、饶蕾）·水手归来：查尔斯·金笔下的黑海史（田洪敏）·碳循环的真相（陈倩）

张帆、牛金鑫 德国耶稣会改编「召公悲剧」的时代隐义

汪洋 为什么维斯特曼大陆没有车战

长安 胡萝卜骑士岸惠子

侯俊丹 欲娇龙，还是玉娇龙？



(王正康/视觉中国 供图)

人口萎缩的挑战与机遇

主笔·谢九

2017年以来，国内新生人口数量开始逐年下降。在经过连续多年的新生人口下降之后，中国人口总量在去年迎来了60多年来的首次负增长，人口萎缩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也开始显露出来。

幼儿园关停潮

人口萎缩带来的影响，既包括好的方面，比如减轻了过去因为人口过多带来的各种资源不足，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比如人口红利下降之后，对中国经济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口萎缩推倒的一块多米诺骨牌，最早发生

在幼儿园。今年11月30日，湖南省教育厅发布文件，要求“有序组织幼儿园设并转撤”，在我国人口下降的大背景下，这是首个省级政府部门正式提出撤停幼儿园。

事实上，即使没有政府的官方指导，市场机制也已经开始自发调整。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22年的幼儿园数量比上年减少5610所，下降近2%；在园幼儿数量从2021年开始负增长，当年减少了13万人，2022年降幅扩大，减少了178万人。

在出生率下降的大背景下，尽管人们对幼儿园萎缩的趋势有所预期，但幼儿园供需形势逆转之快，还是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就在前几年，很多地方的幼儿园入学还非常紧张，一些热门幼



(黄波摄/视觉中国供图)

左图：人口萎缩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出现在幼儿园

右图：2021年2月12日，湖北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新生儿护理区

儿园甚至出现过家长搭帐篷通宵排队的景象。

但几乎一夜之间，幼儿园就开始变得过剩，从一园难求变为一孩难求。先是市场之手自发调整，幼儿园数量在去年出现了15年来的首次下降。而最近湖南省教育厅更是公开发布《关于应对学龄人口变化调整优化中小学幼儿园布局的通知》，可见有些地方的幼儿园已经相当过剩，甚至需要政府力量介入指导和调整。

幼儿园大量关停，只是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开始，人口萎缩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全方面影响，现在才刚刚开始显露。

为了应对人口下降的趋势，我国在2016年放开“二孩”政策，当年的出生人口数量达到了1786万人，比2015年多131万人。但刺激效应只维持了一年，以后每年出生人口就以100万左右的数量萎缩，直到2022年人口总数出现负增长，当年新出生人口为956万人，比上年减少了106万。

我国这一轮出生人口下降从2017年开始，而我国幼儿园入学年龄为3岁，以这样的时间周期来看，我国幼儿园在园幼儿数量从2021年开始减少，2022年幼儿园数量减少势头加大，基本上和出生人口的走势相吻合。

按照这样的趋势来看，未来我国的幼儿园关闭大潮还会更加激烈，因为人口萎缩的趋势还在加速。今年8月份，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乔杰表示，“预计2023年出生人口数为700万~800多万”。如果按照800万来算，和2016年相比，出生人口已经下降了超过一半。在这样的人口趋势之下，未来的幼儿园，乃至小学、中学、大学都会受到越来越明显的冲击。

幼儿园大量关停，对于相关从业人员而言，意味着工作机会和投资机会的流失，不过，对于学生家长而言，幼儿园从紧缺变为过剩，还是会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家长的压力。

首先，幼儿园入园将变得更加容易，除了少数热门幼儿园，大部分幼儿园的入园门槛将越来越低。更重要的是，家长们渴望已久的小班制也将变得更加可行。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幼儿园的园均幼儿数量为205人，去年已经下降到160人。

经济影响

幼儿园只是一个开始，由此往上推，从小学

到大学，入学难度也将变得越来越低。尤其是考大学，将来会变得更加容易。2022年，全国参加高考的考生人数为1193万人，录取人数达1015万人，录取率已经高达85%。去年我国新生儿数量只有956万人，以现在大学每年1000万左右的招生人数来看，意味着理论上人人都有大学可上。如果今年新生儿下降到800万，将来他们不仅可以轻松上大学，甚至还可以轻松上好大学。

这反过来给大学造成了极大压力。按照现在的出生人口趋势，大学的过剩已是不可避免，日本和韩国就曾经有大量大学因为招不到学生而关闭，这样的场景估计在中国也并不遥远了。

对于中国学生而言，在考大学之前，还有一次“普职分流”的压力，也就是中考之后，学生要在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之间做出选择。部分地区甚至对普高和中职按照5:5分流，也就是有一半左右的学生将无法入读高中，这给很多学生和家长带来很大压力，“普职分流”在最近几年也成为个极富争议的话题。

不过，在人口下降的趋势下，普职分流的压力在未来也会越来越小。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最近几年开始打通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通道，中职学生也可以参加高考。更重要的是，随着学生数量下降，高中也将很快感受到生源压力，需要吸引更多的学生，所以，将来“普职分流”的体系即使长期存在，流向普通高中的比例也会越来越高。比如这次湖南省教育厅发布的文件，就提出“适度扩充普通高中资源”以及“调整撤并一批薄弱中职学校”。在生源有限的背景下，将来越来越多的生源流向高中而不是中职学校，可能是大势所趋。

一直以来，中国的教育面临人口过多和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这种局面也给学生和家长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负担。现在，随着人口总量萎缩，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将明显缓解，对于学生和家长们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减负。

长期以来，我国人口规模过大，导致很多方面都面临僧多粥少的紧张局面。随着人口总量减少，不仅是在教育领域，在其他很多方面，人均资源不足的局面都会有所缓解。这可以算是人口萎缩带来的红利。

但是从更长远来看，对我国的养老体系会带来更多的压力。因为我国的养老金制实行现收现付制度，也就是由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缴纳养老金，供养已经退休的上一代人。中国出生率越来越低，意味着将来的年轻人口比例越来越低，而我国同时又在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的老年人口已是全球最多。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叠加年轻人口比例下降，从养老的角度来看，就意味着抚养比越来越高，每个工作的年轻人需要供养更多的老年人，这将对我国养老体系的可持续性带来巨大挑战。

人口萎缩更大的影响还在宏观经济层面。从中国经济的角度来看，人口萎缩意味着发展模式面临巨大挑战。中国经济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奇迹，很大程度建立在人口优势之上，既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又有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人口红利为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市场提供了巨大的竞争优势。不过，随着人口进入萎缩周期，中国经济曾经的优势开始慢慢减弱，给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带来了挑战。

最直接的影响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第一是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第二是庞大的内需市场出现萎缩。

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角度来看，在中国人口下降的同时，其他部分国家的人口还在呈现上升势头，包括印度、东南亚和非洲等地的人口快速增长，对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构成直接竞争。今年上半年，印度人口总数超过中国，“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的称号从中国转移到印度。在人口红利的光环之下，印度开始成为全球焦点。尤其是最近印度股市大涨超过20000点，和2020年初相比足足上涨了一倍，更是吸引了全球目光。而中国股市却在近期再度跌破了3000点。虽然影响股市走势有很多方面的因素，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投资者对于未来的信心。

过去中国商品能够畅销全球，低劳动力成本奠定的价格优势功不可没，随着现在人口红利慢慢消失，全球其他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更具成本优势，中国出口依靠低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将会逐渐减弱。

最近几年，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多方面的因素叠加，外资对于中国的兴趣也有所下降，出现了向全球其他地方转移的迹象。今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更是出现负增长，显示出外资转移的速度加快。

人口萎缩还意味着很多产业的需求会随之下降。在中国诸多重要产业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房地产行业会遭受多大的冲击。

中国房地产商品化改革以来，房价上涨了20多年，支撑房价持续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人口基数过大，对于住房的需求远远超过了供给，所以推动房价不断上涨。不过，随着中国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房地产的供给变得非常充足，已经超过了市场需求。今年7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做出了重要定性——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换言之，也就是房地产从供不应求转为供应过剩。

随着中国人口进入萎缩周期，需求下降会带来更强烈的冲击。

倒逼“聪明增长”？

我国人口萎缩的速度远远超过预期。2019年，中国社科院曾经发布一份人口报告，预期我国人口负增长可能提前至2027年到来。但事实上，我国人口在2022年就出现了负增长。2022年末，全国人口总数141175万人，比2021年末减少85万人，出现61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

通常而言，一位育龄妇女生2.1个小孩，也就是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1的水平，才能保证下一代的人口总数不下降。我国在2022年的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1.09，低于日本的1.29。如此低的生育率，意味着人口萎缩几乎已经不可逆转。对于房地产而言，人口快速萎缩意味着需求塌方，将来会出现大量房产空置的现象。就像日本，在很多偏远地区都有大量无人居住的房屋，这是人口萎缩和过度老龄化之后的必然现象。

对于中国房地产而言，很多下一代年轻人可能根本就不需要买房，可以直接从上一代甚至上两代继承房屋。按照央行在2019年的统计数据，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为96.0%，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占比为58.4%，有两套住房的占比为31.0%，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占比为10.5%，户均拥有住房1.5套。如此高的住房拥有率，意味着将来的很多年轻人已经没有买房的必要和需求。

当然，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人口萎缩带来的既是挑战，同时也是机遇。因为中国经济过去对人口红利过度依赖，对于技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视程度不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更多是靠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这种增长模式只是赚取低端的辛苦费，而一个真正的发达经济体，需要摆脱这种低端增长模式，通过高科技拉动增长，在产业链上赚取更丰厚的利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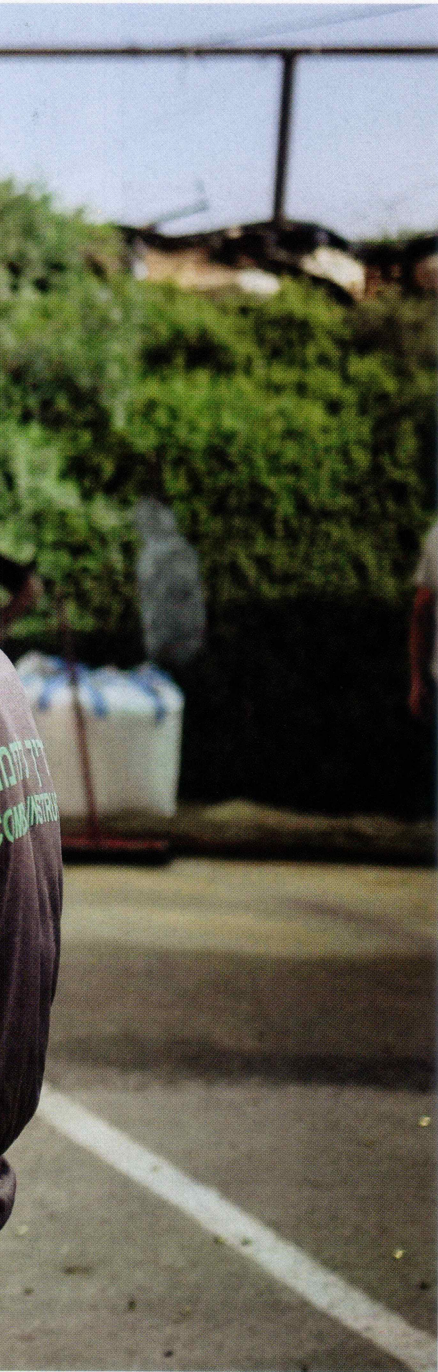
经济学上有一个专业名词叫作“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指在各种要素的投入既定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各种要素的使用效率而带来的额外产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一个国家投入100元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最后可能产出150元，多出来的50元从何而来？索洛将多出来的50元归功于技术进步等因素，索洛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就是技术进步。后来的研究者进一步拓展，将企业家精神、制度创新等所有解释不清的要素都归为此类，统称为“索洛残值”，又称全要素生产率。

一般而言，如果一个国家的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则被视为不可持续的“蛮力增长”，而如果增长源泉来自于技术创新等索洛残值，则是一种可持续的“聪明增长”。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大多数来源于前者，而现在，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只有通过高科技提高生产率，才可能维持中国经济继续增长，这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升级为发达经济体的必经之路。从历史上来看，所有获得成功的发达经济体，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或者靠房地产来获得成功的。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当前的人口萎缩，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倒逼改革，逼迫中国经济摆脱低端增长的模式，寻找更高端而且更可持续的增长之路。■



加沙以外：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问题调查

记者·程靖 编辑·徐菁菁



(视觉中国 供稿)



10月7日，哈马斯突破以色列南部边境，残忍杀害1200多名以色列人，并劫持人质222人。这场前所未有的袭击使加沙地带再次卷入血腥战争，也让巴以问题重新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

事实上，在哈马斯突如其来的袭击之前，长期关注地区局势的分析人士已经在担忧可能有一场新的巴勒斯坦人大起义将要爆发。2007年巴勒斯坦内战后，哈马斯武力夺取了加沙控制权，多年来主导巴以和谈的法塔赫（Fatah）在约旦河西岸组建过渡政府。加沙并不是唯一的问题，相对“和平”的约旦河西岸并不宁静。近年，围绕以色列定居点的持续扩张，定居者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循环，都已将“以土地换和平”的愿景卷入深渊。

不平静的西岸

11月2日傍晚，巴勒斯坦人丽玛（Reema Abu Safat）从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Jenin）驾车回纳布卢斯（Nablus），快到家时发现路不通了：前方有以色列定居者发动袭击，检查站被以色列军方关闭。两周后，她通过电话给我讲述了那个惊险的夜晚：两个孩子还在家里等她，因此她决定走另一条小路。原本一小时的路程，她在盘山土路上绕了近两小时才回到家。到家后她才发现，受袭的正是自己家所在的村子代尔沙拉夫（Deir Sharaf）。定居者放火烧了一辆车和几棵橄榄树，开枪打伤了两名男青年，所幸没有人丧生。

10月7日，哈马斯突破以色列南部边境，残忍杀害1200多名以色列人，并劫持人质222人。以色列的反击迅速将加沙卷入血腥战争，根据加沙卫生部数据，截至12月3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15500人在战争中身亡。在约旦河西岸，安全形势同样在恶化。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

左图：11月2日，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米戈达尔·奥兹定居点，以色列民众在靶场练习射击

右图：6月20日，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纳布卢斯市，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到访艾利定居点，此前有4名以色列定居者在当地被巴勒斯坦枪手杀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次日宣布将在艾利新建1000套住房



上图：4月10日，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的贝塔镇，巴勒斯坦人在轮胎墙后躲避以色列士兵。围绕以色列定居者合法化艾维亚特尔前哨定居点的游行，以色列军方和前来抗议的巴勒斯坦人展开对抗

下图：2021年7月2日，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艾维亚特尔前哨定居点的航拍图像。当时以色列政府要求定居者撤离，同时承诺不会推倒定居点，而是将定居点转型成一个军事基地。巴勒斯坦人批评称，该协议允许以色列人进一步“偷窃”巴勒斯坦土地

协调办公室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简称“OCHA”) 记录, 10月7日以来, 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领土上共发生了299起以色列定居者制造的暴力事件, 平均每天会发生5起。

事实上, 在哈马斯的突击和以色列的反击之前, 长期关注地区局势的分析人士已经在担忧巴以冲突的升级。今年3月, 牛津大学现代中东史教授尤金·罗根 (Eugene Rogan) 访问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他告诉我, 巴勒斯坦人对“美好未来”已经不再抱希望, “昨天受苦、今天受苦, 明天还会受苦”。他感到, 这种巨大的压力已经濒临临界值, 似乎一场新的巴勒斯坦人大起义就要爆发。

巴勒斯坦局势的紧张化, 和今年以来以色列政坛的变化不无关系。今年6月,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 (Itamar Ben-Gvir) 访问了约旦河西岸一处前哨定居点。本·格维尔来自以色列极右翼的犹太力量党 (Otzma Yehudit), 以反阿拉伯人的意识形态闻名。他本人曾公开威胁1995年签署了《奥斯陆和平协议》的以色列前总理拉宾, 还在家中悬挂过1994年在希伯伦屠杀29名穆斯林的犹太枪手戈尔茨坦 (Baruch Goldstein) 的画像。去年11月, 他率领的犹太力量党在2022年的议会大选中获得6个席位, 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中右翼利库德集团组成联合政府。本·格维尔也因此拿下了国家安全部长一职。

在约旦河西岸, 本·格维尔呼吁以色列政府发起全面军事行动, “以色列的土地必须得到解决……我们必须拆除建筑物, 消灭‘恐怖分子’, 不是一两个, 而是几十个、几百个, 如有必要甚至是成千上万的人”。他还呼吁以色列人加快在西岸的“定居”: “以色列的土地属于以色列人民, 我们支持你, 跑到山上, 安定下来。我们爱你。”

不久后, 本·格维尔的言论遭到了以色列国内安全部门辛贝特主管罗宁·巴尔 (Ronen Bar) 批评, 后者曾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说: “‘犹太恐怖主义’只会煽动‘巴勒斯坦恐怖主义’, 并让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得到增强。”然而, 本·格维尔上任以来三度擅闯阿克萨清真寺的行为进一

步刺激了巴勒斯坦人。在针对以色列袭击不断增加的背景下, 今年10月7日前, 以军在西岸向巴勒斯坦人发起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200人死亡, 是历史高点; 已有至少700座巴勒斯坦人的建筑物被犹太定居者拆除; 在西岸, 平均每天以色列定居者会发起3次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袭击。

以色列定居点扩张问题是巴以和平解决方案中最具争议的要素之一, 也是约旦河西岸冲突的核心。根据1947年的联合国大会第181号决议, 巴勒斯坦地区被划分犹太国 (以色列国) 和阿拉伯国 (巴勒斯坦国)。其中, 阿拉伯国家 (巴勒斯坦) 的领土包括加利利、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三个地区。但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 巴勒斯坦领土全部被以色列占领。

1995年,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简称“法塔赫”) 时任主席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时任总理拉宾签署《第二阶段奥斯陆协议》。根据协议, 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被划分为A、B、C区。其中,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即巴方政府) 在A、B区实现有限自治, 占西岸约60%土地面积的C区被以色列军事控制, 但C区应在18个月内逐步交还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管辖。按此规划, 完整的约旦河西岸将和加沙地带、东耶路撒冷一起, 成为巴勒斯坦国的组成部分。

然而近30年过去, C区的归还从未实现, 以色列定居点却像雨后春笋般在约旦河西岸建立起来。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第一个定居点建于1967年, 但大规模扩张是从1977年时任以色列总理贝京 (Menachem Begin) 带领利库德集团 (Likud) 执政后开启的。时任利库德议员、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定居部负责人马蒂蒂亚胡·德罗布尔斯 (Matityahu Drobles) 制订了一份在西岸建立定居点的全面计划, 即未来将大多数定居点都建立在巴勒斯坦人口中心周围的山脊线上。而时任以色列农业部长, 后来担任总理的沙龙 (Ariel Sharon) 又扩大了德罗布尔斯的方案, 即未来除了一些人口高度聚集的巴勒斯坦社区外, 西岸所有土地都会处于以色列主权下。

巴勒斯坦比尔采特大学建筑工程与规划系助理教授阿卜杜拉赫曼·基塔那 (Abdallahman

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居住者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变化。

Kittana)告诉我，以色列政府扩张定居点的目的有三：一是在宗教意识形态下“净化”西岸土地；二是建立针对约旦潜在军事威胁的防御工事；三是阻碍巴勒斯坦城市扩张和村镇间的往来，对西岸的水、耕地、自然保护区等资源进行战略控制。

但定居点的扩建并不完全由以色列政府意志主导。6月，本·格维尔访问的前哨定居点叫艾维亚塔尔（Evyatar），位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城市纳布卢斯南部的一片矮丘上。它的建造，是近年来以色列定居点扩张的一个缩影，生动展示了“鸡生蛋、蛋生鸡”式的暴力循环，如何将“以土地换和平”的愿景卷入深渊。

艾维亚塔尔的建造最初始于一场“意外”。2013年4月，一名以色列武装定居者艾维亚塔尔·博罗夫斯基（Evyatar Borovsky）在西岸北部一个公交站，被巴勒斯坦人持刀袭击后不治身亡。他的死亡激发了以色列人在纳布卢斯郊外以死难者的名义“开拓”疆土的愿望，于是他们占领了一片土地，用帐篷和简易房屋“建造”了艾维亚塔尔。

由于未经过以色列规划和管理法授权，艾维亚塔尔曾多次被以色列政府拆毁。2021年5月，又一名犹太人在西岸遭遇巴勒斯坦枪手袭击而丧生，50个定居者示威一般地搬回了艾维亚塔尔。不久后，在巴勒斯坦人的示威和以色列政府的劝阻中，他们曾再一次离开。然而，今年2月，一对犹太兄弟开车经过巴勒斯坦村庄胡瓦拉（Huwara）时，被一名巴勒斯坦枪手开枪打死。几百名以色列定居者很快就包围了胡瓦拉村，在混乱中烧毁了约30座房屋和几辆汽车，还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作为对袭击的回应，定居者们又回到了艾维亚塔尔。

这一次，定居者有本·格维尔撑腰。他们统一战线向政府施压，希望将“先斩后奏”建立的前哨定居点合法化。在那以后，围绕艾维亚塔尔

的暴力并没有停止。人们为一块土地付出的鲜血越多，就越不可能放弃它。对争夺的双方来说都是如此。截至今年，已有8名巴勒斯坦人在抗议艾维亚塔尔建设的过程中死亡。

据以色列民间组织“现在就和平”（Peace Now）统计，像艾维亚塔尔一样的前哨（非法）定居点，在约旦河西岸目前有144个；政府批准建造的定居点则有146个。

谁的土地？

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居住者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变化。以色列人米哈尔·弗罗曼（Michal Froman）出生在耶路撒冷附近、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示罗（Tel Shiloh）。示罗是在以色列占领西岸一年后，也就是1968年落成的。当时的定居者由几百名犹太学院学生和少数家庭组成。他们成为定居者有明确的宗教和意识形态目的。示罗是希伯来圣经中提到的圣地之一，曾是耶路撒冷第一圣殿建造前，古以色列国宗教活动的中心之一。

米哈尔告诉我，她结婚后搬进了位于西岸更北方丘陵上的特科亚定居点（Tekoa）。特科亚1975年建立，相比示罗，它的居民相对多元，有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有世俗犹太人，也有苏联来的移民。

在以色列，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定居点的不断扩建。2016年，以色列纪录片导演艾利斯·扎基（Iris Zaki）决定到特科亚定居点完成她的博士作品——一部全部由采访组成的纪录片。艾利斯的祖辈来自埃及，奶奶曾是开罗著名的犹太歌手，爷爷却是穆斯林，还给了她一个典型的阿拉伯姓氏“扎基”。艾利斯曾经认为，在以色列政治光谱中属于左翼的自己，和住在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后，以色列政府宣布“冻结”定居点建设，但极右翼人士的房车和帐篷停在巴勒斯坦人村庄之间的土地上，宣布建立前哨定居点。“我觉得这些人试图影响政治进程，但不是以民主的方式，而是先创造一个‘现实’，

然后等待现实被合法化。”艾利斯说。

来到特科亚后，艾利斯很快发现，定居者和她的想象并不一样。他们并不都持一样的宗教和政治观念。他们中有年轻时辍学参加极右翼团体、开辟前哨定居点的女性，也有在自家农场雇用巴勒斯坦农民的男子，和在言谈中流露出对巴勒斯坦人同情的居民，“他们受过教育、很聪明、有情商，看得到巴以冲突的问题所在，但他们选择继续住在这里”。

艾利斯告诉我，住在特科亚的大多是中产阶级，许多人在耶路撒冷工作，另一些在定居点自给自足的社会体系里工作：小学、幼儿园、酿酒厂、农场和商店里。由于定居点的房价远远低于特拉维夫等大城市，艾利斯的邻居里有不少毕业生和单身青年。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赵萱曾在2012年至2013年在巴以地区进行了15个月的田野研究。他告诉我，1977年利库德集团执政后，将定居点建设作为耶路撒冷等大城市“郊区化进程”中的一环，即先建一个定居点，再建设配套的公路将定居点与城市连接起来，将城市范围扩大，定居点本身也可能扩大成为城市。对以色列中产居民来说，一个很现实的吸引力是定居点能让他们避开拥挤的城市，住进停车容易、房价更低的郊区。

为了保护以色列人安全，以色列军方在通往定居点的道路上设置了诸多检查站；为了将检查站连接起来，以色列还修建了隔离墙。赵萱将这一套系统称为“基础设施政治”。定居点对点的连接，事实上“切割”了巴勒斯坦土地。今天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聚居区其实已经被分割成160余块飞地。巴勒斯坦人的自由流动受到限制，即使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镇之间往来也需要经过以色列士兵的盘查。

而这种“切割”，看似拓展了以色列人的土地，保障了他们的安全，但也让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生活在此彼此隔离却又偶尔会“相撞”的世界里。即使持有温和观念的人们，也会被无差别地卷入日常的对立和接连不断发生的对抗事件里。

来自西岸城市伯利恒的导游萨利赫（Abu Laban Saleh）在伯利恒经营旅馆，生活与以色列定居点并无交集，只会在检查站和公路上与以色列人相遇。今年8月，萨利赫的哥哥和嫂子开车在60号公路上，快到拉姆安拉时和一辆以色列定居者的车迎面相撞，导致怀孕7个月的嫂子流产。然而，迅速从附近定居点赶来的救护车和警察仅仅接走了受伤较轻的以色列人。

“我哥哥又叫了巴勒斯坦的救护车，嫂子整整一小时后才被送到医院。她的孩子没有了，自己也差点丢掉了性命。”萨利赫告诉我。萨利赫的哥哥和嫂子决定起诉最早赶来的救护人员。但对方是以色列定居者，巴勒斯坦法院只有受理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案件的权力。因此他们只能将案件提交给以色列民事法院，如今还没有结果。

平日里要带游客出团的萨利赫，常常在公路上遇到麻烦。他向我回忆2021年1月的一个夜晚，当时他带着一群本地游客，在西岸胡瓦拉村附近的检查站被士兵拦下，“因为司机的兄弟被逮捕了，士兵通过司机的手机信号追踪到了司机，要把他也带走调查。那是冬天，接近午夜，天气很冷，我们的车上有老人和小孩，但士兵们把司机带走后，还搜查了我们所有人和行李。我们足足过了3小时才等到另一位司机赶来接我们”。

在艾利斯的镜头中，特科亚定居点的居民会在夕阳西下时，在数百米深的山谷前做瑜伽。那时，他们就能够俯瞰到山下巴勒斯坦人的村庄和牧群。山上和山下是两个世界。以色列人不能进入巴勒斯坦人的村庄，巴勒斯坦人除了务工外无法进入定居点。定居点给巴勒斯坦人提供的工种有建筑业和农业。士兵每天通过狭窄的安检通道把前来务工的巴勒斯坦人放进社区的围栏里来。以色列马可政治经济学中心（MCPE）的一份研究发现，2014年以色列针对西岸定居者的人均公共支出要比特拉维夫或耶路撒冷公民高出一倍，其中大部分用于保障定居者的安全。

然而危险还是时时发生。在特科亚，艾利斯刚刚将摄影机立起来，就被定居者泼了冷水：“你们特拉维夫来的左翼，轻飘飘地批判我们，可我们这里（因为巴勒斯坦人的袭击）死过人，他

左图：11月9日，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在与以色列军队的冲突中

右图：10月8日，以色列北部边境靠近黎巴嫩的公路上，乘坐装甲车的以色列士兵。10月7日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打响后，以军向北部黎以边境地区也部署了大量军力



(视觉中国 供图)



的鲜血就洒在这条人行道上。”一位名叫莫里亚(Moriya)的女性接受了艾里斯的采访，她成长在定居者矛盾最激烈的巴勒斯坦城市希伯伦。“我小时候最害怕的就是被巴勒斯坦人捅死，”莫里亚坦承，“所以我不忌讳我有法西斯倾向。”

在特科亚，米哈尔·弗罗曼可能是唯一会和巴勒斯坦人保持雇佣关系以外的往来的以色列人。她是以色列和平活动家梅纳赫姆·弗罗曼(Menachem Froman)的儿媳妇。在属于《奥斯陆协议》的时代，弗罗曼和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和哈马斯创始人亚辛都保持了密切联系。

但米哈尔的一生都在和逃不开的暴力纠缠。在示罗长大时，她经历了1987年发生的“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她有朋友和邻居就在袭击中遇难。米哈尔告诉我，“我是在恐惧中长大的。第二次起义的时候，他们在公交车上放炸弹，在路上开枪。”

2016年1月18日，米哈尔在特科亚的一家服装店购物时被一名闯入定居点的巴勒斯坦男孩捅伤。当时，她还怀有5个月的身孕。那个16岁的男孩在朝米哈尔的肩部和胸部分别刺了一刀后，被一名武装定居者开枪击中腿部，随后被以色列军人逮捕。那段时间，有至少25名以色列人在巴

勒斯坦人的袭击中死亡。

在和米哈尔的交谈中，我感受到了“和解”的复杂。它并不会因为人们对和平生活的渴求，在人们之间偶然发生的宽恕中诞生。历史的沉疴，和个人经历中层层叠叠的伤痛齐齐压在人们心头，将他们拽入矛盾的漩涡。米哈尔强调，她相信，巴以两个民族都属于这片土地，只要对方放弃暴力，就可以和平共处。但在通话中，她同样也用了很长时间为我解释“犹地亚和撒马利亚”(即约旦河西岸在希伯来文化中的名称)在《旧约》和《妥拉》中的重要性。上世纪90年代，她的公公弗罗曼曾表示，即使未来巴勒斯坦国建立、以色列军队结束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后，他依然会在定居点生活。30年后，出生于西岸、生活在西岸的米哈尔主张更进一步：“以色列地就像我们的母亲，这里(西岸)是母亲的子宫，我们能把母亲一分为二，把子宫让给别人吗？”

结束在特科亚的为期两个月的拍摄后，艾里斯启程回特拉维夫。离开前最后一天，她邻居女孩的父亲在回定居点的公路上，遭遇巴勒斯坦人伏击后不幸中弹身亡，女孩的恸哭穿透了她的墙壁。“那时邻里弥漫着悲伤，我也感到焦虑，我不



(视觉中国 供图)

喜欢受袭后敏感、应激的氛围。”

离开后，艾利斯依然坚持定居点的扩建是错误的，她不会生活在巴勒斯坦人和国际社会都认为是非法的地方。但她开始“理解”定居者，“若我出生在定居点，或生来是个加沙或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我的想法可能会很不一样”。

燃烧的西岸

10月7日的哈马斯袭击和以色列随后采取的加沙攻势，让西岸进一步走向暴力和对抗。

以色列“犹太拉比人权组织”（RHR）的志愿者达娜·沙龙（Dana Sharon）每年秋天都要去西岸，陪同巴勒斯坦农民去他们的地里摘橄榄。有达娜这样的以色列人帮忙交涉，农民们常常能安心劳作，不会受到以色列定居者的骚扰和袭击。

但这一次，11月7日早上，达娜失败了。在西岸西部的代尔伊斯提亚镇（Deir Istiya），达娜准备和农民阿尤布·阿布赫杰勒（Ayoub Abu Hejleh）去地里查看他的橄榄树时，和十几名以色列士兵与持枪定居者狭路相逢。后者强行带走了阿尤布。阿尤布“失联”两个多小时后回到家中。

据他说，他被蒙上眼睛、戴上手铐，被带去附近定居点的军人办公室审问了两个小时。

阿尤布说，10月13日，就有一群来自附近定居点的犹太人开着挖掘机来，挖断了通往他家橄榄园的土路，还切断了他安装的灌溉水管。但他的遭遇并不算特殊。就在10月底，纳布卢斯南部一位农民死在了自家的橄榄树林中。三天后，以色列国防军逮捕了一名涉嫌杀害他的休班士兵。

事情原本不该如此——RHR前成员、另一人权组织“妥拉正义”（Torat Tzedek）的创始人亚历克·阿舍曼（Rabbi Arik Ascherman）告诉我，根据人权活动家们推动实施的法律，以军本该在橄榄收获季节保护位于C区的巴勒斯坦农民。但以色列对哈马斯宣战后，以军以“没有人手”为由拒绝了土地位于西岸C区巴勒斯坦农民的采摘申请。“更重要的是，在哈马斯屠杀和劫持以色列人后，感到痛苦和愤怒的以色列军人已经不想再去区分‘恐怖分子’和与‘恐怖袭击’无关的无辜群众了，他们觉得没有义务再去保护巴勒斯坦人。”亚历克说。达娜和亚历克在今年橄榄季节格外“空闲”。达娜告诉我，“当我问起巴勒斯坦农民是否需要陪同时，他们会说，‘最近太危险了，你们别过来了’”。

“第二次大起义”结束近20年后，无差别袭击再次在西岸蔓延开来。仅仅今年上半年，就有近30名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人的袭击中丧生。过去一个多月里，西岸发生了多起枪击、车撞人事件。休战期间的11月30日，更有2名巴勒斯坦枪手在耶路撒冷的公交车站射杀了4名以色列平民。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OCHA）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西岸有443名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丧生，成为2005年OCHA有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其中242起死亡是10月7日后发生的，比2022年全年被打死的巴勒斯坦人数（171人）还要多。这242人中，有234人在以军事行动、抗议或主动袭击后被以色列军队杀害，8人被定居者杀害，其余2人仍不确定。10月7日至12月3日，西岸还有327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超过3000人被捕。其中杰宁、图尔卡勒姆死伤最为惨重。■

（实习记者王泽玮对本文亦有贡献）

坍塌的体育馆与“人脉”中的新县城

记者·夏杰艺 陈银霞

桦南人大多不记得年纪尚轻就退休的建设局干部吴立迁，但对成为地产开发商后的吴立迁却印象颇深。一个普通桦南居民的生活，多少都会跟他打造的某个空间发生关联。悦城广场的“好日子超市”是县城最大的超市之一，下班时间总是大排长队。二楼开设的密室逃脱和剧本杀，则很受年轻人欢迎。悦城体育馆周末人满为患，经常被企事业单位包场，甚至需要提前几天预订。吴立迁建设的红馆酒店和丽舍酒店，分别是县城过去和现在最高档的宴请地，大部分人的婚宴和学子宴都在这里举行。遇难者郑权甚至家中三代都住在吴立迁建设的小区里。

事故

11月6日，桦南初冬的第一场大雪，一脚踏进去，雪就陷到了小腿肚。

这里是黑龙江省东北部，长白山余脉，佳木斯市下属的小县城，比古代流放地“宁古塔”（今牡丹江海林市）还再偏北一些，开车四小时即可到达中俄边境。桦南林地辽阔，矿产丰富，但由于近年提倡资源保护，砍伐和开采受限，产业逐步凋零。入冬后的桦南白昼很短，下午4点太阳就落山了，寒冷和贫困致使人口连年外流，如今仅剩20余万。县城很小，5块钱足够打车去城里任何地方。

11月初，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雪红色预警，学校全部停课，但对于一群十四五岁、生长在北方的少年来说，正是出去玩耍的好机会。夏普声是桦南县第三中学初二的学生，11月6号这天，他和十来个同龄人约着一起出了门。

一起玩的同学记得，那天中午，大家先是为到露天的桦南体育场打雪仗，玩了俩小时还没过瘾，又跑到空旷宽阔的世纪生活广场玩摔跤，“听说那边雪更厚、人更多”。男孩们精力旺盛，在雪里滚了一下午，直到5点左右，有两人摔急眼打了起来。

一群少年自动站队，分成两边，还赌气撂下狠话，以后不再来往。

夏普声等五个孩子站在同一边。雪仗打不下去了，他们离开广场后一起吃了石锅拌饭，晚上6点左右又到达悦城广场全民健身体育馆（以下简称“悦城体育馆”）打篮球，其间又有两个男孩加入了他们。桦南县共有三个室内篮球馆，一个位于县城南部边缘的培黎职业学校，距离远价格贵；另一个是几个月前才新开的桦南县全民健身中心，大家还不熟悉场馆规则。悦城体育馆就开在县城新商业中心悦城广场内，离孩子们的家都很近，有暖气，10元就能玩一小时，方便又便宜。

7点20分，当他们换上球衣挥汗如雨时，其中一个男孩张子淇听到头顶上方传来“嘣嘣”的声音，像有重物在砸屋顶。他冲声音的方向望去，看到屋顶人字形的钢梁逐渐弯折，整个房顶都在颤动。他刚喊出“房子要塌！”，嘴还没来得及闭上，屋顶就整个掉了下来。

这所室内体育馆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左右，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为二层建筑，设有乒乓球馆和少儿体能训练馆，坍塌的部分是西部篮球馆，一个面积675平方米、高约9米的大跨度建筑。篮球馆只有一个出口，位于东南角，一个靠近门口的男生迅速跳了出去，躲进了东部的乒乓球馆，其他人则被相继掉下来的水泥和钢架挡住了去路。慌忙中，张子淇一把拽住近处的同学黄毅，跑到了墙角。他记得，剩下的四个男生有些蒙，试图往门口的方向跑，但被不断掉落的屋顶碎块砸中，“啊疼！救我！”。听到呼喊声，张子淇吓得闭上了眼睛。

当他睁开眼，屋顶已经消失了，稠密的雪从夜空飘下，拍打在脸上，墙侧的水管爆开，瀑布一样的水流往灰色水泥废墟里浇。黄毅在旁边两米的位置，腿被重物压住，张子淇想帮他搬开，但搬不动。另外四个人，有一个在更衣室旁边，受了轻伤，正缓慢往外爬，其他三个人都被废墟



（新华社）

1. 坍塌的悦城体育馆
2. 吴立迁建造的怡景华庭小区附近，仍遗留着一片居民自建房
3. 鹏程小区是吴立迁开发的第一个棚改回迁项目

1



（新华社）

2



（新华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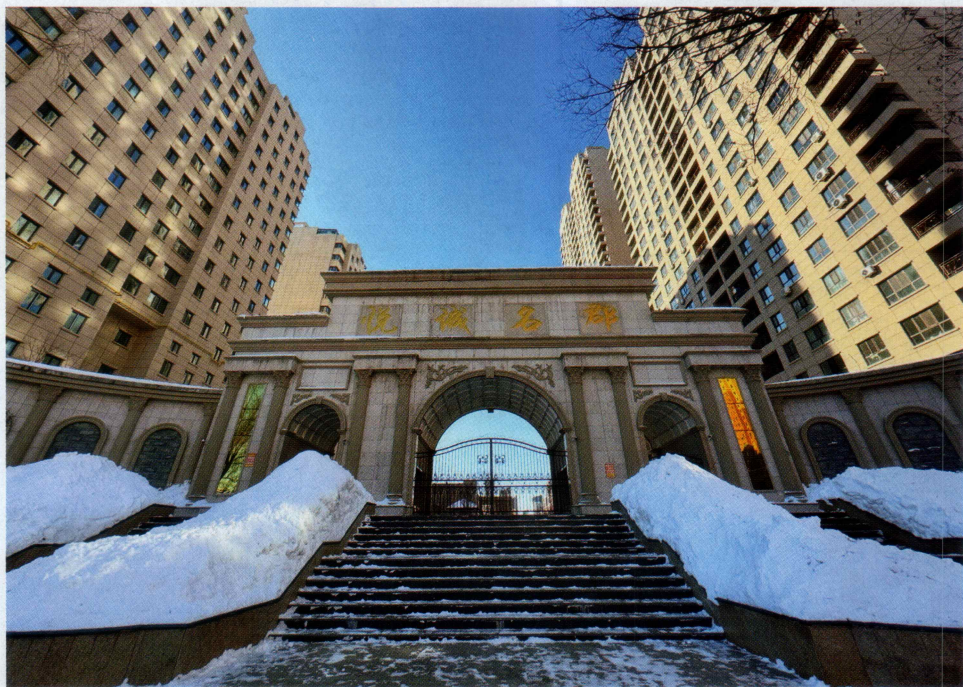
3

掩住，辨不出位置。这时，之前跑出去的男孩回来，和张子淇及两个隔壁打乒乓球的成年男性，四人合力把爬行者抬了出去。

一位遇难者家属回忆，听说坍塌后，他立刻从家中跑到体育馆，只花了十来分钟，应急救援队随后赶到。晚上7点50多分，黄毅被救了出来，但剩下的夏普声、郑权、韩佳骏迟迟没被救出。那是一场漫长、绝望的救援，持续了四五个

小时，“大块大块的水泥板子压着，用手根本翻不开，要用机械，救援队来了之后基本只能干站在那儿。后来来了一个大钩机拽板子，好几次拽了一半又弹回去”。家属们被拦在场外，焦灼无力地看着艰难的救援。站在一旁的公安忙着维护秩序，阻止围观者和附近小区住户拍摄视频，甚至走进临近街区住户的家中检查手机。

他记得，大约四小时后，佳木斯市一支应急



吴立迁建造的悦城名郡，桦南县的高档小区之一

救援队赶到，“两个大钩机，半小时就把三人都挖出来了”。男孩们身穿短裤短袖，泡在雪水里，凌晨时分被抬出来时，身体已经僵硬。

根据黑龙江省桦南县政府新闻办通报，现场于7日0时35分完成救援，三人遇难。

开发商的发家之路

悦城广场的外观像巨大的白色海浪，流线型设计和网面外壳，在以灰褐色建筑为主的东北小县城里很惹眼。门口是一条宽敞的大街，县城里最大的蜜雪冰城旗舰店也坐落于此，两边挤满了霓虹招牌的餐饮店，点缀着橙色凤凰路灯。五年前，这里还是县城北部边缘的荒凉区域，而如今零下10度的雪夜里依然行人如织。

悦城体育馆位于悦城广场商业综合体西侧的7号楼。根据新华社披露的信息，该体育馆于2018年7月竣工，2020年7月通过验收，至今使用不过三年。悦城广场的建设单位为黑龙江省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名叫吴立迁。裁

判文书网上的多份民事裁定书显示，吴立迁出生于1970年，曾是桦南县建设局干部，现已退休。

桦南人大多不记得年纪尚轻就退休的建设局干部吴立迁，但对成为地产开发商后的吴立迁却印象颇深。一个普通桦南居民的生活，多少都会跟他打造的某个空间发生关联。悦城广场的“好日子超市”是县城最大的超市之一，下班时间总是大排长队。二楼开设的密室逃脱和剧本杀，则很受年轻人欢迎。悦城体育馆周末人满为患，经常被企事业单位包场，甚至需要提前几天预订。吴立迁建设的红馆酒店和丽舍酒店，分别是县城过去和现在最高档的宴请地，大部分人的婚宴和学子宴都在这里举行。遇难者郑权甚至家中三代都住在吴立迁建设的小区里。

吴立迁开发的第一个楼盘叫“鹏程小区”，是桦南县的早期棚改项目。2008年，黑龙江省出台了《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城市棚户区改造的实施意见》，各市县的棚户区改造热潮随之展开。当时的桦南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和一类革命老区县，县城中心聚集着一片片简陋的居民自建房，很难

见到高层建筑。棚户区的改造，可以说是桦南县房地产市场兴起的一个重要节点，吴立迁的地产事业也自此开始。

鹏程小区距离县中心仅600米，位于市场街的十字路口处，西靠桦南第五小学，北临桦南四中，上下学时人流密集，附近还有不少商超、餐饮以及大量教育培训机构。我们无法确知，当时还是建设局干部的吴立迁，是如何兼具开发商身份并拿下这片“热土”的。回迁户王梅告诉本刊，2008年这里数百名棚户区居民与吴立迁代表的开发商按“1:0.5”的回迁比例签订了协议，“比方说我原来的房子有1平方米，回迁就只给0.5平方米，多出来的面积按每平方米1000多元自己补上”。

鹏程小区刚建成时，在遍布棚户区的桦南县，是让人瞩目的小高层新建筑。但它的户型很奇怪：面宽三米，进深却有十余米，像一条幽深的甬道。白天如果不开灯，屋子里就黑黢黢的。一般来说，建筑的面宽和投影面积均有固定限制，瘦窄的户型可以在保证面积的情况下，塞进更多户数，但牺牲的却是住户的通风、采光以及保暖。本刊记者实地踏访时看到，窗户只有最北面的厨房和最南面的房间有，中间的客厅、厕所都没有通风的地方。过于狭长的另一个问题是，暖气很难将整个屋子捂暖。居民通常要在中间客厅再放一个炉子，主要靠炉子取暖。有居民告诉我，老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太冷了，所以不少人都低价卖掉然后搬走了。还留在这里的住户，则要忍受原本就质量堪忧的房屋老化后的种种危险：一楼会漏水，路面不平整，前段时间某三楼住户屋檐整个掉下来，幸好水泥块被楼下的广告牌接住，没砸中人。此外，鹏程小区还有消防“硬伤”——入口处仅三四米宽，有一次发生火灾时消防车开不进来，只能停在外面。

对于吴立迁，王梅的评价是“还比较文明”，这是和鹏程小区街对面的另一个棚改回迁项目“学府”对比出来的。王梅邻居的店铺在“学府”所在的地块上，拆迁时被骚扰了近一个月，“每天七八个城管来店静坐，人高马大的小伙子，早上8点来下午5点下班，让你没法做生意。凌晨两三点又有一群人拿着大棍来打砸，玻璃门碎了

好几次，你不签就不得安宁”。

2009年，吴立迁的第二批回迁项目动工，位置仍然十分“紧俏”。这是群星路北侧，距离县中心一公里左右，紧靠县人民医院、第三中学和桦南体育场。张瑞是这个回迁项目的住户。他和一众原住户分到的房子和鹏程小区类似，面宽短、进深长，而且还是东西朝向，采光更差。朝南的楼栋大多被作为商品房销售出去了。但张瑞记忆中更糟糕的是，这次拆迁伴随着暴力。他对本刊回忆，那时自己从工厂下岗多年，蹬三轮车为生，妻子把自建房改造为一间服装店赚钱，“儿子刚考上大学，我们就靠冬天做棉服棉裤给他攒学费，所以我跟开发商商量，能不能过了冬天再搬走”。双方没能达成一致，之后张瑞及其他没签协议的居民，房屋都遭遇了打砸：“晚上九十点钟刚睡着的时候，五六个人突然拿着砖头朝我家扔，哐哐哐，门全碎了，梁也砸掉了，冷风呼呼往里灌。”这样的情况隔两三天就出现一次，持续了一整个冬天，张瑞的妻子被吓出了心脏病。有一次，张瑞气不过追了出去，和几人打起来，被围殴至骨折。张瑞也试过报警，可他记得，警察来了后，只是不紧不慢朝打砸者喊了一句：“还不跑？”

但行业内对吴立迁的个人评价更为正面。一位曾与吴立迁打过交道的工程承包人王克对本刊回忆，和许多开发商“高调的土豪做派”不同，现实生活中的吴立迁总是穿着一身朴素的休闲装，看上去就是“很普通的中年人”，长得“慈眉善目”，说话也“很亲切，没有架子”。在棚改项目开启的县城面貌更新大潮中，许多有人脉有手段的人逐利而来，地产开发市场鱼龙混杂。王克觉得，和桦南县其他一些开发商比，吴立迁算“正经生意人”，和他谈合作比其他开发商更轻松，“出多少股份拿多少钱，很公平”。王克记得，吴立迁通常和他弟弟吴立伟一起合作开发项目，但是吴立伟性格会鲁莽一些——吴立伟本在县医院工作，后因与人斗殴打伤自己的眼睛，离开了原单位。在两兄弟中，吴立迁是那个“情商高，善于维护人脉”的人，而且确实有商业头脑，能提早看到旁人看不到的城市发展方向。

2017年7月，吴立迁的新项目“悦城广场”

开工。作为桦南县新城建设的地标性场所，悦城广场是一个业态丰富的商业综合体，包括商场、体育馆、酒店、住宅。在外部人看来，这是一步险棋。王克回忆，当时县城着力开发育才街以北的区域，不仅在那边盖了新的县政府大楼，还兴建“三馆”，即博物馆、图书馆和文化馆，但新区的人气仍然不旺。吴立迁拿下这个地块后，“行内人都不看好”，没想到2018年悦城广场开业后颇受欢迎，甚至带动了县中心的北移。而被认为“肯定卖不起价”的悦城名郡，也一跃成为县城最高档的住宅小区之一，挂牌价一度高达每平方米6000元，是桦南县平均房价的两倍。悦城之后，其他开发商纷纷在北部新建了名和城、御景豪庭等高档小区，都卖得不错。

“吴立迁做的这些项目，当时都没人敢做，怕亏钱。他就敢第一个吃螃蟹，还把每个项目都做成了标杆。在县城的这么多开发商里，眼光是很前卫的。”王克说。作为县城里举足轻重的开发商，除了人情练达和商业胆略之外，是否具备与之相当的专业能力，却是一个模糊的问题。据此前媒体报道，吴立迁当年因为父亲的关系进入建设局，早期职务是单位司机。王克虽然在采访中一再肯定了吴立迁在人际和商业方面的头脑，但也表示，吴立迁并非专业出身。

粗糙的工程

悦城体育馆是一栋黄色的L形建筑，东部是屋顶为混凝土结构的两层建筑，至今完好无损，而西部坍塌的篮球馆，是屋顶为H形变截面钢梁结构的大跨度建筑。如今事故现场已被围护起来，从高处望去，能看见七八条钢梁躺在篮球馆内，被积雪浸润得生锈，中间的连接处已经断裂。

按照《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规定，“钢结构”和“大跨度建筑”都是雪荷载敏感的特征，应以100年一遇的雪压设计。而黑龙江省佳木斯市100年重现期雪压为 0.95kN/m^2 ，换算积雪深度约63.3厘米。这个数字在实际设计中还需乘以放大系数。江乔是工作近20年的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在江浙沪地区经手过数十个大跨度项目，“2018年体育馆建造时的规范系数是1.4，也就是说积雪深度起码得是 $63.3 \times 1.4 = 88.6$ 厘米”。而事

故当天截至晚上8点，桦南县积雪深度为32厘米，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承载极限。

结构上来说，事故体育馆采取的H形变截面结构，本就是钢结构中稳定性较低的一种，已经“逐渐被时代抛弃”。江乔指出，在降雪较多的东北地区，大跨度钢结构建筑一般使用网架设计：“网架结构是三维立体支撑，H形变截面结构是平面支撑，后者的通用问题是稳定性差、结构冗余度低，承载力要小很多，支座的锚栓设置偏少、偏小，在极端情况下会直接从混凝土内拉脱，造成脆性（瞬间）破坏，容易连续倒塌。但前者的造价，一般是后者1.5~2倍。”他指出，10年前江浙沪地区许多小城镇由于资金有限，小型公共场馆和工厂广泛使用H形变截面结构，但由于施工过程中事故频发，近年来已经逐步消失。

就施工细节而言，本刊咨询的多位结构设计师认为，篮球馆的屋顶构造存在不规范之处，削弱了结构的稳定性。根据留存的照片和视频，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岩土工程师陈书注意到屋顶钢梁与四周墙体的连接处缺乏支撑：“屋顶粗重的钢梁直接放到了灰色的混凝土墙体上面的位置，按理说那个位置应该有斜向支撑，形成一个小三角形。”其次，江乔指出，屋脊位置没有做通长系杆，而系杆可以有效增加钢梁的平面外稳定性。另一个致命的细节是，根据幸存者及体育馆常客的描述，该篮球馆只设计了一个位于东南角的出入口，并没有其他隐藏或锁住的出口。这不符合公共场馆的消防规范。而遇难者正是在逃往出口的路上被掉落物砸中。“但凡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有一个守住了，这样的失误都不会发生。”江乔说。

这所建造粗疏的体育馆的施工方是黑龙江海峰伟业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这是一家桦南的“新”公司。根据(2018)黑0822民初272号民事判决书，海峰伟业由朱海、朱波二人出资成立，2016年因经营不善负债累累，才转让给当时26岁的岳城棋。据佳木斯政府公开的采购信息显示，这位年轻“90后”率领的海峰伟业，是桦南县中标大户，至今中标项目近20个，其中不乏县疾控中心、人民医院传染病区、120急救中心、国网供电公司物资储备库、高铁停车场、县保障安居工程等重大项目。2018年投资1.77亿元的“悦城广场城市综合体项

目一期工程”，是岳城棋接手海峰伟业后中标的第一个项目，此前他并没有承包大型建筑工程的经验。

一家并没有多少建筑经验的新公司，为何能在当地获得这么多的公共建筑建设权？桦南县的建筑工程市场究竟是如何运转的？什么样的人有能力承接工程？“包工头”王克的回答还是“人脉”。王克表示，在桦南这样的小县城，一个项目通常会被总包单位拆解，转包给其他小公司。而小公司的资质良莠不齐，只要不怕麻烦，受得了上级承包商的气，总能得到些活儿干。王克说自己也是40多岁才转行做工程，就是看重桦南县的县城更新市场。虽然“专业完全不搭噶”，也承接了多个回迁工程，有不少是“别人吃剩的残羹冷炙，做了一段时间后没有利润，我又半途转包给别人了”。

层层转包导致利润低、施工流动性大、责任被分散，都会影响工程质量。尤其当县城建筑市场监管能力普遍较差时，遇到危险度高的大跨度工程，比如大礼堂、体育馆等，便很容易埋下隐患。江乔回忆，自己验收一些县城大跨度建筑时，目睹过不少离谱的错误，“譬如外包的钢架公司把钢梁尺寸做错了，焊好了才发现。还有连接点焊缝没焊紧，螺栓太松掉下来，都是很常见的”。

篮球馆的孩子们

遇难的三个孩子中，夏普声年龄最大，15岁，外号“狗声”。他身高1米85，皮肤黝黑，有着细细的眼睛、宽大的鼻子，头发微微自来卷，在一群初中男孩里十分打眼。他也是11月6号傍晚进入悦城广场体育馆的那帮孩子中的“球王”，擅长运球，投篮很准，还会很多花里胡哨的假动作，不仅在初中阶段罕有敌手，甚至很多高中生都知道他的球名。

夏普声是在小学三四年级时爱上篮球的。那时他到县城一所篮球俱乐部学习，每天放学后都要去训练一个半小时，周末还会主动加练半天。一次，为了学一个叫“蝴蝶步”的动作，夏普声一边练习，一边让好朋友帮忙录视频，反复调整步伐，足足花了两个小时。按照能力，俱乐部设置了小班、大班和体校班，夏普声刚进去时是在小班，但凭借刻苦练习，五年级时就升入了体校班。他曾经很认真地告诉好朋友，自己的梦想是要打进CBA。

因为太淘气，夏普声小学时长期被老师安排坐在讲台边。在网上看到一些搞怪视频，他会边走边演，把朋友们逗得哈哈大笑。但幽默外向的外表下面，他的内心比同龄人更为早熟敏感。因为四五岁时父母分居，夏普声平时跟着爷爷生活。看到长辈累了，夏普声还会帮着洗衣服洗袜子。每次和朋友一起出去吃饭，他会默默记下是谁请的客，下次再还回来。变声期时没法吃辣，但是大家聚餐点菜时他从没提过，怕给别人添麻烦。有一次，一位老师在教室里滑倒，眼角磕到了桌子，夏普声第一时间冲过去把老师扶起，又去拿热毛巾帮老师敷在伤口上。

另外两个遇难孩子韩佳骏和郑权，都是14岁，都喜欢篮球。郑权个头1.8米左右，微胖，打前锋位置。他是班里的体育委员，从小学踢足球，担当守门员，小升初时开始学习打篮球，平时还爱好骑行，假期时经常和朋友外出骑行，每次不少于30公里，到郊外人少的地方，体会开阔自由的感觉。他在男孩中人缘很好，经常主动请客，常常抢着结账。但另一方面又有点“欠”，喜欢弹朋友的脑瓜逗着玩。

韩佳骏是三个孩子中个子最矮的，长了一张国字脸，粗粗的眉毛下是单眼皮小眼睛。虽然身高不太有优势，但打球很有拼劲，每次都抢篮板。平时聊天也张口闭口都是篮球，还曾想把篮球作为未来的职业。11月6日下午3点26分，韩佳骏还发了一条朋友圈，视频里，他穿着厚厚的黑色棉衣，和朋友们一起走在被白雪覆盖的大街上，耳朵冻得通红，脑袋被雪花染白。男孩们一起用东北话大喊了一句：“往外走走！”然后，七个人纷纷扬起了手臂。

以上这些信息，绝大多数都是三位遇难孩子的朋友告诉我的。坍塌事件发生后，桦南县许多小学中学都发布通知，禁止学生接受采访，但孩子们仍然有话想说。肖彤是其中之一。他回忆已经失去的朋友，“那天穿得那么少。我凌晨1点得知消息后一直睡不着，三四点钟还在盯着窗外干瞅，想哭哭不出来，说不上来什么感觉”。赵泽凯是另一位愿意讲述的孩子。事发后，他一次次返回殡仪馆，看望自己的朋友，感觉自己将近一周“不得劲”，“没力气，不想说话，吃不下饭”。回忆过去的点滴时，他的语气中充满怀念，仿佛只要诉说不停止，朋友就能一直留在自己身边。■

（文中肖彤、赵泽凯、王克、王梅、张瑞均为化名）



(视觉中国 供图)

1



(受访者供图)

2



(受访者供图)

3

1. 埃塞俄比亚红泥族原始部落
2. 小涛直播时的画面
3. 小涛住的旅馆

网络主播非洲遇害：流量的诱惑与危险

记者·陈银霞 编辑·王珊

埃塞俄比亚时间 11 月 26 日，在“快手”拥有 5.9 万粉丝的博主小涛，在非洲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一家华人客栈被害。他来非洲才 3 个多月，希望通过拍摄原始部落的生活涨粉后回国直播卖货。但和许多来做主播的人一样，他并没有意识到，流量的背后，危险同在。

遇害

“砰！砰！砰！”埃塞俄比亚时间 11 月 26 日凌晨 3 点 40 分，住在旅馆二楼的杨默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打开门，门外是他直播时的两个埃塞俄比亚本地助理，与他的朋友小涛同住五楼的一个房间。他们神色惊慌，双手在胸前匆忙比画着。杨默以为是小涛和人打架了，连忙跑上楼，随后被眼前的情景吓坏了——小涛躺在楼道里，他的胸口、后背、胳膊、脸上有多处刀伤，血从伤口处往外流，但意识还算清醒，喊着“救我”，还让杨默“拍视频留证”。

杨默不知道当地的急救电话，赶紧跑下楼，请求旅馆的老板帮忙打。等他再次爬上楼时，小涛已经昏迷了。杨默看到，地板上多出了一串串带血的脚印，通往对面的房间。两个房间他都不敢靠近，和助理守着小涛等警察来。大概一个多小时左右，警察到了，几个人觉得像等了一个世纪那么久。警方循着血迹，在对面房间抓到了嫌犯。他也是旅馆的住客，案发前两天入住。

在旅馆，警察先从嫌疑人包里搜出 6 部手机，其中一部是小涛的，一部是凶手的，另外 4 部嫌犯无法开锁，都是偷来的。随后，警察从嫌疑人的房间里面搜出了很多作案工具，包括一次性手套、刀具、胶带、绳子、裤子和头套，都带有血迹。房间里的床垫也被他翻转了过来，以隐藏上面沾

到的血迹。

小涛的表弟张强说，嫌疑人是个中国人，20 岁出头，护照显示，他的出生地是山东，但签发地是黑龙江。他长着一张瘦长的脸、小麦色的皮肤、薄薄的嘴唇，头发贴着发根编成几股。他表现得像是个惯犯，被抓时已经换了衣服，清洗过作案的痕迹——穿着灰蓝色拖鞋、蓝色裤子和上衣，背着蓝色的双肩包，浑身上下都很干净。如果不是他左手无名指处有一道一厘米长的新鲜伤痕，上面还残留着少许未洗净的血迹，很难想象他刚刚杀了一个人。

表弟张强猜测，小涛与两个助理住在同一个房间，嫌疑人可能是在偷完第一部手机，打算偷第二部时被小涛发现，之后两人争执了起来，对方产生了杀意。而两个助理，因为睡在门边，被惊醒后及时逃跑，才侥幸逃过一劫。张强说，遇害前小涛感冒了，如果身体状态良好，他或许会没事——小涛 1.78 米的个子，身体强壮，小学时学过几年武术，38 岁的他现在还可以侧踢，身手是不错的。

从消杀到主播

遇害时，小涛才到非洲 3 个多月。他是来这里做短视频和直播的，出事前，他已经在“快手”积攒了 5.9 万粉丝。账号名叫“小涛在非洲”。

小涛原名陈向涛，胖脸、啤酒肚，肤色偏黑，一笑眼睛眯成一条缝。小涛家住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柳园镇陈村，15 岁就跟着父母在北京打工。来非洲直播前，他经营着一家消杀公司，主要是给餐饮、学校等场所灭菌、除虫。

说是公司，其实就是北京郊区的一处农家院，吃住也在那里，固定员工只有小涛和妻子胡小可两人。公司是 2013 年成立的。胡小可说，一开始他们只灭老鼠，有人找来，他们就背着喷药器和粘鼠板去，慢慢拓展到灭蟑螂、虫蚁之类。小涛



左图：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市中心的一处市场

右图：一名中国厨师在埃塞俄比亚的一家饭店制作中国菜，两名当地人在厨房帮厨



曾向同村的朋友陈峰陈述过创业初期的艰难，他说有的客户担心药物对人体有害，他就将药跟饭拌了一起吃，以获取信任，慢慢地，他拿到了学校、公寓、宾馆等大一些的订单。

在胡小可的记忆里，开业后的两三年是家里收入最好的时候。那时，整个北京做消杀的只有十来家，小涛和胡小可一年能接300个单子左右，夫妻两人忙不过来，就请朋友临时来帮忙，多的时候“员工”有20多人。胡小可说，好的时候一个月有五六万的收入。但攒下的钱并不多。小涛喜欢热闹，手上也大方。二哥陈向军说，请来干活的朋友，小涛会包他们所有的吃住花销，而且很多时候的态度是“这个活儿你干了，钱就是你的了”。

2016年之后，随着进入消杀行业的人增多，生意变得不好做。胡小可说他们公司的单量下降了一半，好在还有一批老顾客，收入还算稳定，但随后遇到了疫情——很多客户的店铺都关门了，许多时候，小涛和胡小可只能在家里干坐着。胡小可说，2022年，他们全年只接了100个单子，其中八成还是类似个体家庭、小饭店这样的小单子。价格也比以前低了不少。“原先1000平方米的饭店，一年18次消杀，每次价格为1000元，

今年降到了五六百块，而且很多饭店都不再续签，以降低成本。”陈向军说。胡小可告诉本刊，生意最惨淡的时候，“一个月才有一单活儿”。

小涛正是在此时开始考虑转做主播的。他当时和朋友一起研制了一款杀蟑螂的药，想通过直播带货。胡小可说，小涛热情很高，他为此购置了专门的设备，包括话筒、助播的蟑螂服、架子鼓等，还在家里搭了个直播间。白天他们出门干活，同时拍视频，晚上下班后两个人一起剪视频，直播、写段子，忙到两三点才休息。胡小可很支持丈夫的决定。在她眼里，丈夫一直是个敢想敢干的人。在成立消杀公司前，小涛拉过煤，当过搬运工，绑过钢筋。他一直不满足于做个打工者，一有机会就试图承包工程，虽然很多项目都没赚到钱，但小涛一直敢折腾，最后摸到了消杀的门路。

可这一次，运气并不好，直播的效果很差。陈向军告诉本刊，小涛直播了一个多月，多的时候有三四百人观看，少的时候只有20多个人，还都是来支持的熟人，“人气上不来，货也不好卖”。开始的一个星期，一单都没卖出去，之后才卖出去一单两单，最多的一天卖出去了六单。而与他们同类型的直播，通过请粉丝多的大主播代言，



(胡小可供图)

有的一晚就能卖出去数十单甚至上百单。胡小可以说，小涛开始有些着急，每次下播后，他就一个劲地念叨：“别人可以卖，为什么我卖不出去？是不是词没写好？是不是今天自己状态不太好？”他一边念叨一遍叹气，胡小可安慰也没用。

去非洲

小涛是7月决定去非洲的，他的目的直接而明确：涨粉卖货。他有一个参照目标，那就是杨默。杨默是他隔壁村、一同做消杀的朋友，今年6月去非洲做直播，主要是记录非洲原始部落村民的生活。村民陈峰记得，刚去时，杨默直播间只有几百人，但很快就有一两千人，一个月之后，直播间人数多时两三万，少时也有几千人，一个月涨粉一两万。而杨默之外，从2016年就开始在非洲做主播的一些博主，粉丝早就过百万，靠带货赚钱，小涛早就关注了他们。

对于丈夫去非洲的想法，胡小可一开始是反对的，她觉得非洲太远了，而且小涛离开后，她很难兼顾照顾孩子和消杀的工作。但小涛很坚决，他说杨默已经给他买好机票了，不用他花钱。他

像着了迷一样，“涨粉后回国直播，那时一天就能卖几十单甚至几百单（蟑螂药）”，“他是那种有什么想法，就要去做，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不然他就会一直磨你，直到你同意”。

虽然小涛不说，胡小可知道丈夫是有压力的——今年为了给工人结工资，他们家已经花掉了家里最后的储蓄。两人的大儿子已经17岁、女儿12岁，都在城里念书，花费不少。而且，大家庭也需要他们照顾。小涛兄弟三人，大哥早年在村里集资做投资，欠了村里乡亲几百万元。为此，小涛的父母在家都不敢出门。二哥陈向军性格内向，外向的小涛是家里唯一的“门面”。陈向军还记得，小涛奶奶过寿，小涛上台唱歌跳舞，把气氛弄得非常热闹。

今年8月，小涛到达了非洲，8月10日他更新了第一个视频。视频里，他戴着墨镜，穿着黑白相间的运动鞋、灰色长裤、灰绿色的防晒服，站在埃塞俄比亚西南部图尔米红泥族原始部落的草房前，笑着表达他刚到非洲时的感受，言语中都是满意和对未来的期待，“非洲就是好啊，你看这蓝天白云多漂亮”。出事前，他共更新了44个视频，内容主要展示红泥族原始部落做饭、酿酒、种地、盖房的生活日常，3个多月粉丝涨到5.9万。

因为涨粉快，在抵达非洲一个月后，小涛还将包括大哥、表哥、堂弟在内的六人叫了过来。不过，大哥陈向红只待了一个多月就回去了。陈向红告诉本刊，在非洲生活的辛苦，是镜头外的观众感受不到的。他们直播的图尔米红泥族在埃塞俄比亚西南部南方各族州南奥莫地区图尔米镇上，当地气温在40度左右，紫外线很强，他们买不到防晒霜，每天出门，都是戴着帽子，穿着长裤、防晒服，“泡在汗里”。住的地方也没有空调，洗澡也不方便，要从远处的水坑拉水。当地的饮食他们也不习惯，每天就只能吃炒鸡蛋、煮鸡蛋，粉丝们戏称他们为“鸡蛋小王子”。陈向红说，小涛180斤，去那边三个多月瘦了30多斤，自己也瘦了十几斤，“觉得自己营养不良，每天头都是昏的，还感冒了”。

在非洲的消费并不少。进入红泥族部落拍摄，每个月都需要给当地相关部门交拍摄费，大概是1.1万比尔，折合人民币1400多元。因为来拍摄

的人太多，当地的居民开始收费，一人200~300比尔一天。小涛请了一个助理，承担翻译和导游的工作，一天要200~300比尔，还要给小费。有时为了拍摄当地人用餐的场景，还要请他们吃饭。除此之外，还有住宿和交通的费用。一个月算下来，一个人一个月的费用最少也需要五六千块钱。小涛也曾向陈峰吐露在非洲的辛苦，他说：“哥，你不知道我在这儿就是受罪，条件很差。”

因为直播内容同质化，流量很快降了下来。陈向红当时也开了一个视频号。他记得，刚开始时，平台给推流量，一天的观看量在一两万，能赚到两三百块钱，但这只持续了10天，后面人越来越少，只有几千人观看，“一天挣二三十块钱打赏钱”。“流量不好，身体也不行，路费都赔了，回来我都生气。”陈向红说，小涛出事前，表弟、堂弟也打算回来。妻子胡小可说，她不知道小涛直播能赚多少钱，只知道每个月小涛会固定从家里拿2000元。

危险

小涛住的旅馆，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市中心，有五层楼，30个房间，是去年新开的。旅馆临着商业街，周围是居民区，有三四层的别墅，也有一层的平房，到机场开车只要10分钟。在非洲做生意的李国荣认识旅店老板，他告诉本刊记者，旅店老板原先是做纺织生意的，疫情时候生产口罩，去年停产开了这家旅馆。

开旅馆是近两年在非洲相对有热度的一项生意。在非洲直播的主播小胖告诉本刊，2019年下半年开始，就有不少中国人来非洲，他有一次乘坐飞往莫桑比克的飞机，发现九成都是中国人，但以前，“六成是中国人，四成外国人”。而且，乘坐飞机的中国乘客，不再是以背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为主，多是来做生意或者拍视频做主播的。同样在图尔米镇直播的马鑫鑫告诉本刊，以在红泥族直播的二三十个主播为例，“个把月就能换一批”。他们挤满了城市街头的华人旅馆。

在埃塞俄比亚，一直以来，对酒店业有着严格的限制——除了星级酒店外，只有埃塞俄比亚

本国投资者可以投资小型旅馆。在这些酒店和旅馆里，都会配备保安，24小时执勤，严格的还会对旅客检查讯问，以防携带枪和刀这样的危险物品。李国荣说，这是出于社会治安管理的考虑——当地居民很穷，偷盗严重。2019年，李国荣在郊区开手机工厂，结果被自己雇的当地保安盗走了价值30万元人民币的手机，还有一次被偷了100万元的财物。为了解决问题，他通过关系找到了当地警方，在工厂门口设置了一个岗亭才作罢。

李国荣发现，2021年之后，关于旅馆的开设限制似乎被打破了，亚的斯亚贝巴的街头出现了几家华人小旅馆，多是租了一些老楼，有的房间能住四五人，“像青旅一样”，还有些门窗之类的基础设施都是坏的，但旅馆价格很低，住一天五六十美元，还包三餐，“其他的酒店至少需要七八十美元一晚，只有早餐”。李国荣说，这些旅馆的客人以中国人为主，多刚到非洲，语言不通，旅馆更像一个信息集中平台，挣的不是住宿的钱，而是咨询服务费，包括接送、换汇等，从中抽取一定提成，“检查也不严格，有的连登记系统也没有，手写登记，简单问下哪里人、做什么工作”。

这两年，李国荣等人经常能听到中国人在非洲犯案的事情，基本是恶性事件。他说，不少来非洲的人是在国内做生意失败，成了老赖，跑到非洲或打工，或做生意，后来生活不下去就开始作案。2022年，小胖从新闻媒体上看到，一个中国生意人，每天提着现金去银行存钱，被他的一个老乡蹲守绑架，要几十万美元，后来被抓了。

小涛的表弟张强告诉本刊，杀害小涛的嫌疑人是第二次入住案发旅馆。上一次是在几个月前，就住在小涛出事的那个房间。房间没有防盗门，只有几扇落地窗式的推拉门，其中一扇还是坏的。嫌疑人应该是瞅准了这一点。关于嫌疑人的信息，家属们现在所知甚少，张强听朋友说，嫌疑人之前一直在非洲穷游。一位旅行博主给本刊发来了嫌疑人穷游时的照片。照片里的他，二十出头的样子，穿着绿色的花衬衫，抹了发胶的短发凌乱地垂在额前，银丝边墨镜半挂在鼻梁，眼睛从墨镜上方睥睨着镜头，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张强、陈峰、李国荣为化名）



从《拿破仑》，看束缚于传奇之中的拿破仑

文·刘清源

为什么拿破仑去世 200 年之后，在国际政治背景已经天翻地覆的今天，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感情在西方内部还是会产生如此深刻的隔阂？黑色传奇是妨碍我们去真正理解和运用历史的束缚。对于拿破仑来说，这种传奇的束缚则更加强大，以至于历史学的研究已经很难将他从这种束缚中解脱出来。



左图：滑铁卢战役的场景（电影《拿破仑》剧照）

右图：第一执政时期的拿破仑与约瑟芬在杜伊勒里宫（电影《拿破仑》剧照）

11月底最冷的一个下午，我和朋友约在巴黎歌剧院附近的影院观看雷德利·斯科特的新片《拿破仑》。整个放映厅里，包括我们两人在内，只有六名观众。即使是工作日的午后，这的确过于冷清。也许是为了节省成本，影院竟在中途关掉了暖气。裹在大衣里观影的我们倒是身临其境地体验到了奥斯特里茨的严寒。

雷导的《拿破仑》无疑没有在法国受到其主人公本该享有的热烈欢迎。法国各大报刊和舆论平台对影片的评价都偏于负面，其中最为激烈的

批评来自法国影响力最大的影评杂志《电视全览》（Télérama）。在题为《雷德利·斯科特的电影滑铁卢》的长篇评论中，著名影评人雅克·莫里斯（Jacques Morice）将这部“愚蠢的历史传记片”斥为“荒诞不经之作”（aberration）。另一面，专业的历史学者也对这部影片大加声讨。2013年版《波拿巴传》的作者、《拿破仑研究》期刊的主编、法国历史学家帕特里斯·盖尼菲（Patrice Gueniffey）在接受《观点》杂志采访时说，“这部电影出自一个极度反法的英国人……他在系统性地贬低拿破仑”。盖尼菲随后列举了电影中一系列史实错误，包括拿破仑并没有参加末代王后的断头式、令人迷惑的炮轰金字塔，以及现实中并没有造成大量伤亡的冰湖战役，等等。

实际上这部电影充斥着类似的历史错误，但雷导对于历史学家们的指责似乎不以为意。在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采访时，雷导表示，“我并不需要历史学家来指导我创作我自己的拿破仑史诗”。他甚至直言，“当我与历史学家产生争执时，我会问：‘不好意思，伙计，你当时在那儿吗？不在是吗？那你就给我闭嘴！’”雷导的这一“狂言”看似惊世骇俗，但细想来，拿破仑的故事从来都不是严肃历史学研究的圣地，200年来，无数的街谈巷议、流言蜚语、传说附会以及戏说改编层累糅杂于其中。其实，就算是拿破仑生前留



导演雷德利·斯科特

各种信件、战报，以及大卫和安格尔等画家在拿破仑生前的画作都不无夸张、矫饰抑或虚构之处。除了专业的历史学者和拿破仑爱好者之外，我也很少有人是真正抱着追究历史真相和细节的心态走进电影院的。

一部让英美观众沉浸的法国历史片

一部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成功不在于其在多大程度上还原或虚构了历史，而在于其是否能将观众或读者的感情带回历史的场景之中，与历史人物产生感情上的激荡与共鸣。它既应当使得了解这段历史的观众因身临其境而心潮澎湃，也应当使得那些不了解这段历史的观众产生进一步深入阅读的欲望和兴趣。法国历史小说的名家大仲

马曾有言：“倘若我强暴了历史，我定会使她诞下漂亮的孩子。”这正是表达了这个道理。然而，雷导的《拿破仑》却以其跳跃的叙事和诡异的拼接让不了解这段历史的观众陷入混乱，而让了解这段历史的观众出戏。不过，也许这些缺陷在之后4个小时的导演剪辑版中都会得到弥补吧。但若我们跳出题材上的标准，单从影片带来的整体印象来说，盖尼菲教授所提到的那种情绪确实是十分明显而强烈的。

斯科特执导的前两部历史题材大片《天国王朝（导演剪辑版）》和《最后的决斗》都是以法国历史为背景的，后者的故事发生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导演却并没有流露出任何文化上的疏离与嘲弄。仔细想来，不论是伊贝林的巴里安还是卡鲁日骑士，尽管他们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但绝大多数观众在观影之前应该都对他们的故事一无所知。与之相反，对于拿破仑这样一位在全世界的中学课本里都会被提到的人物，所有的观众都是带着他们内心中的某种期待而走进电影院的。我们都暗自期望着在银幕上看到自己熟悉或想象的场景和人物被展现，而作为导演，斯科特只能选择满足其中一部分的期待。

英国的报刊和影评人对于这部《拿破仑》也的确是交口称赞。英国《每日电讯报》的影评人罗比·科林（Robbie Collin）认为这是一部“完美的作品”，他甚至认为杰昆·菲尼克斯的加利福尼亚口音很好地强化了拿破仑的兵痞形象。英国《卫报》的影评人彼得·布拉德肖（Peter Bradshaw）则认为菲尼克斯的表演如“那杯勃艮第的红酒一样醇厚”。可以看出这部电影确实让英国人可以十分舒适地沉浸在他们对拿破仑和法国文化的戏谑和刻板印象之中，同时却把混乱和尴尬丢给了法国人。里沃利（Rivoli）、坎坡福尔米奥（Campo-formio）、乌尔姆（Ulm）、耶拿（Iéna），这些通过地铁站和路名深刻在每一个巴黎人的心里的伟大胜利，在影片的叙事中没有半点被提及。而在完全删除了拿破仑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史诗之后，影片用了最大的篇幅和预算拍摄了一场充满英式想象的滑铁卢。

我们无需过多谈论雷导为了英美观众的口味而扭曲拿破仑传记，毕竟虚构本身并非原罪。但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拿破仑去世 200 年之后，在国际政治背景已经天翻地覆的今天，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感情在西方内部还是会产生如此深刻的隔阂？

“黑色传奇”和“金色传奇”

黑色传奇是妨碍我们去真正理解和运用历史的束缚。对于拿破仑来说，这种传奇的束缚则更加强大，以至于历史学的研究已经很难将他从这种束缚中解脱出来。实际上，“黑色传奇”和“金色传奇”的现象正是在拿破仑问题的研究中被发现的。

19 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亚瑟·列维（Arthur Lévy）在他的名著《私密的拿破仑》的前言部分这样写道：“拿破仑在他的生前就同时受到他的臣民的敬仰和鄙视。如今，尽管他的所作所为对于欧洲和法国现实影响已经微乎其微，但对他的记忆仍然把我们分为崇拜者和诋毁者两个阵营。这两个阵营都热衷于扭曲这位皇帝的事迹……而当我们公正地去研究他的一生时，真相很快就会从这些金色的传奇和黑色的传奇中显露出来。”尽管列维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现象，但如今看来他的著作仍明显是“金色传奇”的一部分。

在金色的传奇中，拿破仑是草根出身的军事天才，是革命的剑，是民族的英雄。他几乎以一己之力摧毁了整个旧世界的旧秩序，他是东欧民族的解放者，是现代国家的缔造者，是人类自我实现和不屈意志的表率。而在黑色的传奇中，他是“科西嘉的矮怪物”，是嫉妒狂、色情狂、战争贩子，他篡夺革命果实、建立警察国家、打压言论自由、复辟奴隶制度。他为了了一己私欲而不顾及民族利益，一将功成万骨枯。正如列维所说，这种崇拜者与诋毁者的尖锐对立在拿破仑生前就已经出现了。在 1804 年，青年叔本华在巴黎读书时目睹了第一执政拿破仑的阅兵式，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感叹：拿破仑“牺牲他人以追求自身利益”的做法“揭示了人类意志的全部恶毒”。而时代在耶拿大学任教的黑格尔在 1806 年目睹了拿破仑策马前往耶拿战场时的风姿后深受震撼，他认为拿破仑就是

骑在马上“世界精神”（Weltseele），他仿佛凌驾于世界之上，统摄众生。

应该说，虽然两位哲学家对于拿破仑的评价天差地别，但细想来却都又不无道理，只是他们关注了同一人物的不同侧面而已。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拿破仑的战争决策掺杂了其个人的野心，但也不能否认他作为一个出色的战略家往往是在“大陆封锁”这种大的战略层面上去谋划整个欧洲的前途。然而，在拿破仑死后，这种分析视角的分歧很快就演化成了庸俗的骂战。神化的拿破仑和小丑化的拿破仑成为不同政治派别相互攻伐的舆论工具。在英国战后的宣传中，恰如雷导新片中那样，拿破仑形象被极度小丑化。人们不愿意承认一个军事“独裁者”、一个皇帝、一个敌人同时也可以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解放者和思想家。而在法国，拿破仑则死后封神、塑成金身。当法国资产阶级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不利的时候，他们会想起战无不胜的军神拿破仑，当农民和工人在资本家制定的规则中受尽盘剥时，他们会想起杀伐果断的皇帝拿破仑。当阶级矛盾达到不能调和的爆发点时，波拿巴主义总成为一切政治诉求的宣泄口。每一个人都想再一次品尝那传说中甜美的团结与荣耀。正是凭借着这一庸俗化的偶像崇拜，拿破仑平庸的侄子能够借着他的名字和衣服再统治了法国 20 年。

法国学者贝特朗·约理（Bertrand Joly）在他的新书《民粹主义的起源：布朗热主义史》中强调了对拿破仑的崇拜在法国民间旺盛的生命力。甚至是在共和主义最为昌盛的 19 世纪末，法国民众仍然广泛地寄希望于通过武人专政来解决复杂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矛盾。这种社会情绪同样深刻地体现于“一战”之后法国人对福煦和贝当元帅的崇拜，以及“二战”后他们对戴高乐将军的崇拜之中。YouGov 公司在 2023 年 10 月进行了一场名为“法国人如何看待拿破仑”的大型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34% 的法国人仍对拿破仑持积极态度，34% 的人持中立态度，9% 的人不愿表态，而只有 21% 的人对拿破仑持消极态度。法国民间对拿破仑的积极态度揭示了法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隐秘的角落。从这一角落看去，我们能更清楚地理解马克龙总统在今年春天为通过退休改革法案

而强压议会的权势，以及在打击示威时 Brav-M 骑警大队的八面威风。毕竟，弱议会和强警察是拿破仑留给现代法国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

法国知识界的祛魅风潮

虽然在法国民间依然广泛流传着拿破仑的“金色传奇”，但法国的知识界在近年却悄然兴起了一场对拿破仑的祛魅风潮。这些学者主张对拿破仑及其时代的分析应该“回归革命”和“回归阶级”。

以巴黎一大教授、历史学家皮埃尔·塞尔纳（Pierre Serna）为代表的一派学者认为应该超越“集体想象的偶像”和“对于政治强人的怀乡病”，将拿破仑放回大革命的背景中去理解。拿破仑之所以会被神化和丑化，究其根本是由于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塞尔纳认为造就拿破仑这一极特殊、极复杂的历史人物的并非其个人的才能与命运，而是大革命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一个来自海外领地的毫无根基的年轻留学生，在 25 岁成为将军，在 35 岁成为皇帝，这一定是在一个极其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中才能实现的。如果人们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想到如果我们不想经历革命恐怖和血流成河的暴乱，我们就不应该期待在当下出现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用武力去解决一切问题。

更进一步来说，拿破仑的成就是一个自由的人在一个彻底自由的时代肆无忌惮地发挥自己的才华才能够达成的。但我们又如何解释拿破仑这样一个被自由时代造就的人，“革命的道成肉身”，在登上权力的顶峰之后反而回头限制了自由呢？塞尔纳认为，1800～1802 年，也就是从马伦哥大捷到拿破仑就任终身执政，是这一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法国大革命真正的胜利者，法国的资产阶级，决定将国家的大权交给拿破仑，而拿破仑则通过对外战争在保卫既有革命果实的同时向外输出尚未解决的阶级矛盾。对自由的献祭换来了对秩序的保证。而当拿破仑战争的规模失去控制，其对资产阶级造成的损耗和风险过大之时，他们便抛弃了这位英雄。塞尔纳认为 1800～1802 年的政治方案并没有随着拿破仑的倒台而失效，相反它实际上奠定了之后 70 年，

即直到第三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法国的政治基座。不论是复辟王朝、七月王朝还是拿破仑三世，他们都是更容易摆布的拿破仑的替代品，他们的任务一直是保持既有革命果实，输出过剩阶级矛盾。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够清楚“黑色传奇”中拿破仑的种种反动政策和战争狂热其实也并不总是出于其个人的野心和权力欲，而是这一政治交换的题中之意。

皮埃尔·塞尔纳这一派学者所思考的这一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4 年的《神圣家族》一书第六章第三节中也曾有所论及：“拿破仑是‘革命恐怖’对同样在革命中形成的布尔乔亚社会及其政策的最后打击。当然，拿破仑已经理解了现代国家的本质，他知道布尔乔亚社会不受限制的发展、个人利益的自由竞争等等原则是现代国家的基础。他决定承认这一基础并保卫它。他并不是‘革命恐怖’的狂信徒。然而同时，拿破仑还是把国家看作目的本身，而布尔乔亚社会仅仅是国家的财政来源，一个不能有自身意志的从属。他用不断的对外战争代替了不断的对内革命从而完成了‘革命恐怖’的任务。他满足甚至可以说是填饱了法国民族主义的私心，但在另一方面他却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和征服而要求布尔乔亚们牺牲他们的生意、享乐和财富。在日常生活中他暴虐地镇压布尔乔亚社会的自由主义，而有时为了政治利益他也不惜放弃他们在工业和商业上的利益……是法国的大商人们筹划了对拿破仑权势的第一轮打击。是巴黎的投机商们通过一场人为制造的饥荒将拿破仑大军在 1812 年的征俄计划拖延了两个月，从而使他陷入了冬季行军的两难境地。”

回到雷导的电影，我们大可以把它看作拿破仑“黑色传奇”的一个全新版本，但我们应该期待的却也并不是另一部用来与它对冲的“金色传奇”。我们应该期待的是拿破仑最终被从他“传奇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带给我们更多的历史震撼和历史思考。随着新一代历史学者和文化创作者的努力，也许法国民族主义叙事的“金色传奇”和英美化叙事的“黑色传奇”都终将被抛弃。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就能够看到一部结合阶级视角和法国大革命反思的《拿破仑》。

GE，向前一步

文·Benjamin



GE 全球副总裁、GE 中国总裁、GE 航空航天集团大中华区总裁 向伟明

电气革命的到来，掀开了人类历史上的崭新一页。电灯的发明不仅仅是爱迪生送给全人类的礼物，同时也像是给那个奔腾的年代装上了引擎。自此之后，发电设备、各类新材料、无线电通信等产品和技術也相继问世。自动化的工具解放了人类的生产力，整个社会开始腾飞。与此同时，一座人类工业领域的丰碑崛起，并在百余年的历史中不断经历发展革新，适应着变化的时代。即将到来的2024年，通用电气（以下简称：GE）将在全球范围内，最终完成拆分，成为聚焦航空、医疗和能源板块的三家独立上市公司。这些对于中国地区的掌舵人向伟明来说，既是新机遇，也是新挑战。

从“大而全”到“精益聚焦”

对于一个体量庞大的商业帝国来说，“大”有时候未必是一件好事。在人们固有的认知里，“大”意味着规模和稳定。但在彼时，却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大”同样意味着沉重的成本负担和巨大的前进惯性。1981年，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成为GE最年轻的首席执行官，并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当时风光无限，到了2001年，GE的业务遍及100多个国家，领域涉及电力设备、家用电器、医疗设备、航空发动机、金融、轨道交通，甚至广播电视台等十多个类别，成为美国工业发展的范本。但到了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也让这种模式迅速地暴露出它的弊端。当2018年GE新任董事长兼总裁拉里·卡尔普（Larry Culp）履新之时，摆在他面前的是GE 140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

“作为一个以‘精益管理’而闻名的明星经理人，拉里·卡尔普是公司改革和重组的专家。”向伟明说。2021年11月9日北京时间20点，GE正式公布了令人瞩目的、其历史上最大的变革计划：这家成立130年的多元化跨国公司宣布将被拆分为三家独立的上市公司，医疗和能源业务分别将在2023年初和2024年完成剥离上市。完成拆分之后的GE将聚焦航空业务。在得到这一消息之后，向伟明虽然并不感到意外，在他看来，这是大公司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从节奏上说，这些变化来得还是比预想的快。

向伟明在GE长达31年的职业生涯中，经历了四任董事长，对于他来说，感受最真切的就是GE的不断创新与变革。时代不断变幻的主旋律决定了公司方向的调整与变化。“在杰克·韦尔奇时代，多元化是当时的主旋律，金融支持整个业务的增长，是当时的模式。但现在，无论是机构还是投资人，他们希望公司更加专注，做深做强，

而不是做大做强。”此时,作为 GE 在中国的掌门人,向伟明所要思考的,是 GE 在中国未来的前途。

“精益”似乎是这个时代所有制造业公司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和 GE 一样,西门子、霍尼韦尔、日立等商业巨头也同样面临着挑战,在互联网企业异军突起的大背景下,传统制造业必须将自己的优势产业进行扩大,同时裁撤掉冗余部分。“具体到 GE 来说,拆分带来的好处包括:更灵活的市场战略,更好的资产配置,同时有更专业的人进行精细化管理。”向伟明说。这也代表了整个 GE 未来的发展方向,整个产业都向着精益和高效的方向演进。

拉里·卡尔普是 GE 第一个不是出于集团自身的 CEO,他的过人之处在于通过“精益管理”的模式,对诸多受累于规模的企业完成资产重组,“精益”代表最小资源投入,包括人力、设备、资金、材料、时间和空间,创造出尽可能多的价值。取消公司复杂架构以去中心化,在各业务部门推行精益管理实践,以降低成本和改善运营。GE 的拆分也格外雷厉风行,到 2024 年第二季度初,GE 将完成整个能源板块的剥离,而届时,向伟明也将完成他作为 GE 中国总裁的最后使命,转身继续带领 GE Aerospace (GE 航空航天)深耕在中国的业务。

不久之前,GE Vernova 和 GE Aerospace 宣布成立了各自新的董事会。以往,不论是资金配置还是资源整合,都是由集团统一调配的,而在拆分之后,则是另一番场景。“举个例子,比如资产配置,GE 每年在航空研发方面的投入在 20 亿美元上下,因为航空就是一个高投入的产业,但当我们有多个业务集团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统一调配的过程,而在独立运营之后,各公司也能够根据自己的战略,去灵活配置资产,调整方向。”向伟明相信拆分后,无论在科技、研发,还是人才方面,两家公司能够更灵活地聚焦于所专注的

行业。而向伟明自己也会更加心无旁骛地投入到 GE Aerospace 的工作中去。

未知的新挑战

在 GE Aerospace 北京的新办公室里,摆放着一台名为“RISE”(可持续发动机革命性技术验证项目)的模型,它包括先进的开式风扇发动机架构、紧凑型发动机核心、先进的燃烧技术以及新燃料的使用等崭新的科技,使其效率更高,也更节能环保,代表了 GE 在航空航天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座办公室也代表了不久后 GE Aerospace 独立运营后的新形象,它位于北京的亮马河畔。向伟明觉得,就像这台有未来感的发动机一样,GE Aerospace 在中国未来的前景,可以用机遇与挑战并存来形容。

今年是 GE 进入中国的第 43 个年头,在如今的神州大地,GE 的在翼发动机超过 7700 台,服务 60 余家航空公司客户,还有 4000 多台的储备订单,这意味着到 2028 年左右,GE 在中国的在翼发动机数量将超过一万台。

得益于过往深耕打下的良好合作基础,GE Aerospace 现在形成了完备的基础设施和支援系统。今夏,GE 航空航天发动机现场支援服务快修厂在上海浦东临港正式建成,是中国民航首家专业的发动机快修厂。此外,GE 在广汉建立的发动机维护培训学校,基本涵盖了在中国适航的 GE 各型号发动机的维修培训。在上海,GE 成立了全球除美国之外的唯一机队支援中心,与辛辛那提机队支援中心全程监控全球范围空中飞行的 GE 或者 CFM 的发动机动态,及时通报故障,解决隐患。此外,GE 还加强与中国商飞的合作,深度参与 ARJ21 和 C919 项目的生产制造、试飞取证、人才培养等事宜;与中航工业集团成立了合资公司昂际航电,为 C919 提供航电系统。同时培养更多

本地优秀航空人才，实现 GE Aerospace 业务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而在未来，这些牢固的基础终将助力 GE Aerospace 完成全新的飞跃。

即使在未来，对于航空业来说，中国依然是一个巨大的市场。IATA（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在疫情之前曾经做出预测，中国在 2025 年旅客的周转量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虽然疫情延缓了这一进程，但前景依然可观。与此同时，在未来 20 年里，中国还需要 8000 ~ 9000 架新飞机，这是波音、空客和中国商飞三家飞机制造商给出的预测数据。对于 GE Aerospace 来说，这是一个诱惑力巨大的机会，当机会摆在向伟明面前，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GE Aerospace 有这样一句宣传语：We invent the future of flight, lift people up and bring them home safely（打造未来航空，助力蓝天梦想，守护航程安全），这也是 GE Aerospace 的愿景和使命。减少碳排放，提高燃油效率并减少碳足迹，守护地球环境。当人类面对巨大的气候挑战，GE Aerospace 同样做出了积极的姿态——未来将会推出的 RISE 发动机，比现有最先进的 LEAP 发动机的碳排放和油耗降低 20%，这不仅仅是结构和造型上的改变，同时还有发动机管理、混合动力、与可持续航空燃料（SAF）和氢燃料等实现 100% 兼容等方面。RISE 项目预计 2025 年左右进行地面和飞行测试，2035 年左右正式投入使用，助力航空业实现零碳排放的承诺，同样也在助力中国实现 2030 年碳达峰、2060 年碳中和的宏伟目标。这些工作，对于 GE Aerospace 的下一任掌门人来说，同样任重而道远。

向伟明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两幅照片，一幅是他和世界高尔夫名人的合影，而另一幅则是他和不同客户及政府领导的合影。他能够如数家珍地说出他们的头衔和名字，给人的感觉是，不论工作还是生活，他无时无刻不需要挑战。

向伟明从小就对航空有着不一般的梦想，大多数人的生活似乎都在成年后和最初的梦想相隔万里，但对于向伟明来说，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和这个梦想息息相关。向伟明在 GE 已经工作 31 年了，其中只有五年没有从事和航空相关的行业。

作为 GE 在中国服务时间最长的员工之一，他形容自己的角色更像是一座“沟通的桥梁”，始终扮演着一个平衡者的角色。

向伟明曾在 GE 航空航天总部工作过六年，在美国的工作经历让他熟知美国人的行事方式，而对于中国市场的了解，又让他能够在不同的合作关系中游刃有余。2020 年 4 月，当向伟明正在因为疫情造成订单萎缩而焦头烂额的时候，一个更大的挑战摆在他面前，成为 GE 在中国的新舵手。“当时，我觉得只是航空业务就占去了我所有的时间。”但是一番思考之后，他还是承担起这个艰巨的任务。在遭受新冠疫情冲击和中美关系前景不明的前提下，向伟明所要做的，首先是和总部强调，中国市场对 GE 的重要性；同时也需要让中方相信，GE 对于中国投资的信心是长期而坚定的。事实也证明，他这几年的工作，牢固地维系了 GE 与中国之间的纽带，并在短暂的黑暗之后，迎来了希望的曙光。

作为 GE 在中国的最后任总裁，向伟明相信，在分拆完成后，GE Aerospace 布局中国、投资中国的承诺是坚定且长期的，并将凭借可靠、高效、环保、卓越的产品和服务，帮助人们完成美好出行的愿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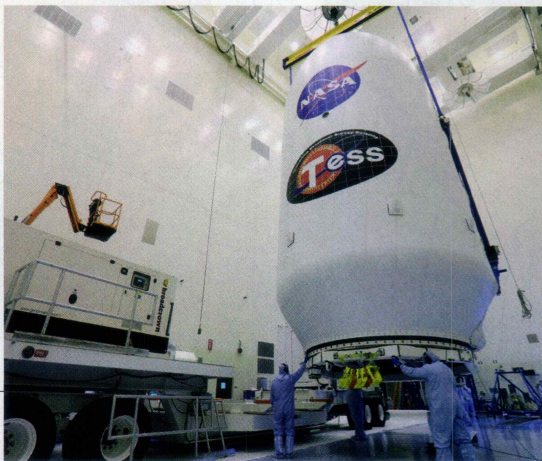
尾声

GE 有着辉煌的历史，为人类工业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之一。从爱迪生发明电灯，到燃气轮机和与人们健康息息相关的 X 光机、CT 机，抑或飞机发动机，GE 始终期望让这些科技成果造福全人类。在百年前的中国，同样感受到了科技给生活带来的便利。1906 年，GE 开始发展同中国的贸易，并成为当时在中国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外国公司之一；1908 年，GE 在沈阳建立了第一家灯泡厂；1979 年，GE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建贸易关系，并在三峡工程、西气东输、2008 年北京奥运会、青藏线轨道工程，以及中国飞机制造等不同领域，我们都能看到 GE 的身影。迄今为止，中国已成为 GE 航空航天除美国本土以外的最大单一国家市场。而在这些看似千头万绪的事务里，向伟明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发现“完美”星系

主笔·苗千

天文学家发现了距离地球 100 光年外，存在一个围绕恒星 HD 110067 运转的极其罕见的六行星共振系统。它不仅是行星科学家进行研究的极佳对象，甚至体现出音乐般的韵律感。



美国航空航天局“凌日系外行星巡天卫星”

人类曾经以为宇宙中的大多数恒星都没有与之相伴的行星，像太阳系这样有众多行星围绕恒星运转的星系只是一个特例。直到 1995 年，当时还在日内瓦大学进行博士研究的迪迪埃·奎洛兹 (Didier Queloz) 发现了首颗太阳系外行星，人类才开始逐渐意识到，银河系中的大多数恒星都有行星。如今，天文学家已经在银河系内发现了几千颗太阳系外行星。

行星的形成和发展自有其规律。以太阳系内的八颗主要行星为例，在太阳系内部运行的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都是岩石行星，其质量相对较小；而在外部运行的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都是气态行星，其中质量最小的海王星，它的质量也是质量最大的岩石行星地球的 17 倍——人们认为这种区别主要缘于行星与太阳距离的差距所造成的温度差别。而在探索行星的过程中，人们几乎没有发现过质量是地球质量的 1.5 ~ 2 倍的行星。天文学家至今仍然不理解其中的原因。

在太阳系之外，天文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行星世界。2020 年，芝加哥大学的天文学家拉斐尔·卢克 (Rafael Luque) 领导一个研究团队搜寻地外行星，他们主要研究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凌日系外行星巡天卫星” (Transiting Exoplanet Survey Satellite, 简称 TESS) 的探测数据。所谓“凌日法”，指的是当行星运行到恒星与地球之间的位置，会遮挡住一

部分恒星的光线，在地球看来这颗恒星会周期性变暗，由此便可以推断有行星围绕其运转。

卢克发现，就在地球附近，一颗距离地球大约 100 光年的名为“HD 110067”的恒星似乎会周期性地变暗，这说明在其周围可能有行星运转。为了获得更准确的数据，他们不得不等待两年之后，TESS 再一次探测同一个区域，传回新数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有两颗行星围绕恒星 HD 110067 运转，其运转周期分别为 9.1 天和 13.7 天。

随后，欧洲空间局的系外行星特性探测卫星 (Characterising Exoplanet Satellite, 简称 CHEOPS) 也传回探测数据，它发现了恒星 HD 110067 的第三颗行星，其运转周期为 20.5 天。更加出人意料的是，科学家发现，在这三颗行星所组成的系统中，每对相邻行星之间都形成了 3/2 共振状态——也就是说，每当位于内部的行星绕恒星三次，位于外部的行星就绕恒星两次。

虽然通过观测数据发现了这三颗行星，但是还有几次恒星光线减弱的数据无法解释。这也说明可能还有更多的行星围绕着恒星 HD 110067 运转。既然已经发现的这三颗行星都处于共振状态，研究人员猜测，其余尚未被发现的行星可能也与其他行星处于共振状态——沿着这个思路，研究人员发现了同样处于 3/2 共振状态的第四颗行星。那么，围绕着这颗恒星，是否还存在更多处于共振状态的行星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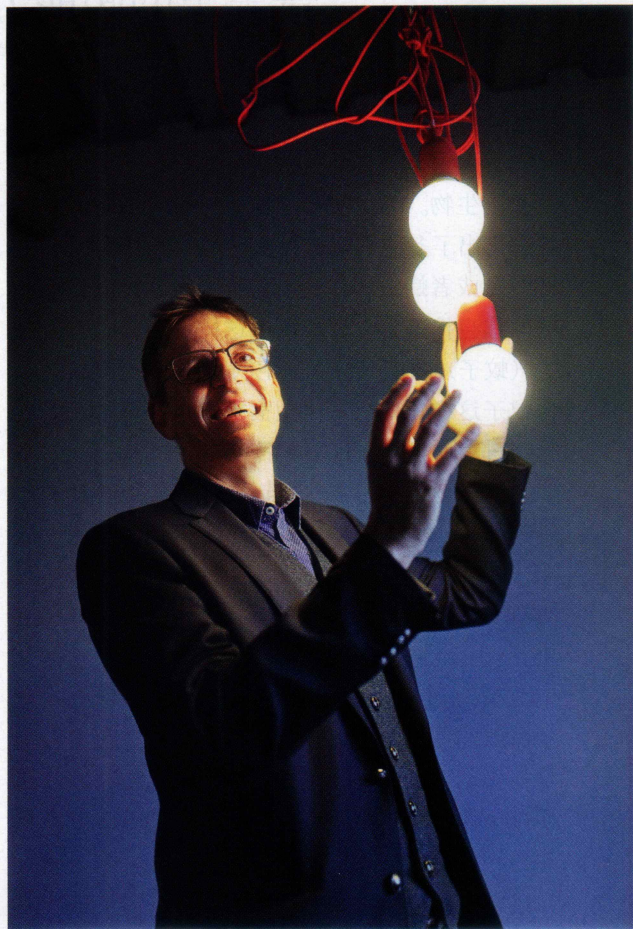
研究人员通过仔细观察发现，如果三颗行星处于共振状态，当其中的两颗在恒星的一侧对齐，那么第三颗总会在其他地方。在这个系统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三颗行星聚集在一起的情况。借助这个条件，结合观测数据，研究人员发现在这个行星系统中还存在两颗行星，其运转周期分别为 41.1 天和 54.7 天。而且这两颗行星都与位于其内侧的行星处于 4/3 共振状态。也就是说，天文学家发现了距离地球 100 光年外，存在着一个围绕恒星 HD 110067 运转的极其罕见的六行星共振系统。2023 年 11 月 29 日，卢克与合作者在《自然》(Nature) 杂志上发表论文《六颗共振次海王星行星穿行明亮恒星 HD 110067》(A resonant sextuplet of sub-Neptunes transiting the bright star HD 110067)。

通过凌日法研究行星，只能了解其轨道周期。想要了解更多的细节，还需要借助其他望远镜。通过西班牙卡拉阿托望远镜 (Calar Alto Telescope) 和意大利国家伽利略望远镜 (National Galileo Telescope) 观测行星与恒星之间的引力作用，科学家发现这几颗行星的质量在地球质量的 3.9 ~ 8.5 倍之间。这些行星都有岩石核心和致密的大气层，甚至可能还有覆盖表面的全球性海洋，可以将它们归入“次海王星行星”(sub-Neptunes) 类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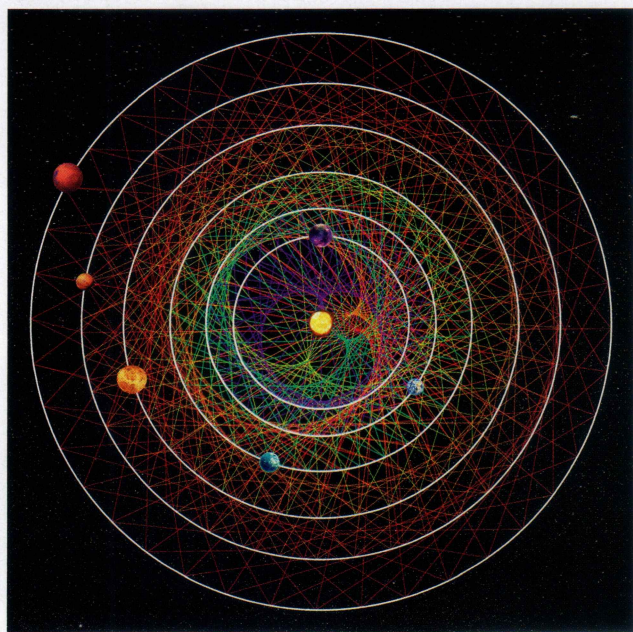
行星系统在形成初期，确实有可能形成共振系统。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受到外部引力的干扰以及可能发生的撞击，行星极有可能脱离原来的位置，整个系统逐渐混乱。天文学家在观测行星系统时发现，只有大约 1% 的相邻行星会发生轨道共振现象。

HD 110067 是一颗类太阳恒星，它比太阳更小，温度也更低。人们估计这个星系可能已经形成了大约 80 亿年。在这个星系形成后的几十亿年里，可能从未受到过任何外界干扰，因此这六颗紧密围绕其运转的行星便组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共振系统，一直以一种音乐般的韵律围绕着恒星旋转。如今它又成为天文学家研究行星的完美实验室。☑

(本文写作参考了《科学》《自然》杂志和美国航空航天局网站的相关报道)



迪迪埃·奎洛兹



围绕恒星 HD 110067 运转的极其罕见的六行星共振系统

寄生虫的超能力是从哪里来的？

主笔·袁越

寄生虫是一类完全依赖宿主提供营养才能活下去的生物。为了实现“不劳而获”的理想，它们进化出了多种不同的寄生方式，彼此略有重叠。像跳蚤或者螨虫这样凭借自身能力就能找到宿主的叫作直接寄生，像疟原虫这样需要借助中间宿主（蚊子）才能入侵终宿主的叫作媒介传播寄生，像蚊子这样每次只从巨型宿主那里获得一点点食物的叫作微掠食寄生，等等。

以上这些寄生方式虽然都对宿主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但毕竟给宿主留了一个活口，还算仁慈。有一种寄生方式是以牺牲宿主生命为代价的，叫作营养传播寄生（Trophically-transmitted Parasitism）。这方面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弓形虫（*Toxoplasma gondii*），这种单细胞寄生虫的全生命周期需要两个宿主，它们需要在终宿主也就是猫科动物体内进行有性生殖，产出的卵通过粪便排出体外，被中间宿主（除猫之外的其他各类动物）误食后进入后者体内进行无性繁殖。只有当这些中间宿主被猫科动物吃掉后，弓形虫才能再次进入终宿主体内，完成生命周期。于是，为了增加中间宿主被猫吃掉的概率，弓形虫会改变中间宿主的行为，使其更加胆大妄为，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感染了弓形虫的老鼠不再害怕猫的原因。

因为家猫的普及，人也变成了弓形虫的一个很重要的中间宿主。有证据显示，人类的性行为也能帮助弓形虫在人体之间传播。于是，几位芬兰科学家设计了一个实验，对比了感染与未感染弓形虫的人的性吸引力，发现前者比后者有明显的提升。比如，感染了弓形虫的人的脸部对称性更好，这样的脸型更能吸引异性。再比如，感染了弓形虫的女性的体脂率更低，因此也就更加具有性魅力。相关论文发表在2022年3月25日出版的《同行评议期刊》（*PeerJ*）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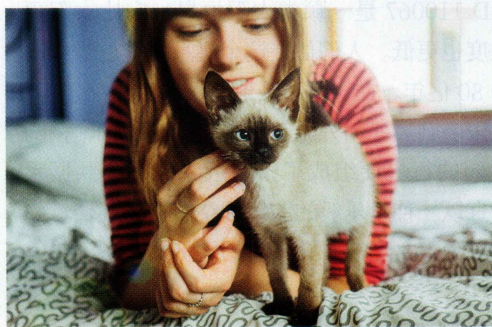
这篇论文的结论存在争议，而另一个更加普遍的问题是：寄生虫是如何获得这种匪夷所思的超能力的呢？传统的答案自然是达尔文式进化，即

通过基因突变获得新的性状，再通过自然选择挑选出那些具备更强生存或繁殖能力的基因。但是，这种进化方式的速度相当缓慢，充满了不确定性，很难想象一个单细胞寄生虫会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如此强悍的超能力。

来自日本理化研究所生命机能研究院（RIKEN Center for Biosystems Dynamics Research）的三筱塔平博士决定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他的研究对象是一种叫作马毛虫（Horsehair worm）的寄生虫，这种寄生虫出生在水里，被蜉蝣带到陆地，在蟋蟀或者螳螂等陆地昆虫的体内长大。之后，这种寄生虫会操纵自己的昆虫宿主不顾一切地跳入水中淹死，从而将自己释放到水里，完成生命周期。

此前的研究显示，马毛虫是通过模仿昆虫体内的趋光蛋白来影响宿主行为的。三筱塔平博士分析了马毛虫和螳螂的基因组，发现马毛虫体内编码这些趋光蛋白的基因和螳螂自身的趋光蛋白基因非常相似，两者有极大可能是同源的。也就是说，马毛虫很可能不是自己进化出了这些蛋白质，而是从螳螂的基因组里把编码这些蛋白质的基因偷了出来。

遗传学家将这种基因偷窃行为称作水平基因转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这是细菌等单细胞生物最常用的进化方式，远比达尔文式进化更加快速和高效。寄生虫之所以具备如此强大的超能力，很可能与它们善于从宿主那里偷基因有关。■



四库全书纪事之十一 大扩展(2)

《总目提要》

文·卜键

今天一说到《四库全书》，多数人最先联想到的是纪昀，将之论为第一号人物，全不计及其只是总纂官之一，同任总纂的还有陆锡熊、孙士毅。而依照四库馆臣职名表，在这个位置之上，还有15位总阅官、10位副总裁、16位总裁官。这里面几乎没有谁是挂名不干事的，都有分工，干不好也都要承担责任。如若不信，看看《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中三个月一次的错讹统计与处罚清单，你就会明白了。

历史上的人物评述常会出现偏差，而绝多误传的形成，也各有一些内在的原因。对纪昀的归誉，当在于他对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巨大贡献，以其学养、识见、文笔，另外二总纂也难企及。而这些提要，既分处于每部书的卷首，又汇为一编，置于全书正文之先，实乃最具光彩的部分，也标志着乾嘉学术的整体成就。当时即有不少人对纪昀极口称赞，说他“生入玉关，总持四库，万卷提纲，一手编著”，“所著《四库全书总目》，总汇三千年间典籍，持论简而明，修词澹而雅，人争服之”（昭槠：《嘯亭杂录》卷十，纪晓岚），“其编目提要，皆公一手所成，最为贍博”（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如此甚多。给人印象殊深的为“一手”二字，其他还有“一手删定”“一手裁定”之类，推崇备至，但的确有些过分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被简称为“四库总目”“四库提要”“总目提要”“总目”“提要”，更官方的名称为《四库全书总目》。究竟是先有总目，还是先有提要？其实也难以说清。开馆之初，乾隆帝就大致采纳了朱筠的建议，要求“将书中要旨隐括总叙厓略，粘开卷副页右方，用便观览”；而大典辑佚，首先就要求开列一个目录，供众纂修据以勾选，发交誊录。三十九年七月，馆臣呈上一份较为完备的总目，“于经史子集内分晰应刻应抄及应存书目三项，各条下俱经撰有提要，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可以

一览了然”（《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圣谕）。就此也可看出词义上的差异：总目，指的是全书目录；提要，则是对具体书籍的简介。其时，《四库全书》的编纂头绪繁多，这份总目在后来屡经修订删补，提要也只可能提交了一部分，总裁挑选一些样稿呈送给皇上，远未完成。

根据司马朝军的研究，《总目提要》的编纂大致可分四个阶段：分纂官起草、总纂官修订、总裁官裁正、清高宗钦定。他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正是循着这一路径详加论列，征引稀见史料，开掘很深，考证谨严，纠正了不少前人的说法。而由于该书的编纂过程实在太过复杂，仍留下可以探讨的空间：

其一，“四个阶段”的说法容易引起歧义。撰写提要分纂稿，即便只有纂修官承担，也有四五十人之众，分属大典辑佚、各省呈送、天文算学等不同板块，随撰随上交，总纂、总裁包括乾隆帝也是随到随审，与今日出版须“齐清定”，然后走三审流程全然不同。故称之为“四个层级”尚可，“四个阶段”则不妥。

其二，纂修撰写提要，总纂审核修订，与总裁的复审、乾隆的抽阅，工作要求、考核标准和付出的辛苦均不在一个量级上，不宜并列。

其三，一些重要的审稿层级被忽略。如总阅官，按规定是要分头审稿的，其中应包括《总目提要》。更不该的是漏掉了“总目协勘官”，乃为协助总纂官核订提要分纂稿特设的部门，并由纂修中抽调了一批能员，长期从事。譬如张羲年，章学诚说他“校勘书籍不下数百种，大约史、集两门序录签档，多出君手”，这里的“序录签档”，应即“总目协勘”。由于相关记载甚少，研究者一般不加论述，但随着近年来四库学的逐渐深入，也有人关注及此。如沈津就从上海图书馆所藏《总目提要》残稿上发现校改之迹，他认为出自纂修官之手，固然不能算错，更具体讲应是总目协勘官留下的。

2025年5月15日 星期三

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完竣上呈,总裁官在奏折中请求在经史子集各部正文之前,皆以“圣义”“圣谕”等名目,恭载清朝诸帝钦定诸书,并将弘历的相关谕旨和题写的御制诗列于卷首。乾隆认为“殊属烦繁”,曰:

至阅其《总目》,特载朕前后修书谕旨及御题四库诸书诗文为卷首,所办未为尽协。《四库全书》体大物博,将来书成之日篇幅浩繁,举何为序?所有历次所降谕旨,列之《总目》首卷以当序,事属可行。且官撰诸书亦有以谕旨代弁言者,自不得不如此办理。至题四库诸书诗文,若亦另编卷首,将来排列,转在列朝钦定诸书之前,心尤未安。虽纂校诸臣尊君之意,然竟似《四库全书》之辑端为朕诗文而设者,然朕不为也。着将所进诗文六卷彻出,仍分列入朕御制诗文集内……(《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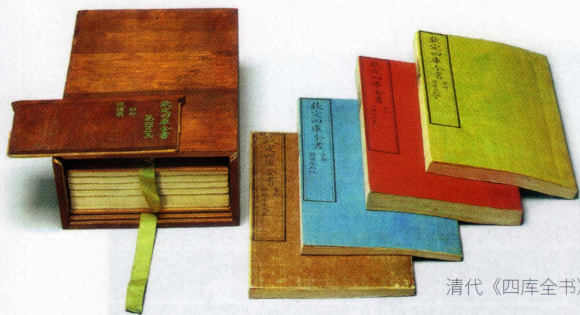
谁人提出的这些个马屁建议?推测是纪昀和陆锡熊。总纂官是没有资格列衔的,却很像是纪陆的主意,也只有他们能设计得妥帖具体。由此可知《四库全书》整体框架的官书色彩,以及对本朝帝王的特殊尊崇,多数出自馆臣。而弘历义正词严,虽然部分驳回,也部分采纳,《总目提要》卷首果然排列历次办书谕旨,以代序言。

就在三天后,乾隆传谕内阁,要求对纪陆等办理提要有功人员酌加奖励: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现已办竣呈览,颇为详核,所有总纂官纪昀、陆锡熊着交部从优议叙。其协勘查校各员,俱着依例议叙。(《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七六〇,谕内阁《总目提要》办竣总纂官纪昀陆锡熊等交部从优议叙)

从优议叙,即由吏部纪录或加级。皇上既将二总纂交部议叙,同时也没有忘记“协勘查校各员”,足见其作用有目共睹。就在当日,纪陆二人与所有总目协勘官一起,呈请军机大臣代奏谢恩。

两个多月后,军机大臣即专折奏请将汪如藻等总目协勘官列入升职名单:“今查勘总目之编修汪如藻、程晋芳、李潢,部议照例请旨引见,酌量加恩,亦以应升之赞善、司业列名在前,伏候



清代《四库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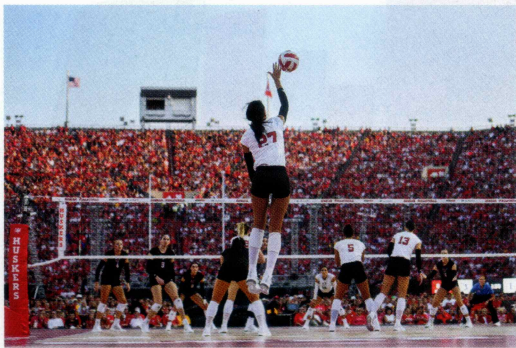
钦定。”皇上即予批复:“着照例以应升之缺,列名在前升用。”(《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七八二)此时张羲年已于三年前病逝,被列入馆臣表。

准确地说,吏部提交的是一个后备干部的优先名单,是说三人有了升职的资格,为奖励其校勘提要文稿之劳,建议排于候任队伍的前面。优先升用并不意味着升职,翰詹中流行着“一洗万年”“千秋大业”的笑谈,乃指一旦到了洗马、司业的位置,将极难动窝。而他们不动,也就意味着后面排队的要有足够耐心。程晋芳于四十九年夏病逝时,仍是一介编修;而次年二月在乾清宫大考翰林,编修汪如藻因考列第三等,不仅注销了“所有在馆议叙升用”的纪录,还被罚俸半年。排在二人后面的李潢,为乾隆三十六年二甲进士,选庶吉士,学习清书(即满文),一年后散馆授为编修。此人精通算学,没有见到他进入四库馆的确切时间,推测应较早,然后被选任总目协勘,应是负责天文算学之类图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录前人著作 3461 种、79307 卷,并附录未收之书 6793 种、93551 卷,皆撰有提要,具有极高的古典目录学价值。其以经、史、子、集为四大部,各部下酌分类别或子目,眉目清晰。部类下有“总叙”或小引,提纲挈领,亦便阅读。非大有才学和定力者,必不足以成事。二总纂尤其是纪昀为之呕心沥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同时学界赞誉有加,进而将首功记在他的身上,也是有道理的。至于“一手”云云,前人喜爱极而言之,也不必太较真。■

2023 年那些体育纪录丰碑

文·张斌



8月30日，内布拉斯加州纪念体育场举办了一场女排比赛，成为人类历史上现场观众人数最多的女子体育赛事

有心人说，就创造体育纪录丰碑的数量与高度，2023 年该是创纪录之年。不知您的感受如何，我们试着一起唤醒这一年的记忆。在沸腾的竞技场，在人潮的街道，在喧嚣的市场，在通向极限的征程，体育促动着人类永动向前。

当今世界，再没有一项体育纪录是无意间成就的了，众人脚步一致，心力聚合，所创纪录才算得气象万千。8月底，新学期伊始，内布拉斯加大学橄榄球场内满眼红色海洋涌动，筹备良久的创纪录行动取得惊人成效，92003 名观众入场观看了在巨大室外体育场进行的一场大学生女子排球比赛。以自家女排为傲的内布拉斯加人就是要冲击人类历史上女子赛事单场现场观众之最，全城鼓动，大学放假，票价友善，心愿达成，只为女性运动得到持续助力。正所谓生生不息，几个星期后，爱荷华大学女篮也有惊人之举，同样在超大体育场里摆下篮球场，现场 55646 名球迷齐声助威，场面动人，纪录也好看。爱荷华大学女篮本就是强队，挺进了 2023 年 NCAA 女篮冠军决战，那场比赛的电视机前观众人数达至千万。

内布拉斯加超越的前纪录来自女足欧冠，前前纪录则要追溯至 1999 年女足世界杯决赛。24 年过去，女足世界杯已经进化到了由 32 支球队创造 64 场比赛的时代，199 万 7824 名支持者入场观赛，场均已达 3.1 万人，比四年前法国女足世界杯足足高出了一万，振奋人心。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都是幸福的东道主，即便是半决赛激战过后不敌英格兰，但澳大利亚头号球星科尔依

旧感慨向冠军冲击的最后一战，“我并不认为这是此生仅有的，只要你展现出最好的表现，一定会有更多人走进球场来支持你”。75784 名球迷进场观看了这场半决赛，其规模已不逊于男足世界杯半决赛。澳新女足世界杯展开了不俗格局，哥伦比亚和牙买加已经可以越过传统强队全速向前，西班牙在进一步拉升女足技战术的含金量，至于颁奖仪式上发生的那一幕以及此后的巨变则是在彰显女子力量的坚韧与决绝。

女子运动的好消息持续不断，这一年的板球女子 T20 世界杯赛全球观看总时间达到了空前的 1.92 亿小时。观察家认定，不凡的纪录正在昭示蓬勃的未来。一个月前，德勤预测 2024 年全球顶级女子运动赛事的市场收益会首次突破 10 亿美元，将比 2021 年增长 3 倍之多。在美国，这一年女子比赛的播出量已占媒体市场的 15%，并将持续保持增长态势，2025 年有望达到 20% 的占比。美国女子足球职业联赛最新签下的 4 年版权合同价值已达 2.4 亿美元，至少 4 个平台会展现女孩们的风采。

好吧，女子运动在以喜人之势成长，纪录和数据还会不断刷新。下面就回到传统的运动世界之中吧，一个国家在不断地贡献纪录与颠覆，沙特的作为与雄心不再需要去揭示，未来的模样越来越清晰，那些动辄过亿的转会合同最终是要把世界杯乃至奥运会带到这个国度的。梅西没有被卷入这股潮流之中，他选择了让自己更舒适的世界，这一年他有了第八座金球奖，他粉红色的 10 号球衣从 10 月开始几乎成了足球世界里最风靡的周边产品，而此前北京工人体育场曾因为他率领的世界杯球队而陶醉在蓝白两色的情绪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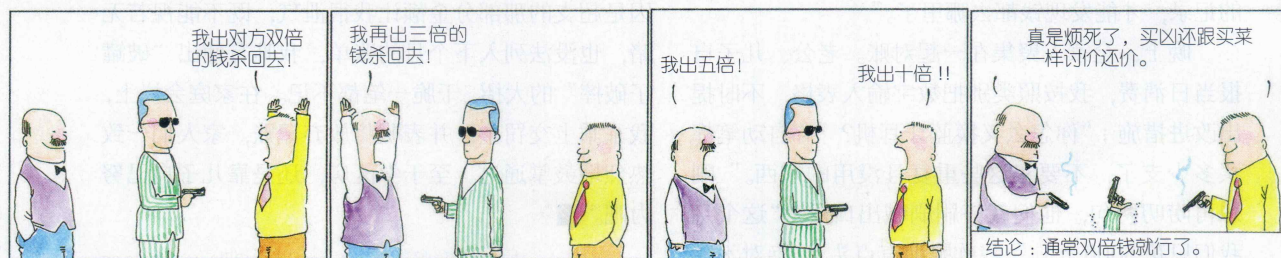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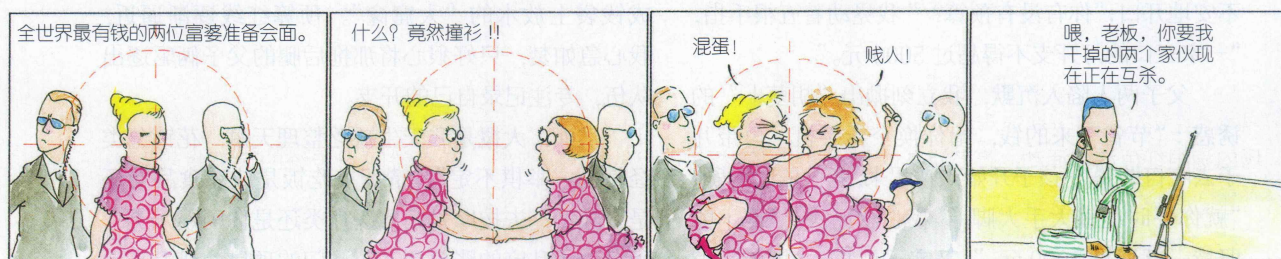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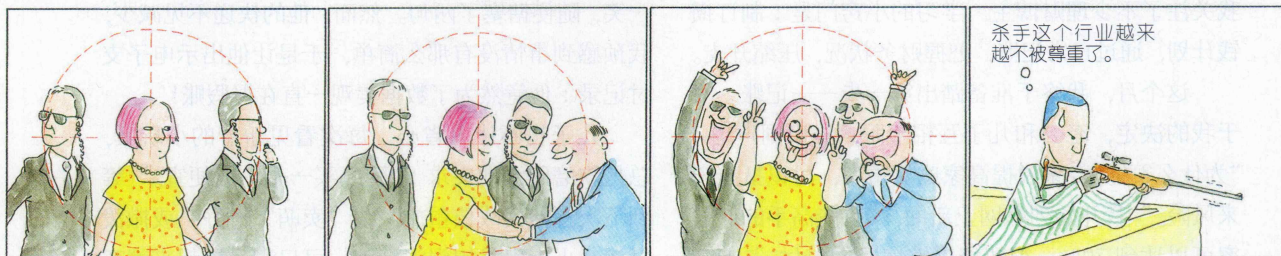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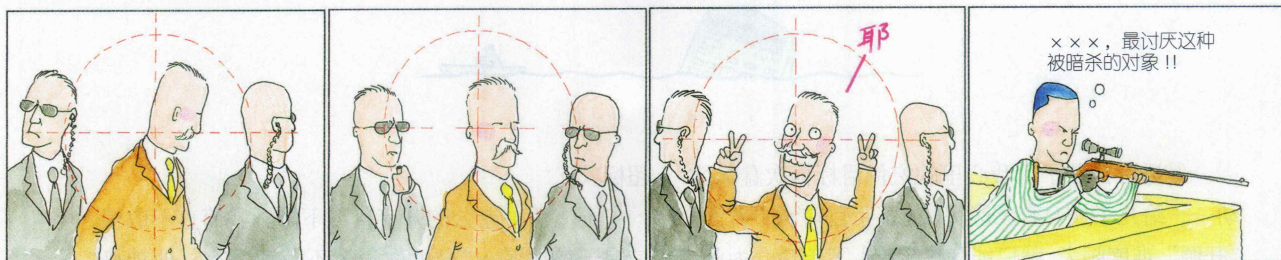
这一年纪录之王至少可以考虑授予荷兰人维斯塔潘，F1 全年 22 站缠斗，他居然仅仅输掉了三站，十连胜战绩难以超越。这一年，人类继续逼近一项纪录——马拉松突破 2 小时关口。跑鞋制造者试图让我们相信是技术的演进在促进人类如风向前，10 月里，基普图姆在芝加哥跑出 2 小时 35 秒全新纪录，“破 2”似乎来年有望。女子马拉松新纪录在柏林诞生，两分多钟的跃进，2 小时 11 分 52 秒的成绩给人惊喜。

各色纪录，不一而足。来年已近，岁月同行。■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中道崩殂的家庭记账之路

文·风雪漫漫 图·陈曦



最近房价跌了，我心里的宏伟目标再次蠢蠢欲动——给儿子换一套学区房。但鉴于目前囊中羞涩，“开源”难度颇大，就只能从“节流”下苦功。为此，我关注了不少理财博主，学习的小窍门是：制订攒钱计划，通过日常记账，把握财务状况，压缩开支。

这个月，我终于准备踏出第一步——记账。对于我的决定，老公和儿子互相瞪眼，异口同声道：“为什么？”“专家说提高家庭储蓄率，可以抵抗未来风险。”我开始列举网上新闻，“有些高手的储蓄率可以达到70%，很快能攒够房子的首付。”老公不安地开口：“你有没有预算？”我晃动着五根手指：“一家三口的月开支不得超过5000元。”

父子两人陷入沉默，我立刻抛出“胡萝卜”的诱惑：“节省下来的钱，给你换个新手机，再带儿子去吃自助餐。”孩子开始欢呼起来，老公依旧迟疑：“就你平时花钱大手大脚。”我心意已决：“谁不能坚持，就罚谁1000元。”又定下规矩：“每天晚上向我报账。”

我制作了一张电子表格，把开销分为两大块：一类是固定开支，包括水电、煤气费和通信费；另一类是生活开支，涵盖了食品、教育培训、服装、美容等。老公指着食品一栏，这里我细分了主食、副食、零食、在外就餐，他吐槽说：“你记个账怎么比仓鼠吃瓜子还仔细？”我辩解称：“只有细致的记录，才能发现钱都去哪儿了。”

晚上，全家人聚集在一起对账。老公、儿子自报当日消费，我按照类别把数字输入表格，不时提出改进措施：“你怎么又换蓝牙耳机？”“自动笔都买多少支了，不要买这些重复且没用的东西。”刚想再唠叨两句，他们就齐刷刷喊出口号：“这个月我们只花5000元！”我欣慰地直点头：“绝对不能

超标。”

一周后，老公的开支直线下降。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最近你怎么不花钱了？”他神秘一笑，随便搪塞了两句。然而，他的快递不见减少，我预感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于是让他出示电子支付记录：他竟然为了数据美观一直在报假账！

儿子也不让人省心，每次看见新奇的小玩具，总是软磨硬泡地央求：“网上买一个，很便宜。”等到下次，他又故伎重施，或“卖萌”讨好，或撒泼打滚。小支出犹如涓涓细流，可日积月累起来就变成钱袋上放水的“大窟窿”。预算红线逐渐逼近，我心急如焚，只好狠心将那拖后腿的父子俩驱逐出队伍，专注记录自己的开支。

然而，大概是我天生缺乏整理天赋，花销分类经常会“举棋不定”，请朋友吃饭是放在食品费还是交际费？去按摩是归入医疗类还是休闲娱乐类？面对一团乱麻的账单和五花八门的项目，我沮丧地号叫：“只有少数人才能把账记得井井有条。”

购物时，我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丧失了过去添置新物品的喜悦，心里盘算着“这笔钱要放在哪个类别”或“使用后有没有超支”。这些冰冷的数字像一枚枚钉子，把我的一举一动固定在表格里，省钱的同时却剥夺了自由选择快乐。

在记账的第35天，我最终决定删除账本。原因是超支的那部分金额让我很泄气，既不能视若无睹，也没法列入下个月的账单，我唯有使出“破罐子破摔”的大招，干脆一笔都不记。在家庭会议上，我乖乖上交罚金，并表明将放弃记账，家人们一致热烈地鼓掌通过。至于学区房，还是靠儿子自己努力吧。■

本栏目投稿邮箱为：yourproblem@lifeweek.com.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幸福二村40号兰博基尼北京展厅

VIP贵宾专线：400-013-0970